

研讨实录

第 155 期

155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 30 周年庆典暨学术研讨会

魏加宁：政策刺激还是改革开放？

崔 凡：“新华盛顿共识”与全球化的未来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917号807室 Address: Rm 807, 917 Longhua East Road, Shanghai
邮编：200023 ZipCode: 200023
电话：86-21-62188752 Tel: 86-21-62188752
传真：86-21-62188714 Fax: 86-21-62188714
网址：www.sdrf.org.cn WebSite: www.sdrf.org.cn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二三年十月

序 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于 1993 年，是一个围绕发展问题进行政策性研究的非赢利的公益组织，旨在推动改革开放、服务实体经济。基金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组织各种公开或闭门的研讨会，为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政策见解提供交流的平台。

基金会每月举办一次“上海发展沙龙”，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并与听众交流。沙龙已成为基金会的一个品牌。

基金会不定期地举办小范围的“中国经济的未来”系列座谈会，主要关注中国中长期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根据不同主题，鼓励不同观点的交流，提倡讨论和争辩。

基金会在每年的年中和年末举办两次“宏观经济论坛”，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判断我国当年的经济形势，展望来年的经济走势。

基金会每年与其他机构合办“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专题圆桌讨论会，针对城市化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基金会每年还与其他机构合办“上海货币论坛”，对货币问题进行研讨。

基金会每年举办“上海全球金融论坛”大型国际研讨会，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对全球经济、金融进行研讨，这也已成为基金会的一个品牌。

我们把上述各类研讨活动的主要内容进行整理，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发行。在此过程中，我们尽量将研讨活动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将有价值的见解与朋友们分享。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举办的研讨活动能够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荣誉会长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he characters '俞' and '忠' (Yu Zhong) in a cursive style.

编者的话

本期《研讨实录》收录了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最近三次学术活动的实录。

1993年，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正式成立，开创了中国第一家研究型公益性基金会的先河。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坚持改革开放的宗旨，举办与发展相关的各种研讨会、积极发挥智库的作用，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今年是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30周年，为此我们于9月21日举办了“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30周年庆典暨学术研讨会”。

上半场是“三十而立——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座谈会。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作了《基金会工作报告》，介绍基金会成立的来龙去脉，基金会过去30年所做的工作，以及今后如何进一步发展。随后，上海市原常务副市长、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荣誉会长屠光绍、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书面发言）、上海市原副市长、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沙麟、上海市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胡延照、上海市原政协副主席、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王荣华、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王战（视频）等分别致辞，他们回顾基金会30年成果，期待新的未来。

下半场是“稳经济、促改革，进一步推动我国高水平对

外开放”研讨会。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席余永定做主旨演讲“关于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几点思考”。他认为，我们应该尽快打消各种顾虑，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中国有足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稳定经济增长，并解决房地产企业爆雷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发表演讲“我国经济发展的六个重大问题”。他指出，中央去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还没有做到。这要求我们改变以扩大投资为主的扩大内需，实行以扩大居民消费为主的扩大内需，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扩大消费上。

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发表演讲（视频）“新时代、新格局下我国开放的新特点、新任务”。他指出，我国下一阶段开放有五个新任务：一是要以推动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贯通内外循环；二是以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为重点，建设贸易强国；三是以高质量供给“一带一路”，通过全方位对外开放；四是实施高标准自贸试验区网络建设；五是以人民币国际化加高质量走出去，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做晚餐主旨演讲（视频）“坚持多边主义，树立和维护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他回顾了亚投行创立与发展的进程，指出亚投行的成功创建

和运营是多边主义的胜利，体现了各国对和平、发展、合作的共同追求，也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领导力、公信力和感召力。

基金会和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 8 月 31 日合办了第 180 期上海发展沙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原巡视员、研究员，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学术顾问、首席经济学家魏加宁先生在沙龙上作了题为“政策刺激还是改革开放？”的演讲。他认为中国经济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仍有很大增长潜力，当务之急不是建设有为政府，而是有限政府、法制政府。政府与其投资项目，不如投消费，投社保。我们要以数字化转型追赶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以新一轮改革开放赢得新一轮发展红利。

基金会和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 10 月 16 日合办了第 181 期上海发展沙龙，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崔凡先生在沙龙上作了题为“‘新华盛顿共识’与全球化的未来”的演讲。他介绍了沙利文所谓“新华盛顿共识”的背景，回顾了自由贸易的历史演变过程。他认为贸易摩擦今后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他相信全球化进程还会继续往前走，但会呈现出和之前不一样的特征。

更为详细的精彩内容，请大家阅读本期《研讨实录》。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二〇二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目 录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 30 周年庆典暨学术研讨会	1
上半场：“三十而立——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座谈会	1
乔依德：基金会工作报告	1
屠光绍致辞	6
吴晓灵致辞	11
沙麟致辞	12
胡延照致辞	14
王荣华致辞	15
王战致辞	16
嘉宾发言	17
下半场：“稳经济、促改革，进一步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研讨会	23
余永定：关于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几点思考	23
杨伟民：我国经济发展的六个重大问题	41

黄奇帆：新时代、新格局下我国开放的新特点、新任务.....	57
晚餐主旨演讲.....	66
金立群：坚持多边主义，树立和维护负责任大国形象.....	66
魏加宁：政策刺激还是改革开放？	74
崔凡：“新华盛顿共识”与全球化的未来.....	112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 30 周年 庆典暨学术研讨会

2023 年 9 月 21 日 上海绿地万豪酒店

上半场：“三十而立——上海发展研究 基金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座谈会

张立平（主持人，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国盛集团原董事长）：尊敬的屠市长、沙市长、胡主任、王主席，尊敬的各位来宾，今天非常有幸在这里共庆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 30 周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今天议程的第一段是大会的报告和致辞。首先，欢迎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乔依德同志做工作报告！

乔依德：基金会工作报告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尊敬的沙市长、胡市长、屠市长，尊敬的王院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在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 30 周年之际，我非常荣幸地代表基金会向大家汇报我们在

过去 30 年所做的工作。我的汇报分三个方面：基金会成立的来龙去脉，基金会过去 30 年所做的工作，以及今后如何进一步发展。

一、基金会成立的来龙去脉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是在浦东改革开放大潮中涌现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具体来说，为了推进浦东的改革开放，有很多专家学者写了许多内部决策咨询报告，但缺少对这些成果进行评价和奖励的资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关部门提出要成立一个基金，征集社会资金以支持决策咨询研究。时任上海市长黄菊、副市长徐匡迪、市政府副秘书长蔡来兴、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战等同志直接推动完成了这个创举。基金会成立初始，就参与了对上海发展战略的大讨论；同时设立决策咨询奖，对优秀成果提供资金奖励。基金会第一届理事长为庄晓天同志，名誉理事长为汪道涵同志，这是基金会成立的原因以及第一阶段的情况。

在 30 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基金会成立的过程时，我常常说，哪怕以今天的眼光回顾过去 30 年，那些倡议者依旧很有前瞻性的眼光。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比我们成立晚 5 年。全国各省市现在只有上海有这样一个发展研究基金会。所以，我们非常珍惜这样一段历史。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从 2004 年国务院发布《基金会管理条例》到现在。这个条例最主要的核心是现任公务员不能担任基金会的理事长、法人代表和秘书长。因此原上海市副市长沙麟同志就担任了法人代表和理事长，我担任秘书长，2005 年

开始，根据新的规章制度，基金会作为独立法人进行运作。后来沙麟市长退了，由胡延照市长接替，胡延照市长退了，又由屠光绍市长接替，尽管头衔不一样，但是基金会是在他们领导下开展工作的。

二、基金会过去 30 年所做的工作

基金会过去 30 年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我们工作的原则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用大家比较喜欢的方式来概括，就是“2233”这四个数字。

第一个“2”，我们做了两方面的工作。基金会成立初，我们参与建立了决策咨询成果奖。但是由于经济高速发展，财富积累很快，基金会的资金筹集跟不上这样的速度。基金会先是不出全部奖金，后来出一半，后来越来越少，最后退出评奖，这是比较遗憾的。在这以后，基金会主要做两方面的工作，或者说是基金会的两个支柱。

一方面，我们建立了各种交流的平台，召开各种研讨会，对大家所关心的有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研讨。我们现在坚持时间最长的是上海发展沙龙，从 2005 年 5 月到现在已经办了 180 期，差不多每年举办 10 次，沙龙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针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讨。另外，我们不定期地针对社会热点问题举办小型的闭门或开门研讨会。比如说，网约车出现时，社会上有很多争议，我们展开讨论，分析优点和缺点是什么。研讨会一般会把研讨结果公布出来，向有关部门递交政策建议。我们还举办各种国际研讨会，和国际上一些知名研究机构进行交流合作，如美国彼得森国际

经济研究所、美国新经济思维研究所、德国艾伯特基金会等，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是基金会有一个特点。

另一方面，我们开展一些政策方面的研究，研究的课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自己决定的主题，主要是围绕经济发展，特别是金融方面，我们每年都针对全球金融治理出一份研究报告。二是承接政府、企业招标或交办的研究课题。如市政府决策咨询课题，我们有时候也会投标，比如我们为临港新片区做了有关“统筹发展在岸业务与离岸业务研究”的课题。

这两方面是我们工作的支柱。我们觉得“双支柱”安排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进行必要的研究工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能够帮助我们对交流平台选择什么主题、邀请什么人来做演讲有比较深刻的理解。

第二个“2”，是基金会在工作中坚持的两个原则，这两个原则已经写在基金会 logo 上，就是“尊重常识、坚守底线”。这两句话的“发明权”属于吴晓灵行长，她在写给研讨会的书面发言中给予我们这个评价，我们换了这两句话的次序。这看起来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是非常重要。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在国家会计学院题词时提出“不做假账”，初看好像很简单，要求不高，现在回过头来看，要真正做到这点并不容易。我们坚持这两个原则，“尊重常识”是根据事情本来面目进行分析判断，不盲目跟风，不要手段；“坚守底线”是遵纪守法，不搞歪门邪道，就是要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不摇摇摆摆。我们举办的各种研讨活动、完成的各个研究课题都坚持了改革开放的方向，为此我们感

到自豪，我们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第一个“3”是我们工作的成果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推进政策导向的学术研究。比如说，基金会是最早关注美国次贷危机的研究机构，我们第一次开研讨会是 2007 年 9 月，雷曼兄弟是 2008 年才垮台的。第二，我们在讨论之后总结好的观点或意见，提供给政府相关部门做决策咨询。比如说，差不多在 10 年前，我们就提出改变计划生育的政策，通过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递交给中央。我们去年写专报提出要改变疫情封闭管控的做法，尽快朝常态化管控措施转变。第三，将各种有意义的观点跟社会各界分享。比如每年举办两次宏观经济论坛，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将他们对中国经济、世界经济的真知灼见与社会各界人士分享，使后者正确了解经济走势。

第二个“3”是指基金会形成了“三座桥梁”。第一，政府与社会的桥梁；第二，首都北京与上海的桥梁；第三，国外研究与国内研究的桥梁。这些桥梁的目标是连通，连通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一方面要把政府政策向社会正确宣讲，同时把社会上的各种意见向政府反映。

三、基金会如何进一步发展

最后，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在工作当中还存在哪些不足之处，以及今后如何进一步发展。比较遗憾的是，我们基金会发展得不够快，不够全面。一是筹集资金速度不够快，量不够大，影响我们扩大业务，也影响我们对外部项目的支持。现在我们对外部项目支持还是比较少的，有时候我

自己也在想，我们常常说徐根宝在崇明创办足球基地 10 年磨一“剑”，我们磨“剑”也超过 10 年了，好像也没有做得很大。这个还是比较遗憾的。另外在研究方面，我们做的较多的还是根据书面资料进行研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这方面做得不够，今后需要加强。

展望未来，基金会要更快、更稳健、更好地发展，继续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现在基金会走过了 30 年，我们希望基金会还能继续走好下面的几个 30 年，成为一家百年老店，能够持续存在下去。在基金会 30 年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支持。我们是一个社会公益组织，从来没有政府的财政支持。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社会各界支持我们，给我们资金的捐赠，并对我们的研究课题和研讨活动给予支持跟赞助，也有一些机构以提供办公室场所等其他方式给我们支持。归根结底，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是改革开放的一个成果，我们坚持改革开放，也希望大家能对这个小小成果给予继续的支持和爱护。

谢谢大家！

张立平：下面，进行致辞阶段！首先，有请上海市原常务副市长、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荣誉会长屠光绍。

屠光绍致辞

屠光绍（上海市原常务副市长、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发

展研究基金会荣誉会长)：尊敬的沙市长、胡主任、王主席，各位来宾，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30 周年华诞。

其实，本来应该让沙市长、胡主任、王主席他们来讲述，他们对于基金会的发展贡献比较大，他们几位非让我先讲，我恭敬不如从命，先抛砖引玉。

发展研究基金会 30 年，最开始的历史我没有参与，后来我到上海以后才有更多的了解。当然随着我了解越来越多，我觉得发展研究基金会确实可圈可点，也更激起我更多参与发展基金会活动的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研究基金会所做的工作和贡献在感染我，也感召我。现在大家给我挂了一个头衔“荣誉会长”。因为现在对我们有很多限制，不能任意兼职，所以叫“荣誉会长”，实际上我承担不起。但是我对发展研究基金会是高度认同的。

这 30 年的发展过程，用三句话来概括。

第一句话，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当时因为改革开放的大潮，随着上海浦东开发开放进程，以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国家战略的确定，这样背景使得我们基金会应运而生，在黄浦江畔扬帆起航。我们发展研究基金会实际上和我们国家改革进程、上海改革开放的推进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正是有了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这样的智囊，这样的研究机构，这样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平台，其建立对于上海的改革开放，包括上海四个中心，特别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对于我们整个改革开放创新发展，都起到了

积极作用。所以，我在这里作为后来参与者，我提议，为当初谋划创立并在建立之初给予大力推进的前辈们，包括当时参与这些工作的前辈不，管是今天在这里还是暂时缺席的，我们应该用掌声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第二句话，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走过了 30 年的历程，在这 30 年历程里成果累累。刚才乔秘书长在介绍基金会成果时也说了，现在每个人桌上都有一本基金会历程和成果的展示，基金会大量的成果在上海改革开放和金融中心建设中都起到了作用。随着我越来越多参与基金会的活动，尤其承蒙延照主任信任，让我一定继续多参与基金会的工作，所以我的接触就更多了。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为什么取得这么多的成果，在我看来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基金会无论做课题研究，还是做闭门讨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直奔，特别是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所遇到的一些矛盾、挑战，当然也包括机遇。在这些过程中，一些比较尖锐、比较现实、比较急迫的，更重要是涉及到长远的主题的选择与讨论，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性，基金会的讨论不回避矛盾，也不回避课题尖锐性。我认为在研究主题的选择方面，基金会特别突出了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虽然现在智库很多，研究平台也很多，我们紧紧抓住这些主题，使得我们基金会始终和整个改革开放进程所要解决、研究的问题保持高度契合，这是我们能够硕果累累的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我们在具体的研讨、研究方式上，保持了很鲜明

的特色。这个特色是什么呢？我们通过闭门研讨、沙龙活动，始终把研究和分享、交流做得比较实。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大家可能也都了解，有的智库或机构平台喜欢搞一些高大上的活动，社会影响比较多的活动，比如搞个公开的论坛，这个大家都见过，这些需不需要呢？当然需要。但是，这种大会，这种大场面，是解决不了很多问题的，特别是对一些问题的深入讨论和交流。这需要提供合适的方式、有效的平台，这样才能让我们对问题的讨论不仅仅局限于表面。我们的闭门讨论会和沙龙是 30 年来一直坚持，而且一以贯之的，我们的特色就在于一以贯之的坚持，这个特别重要。

第三，参与基金会各种讨论的来宾，有的来自于学术界，有的来自于实体部门，也有不少来自于监管部门和政府。我参加过好多次我们的闭门讨论，很重要的一条是大家敢讲真话。对于这样一种智库平台，能不能够直面问题，能不能够讲真话，能不能够进行观点的交锋，都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这种交锋，没有这种交流，没有这种尖锐争论的展开，要获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是很难的。

这三个方面是我个人的体会，应该是我们基金会这 30 年来能够累累硕果的原因。不管是疫情期间，还是疫情结束以后，不管什么情况下，我们的闭门研讨会和沙龙始终保持了一种“恒温”。什么叫“恒温”呢？就是大家都认同这个平台，大家都愿意参加这个平台，尽管我们每次参与的人数只有三四十，但都是有质量的，发言都是讲真话的，这才能够使它生命之树长青。大家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最后保持

了这样一个“恒温”，并且尊重事实，坚守底线，基金会在这方面真的是可圈可点。

第三句话，过了 30 年之后再展望未来，基金会依然任重道远。现在我们面临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国际格局发生重大深刻的调整 and 变化。中国 40 多年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但现在又面临新的巨大挑战。我们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要高质量地进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些都对我们国家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尤其是当下，有很多矛盾交织，怎么看过去改革开放的红利，怎么看推动经济三四十年来取得成果的经济动能，这些情况正在出现变化。因为有了科技创新，我们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以及现在的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发展，对我们整个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发展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我们将来发展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就是将来的一个常态。在国内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和调整，经济不确定性又非常高的情况下，我觉得更需要发挥我们智库的作用，聚集智库的见解。我工作的岗位从监管部门到市场，从国内业务到国际业务，总结一条，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什么时候集中了大家的智慧，什么时候听取了不同的声音，什么时候就能够更多在决策时反映整个社会的共识，我们的国家发展就会顺利，就会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基金会作为一个智库，30 年来已经取得丰硕成果。面向未来，今后的 30 年再 30 年，更需要基金会通过我们这样的平台，更多聚集不同的意见，汇聚不同的智慧，从而能够更多促进

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发展，让整个改革开放在新的发展阶段，在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少走弯路，更能够走一条行稳致远的路。我们基金会应该有这样的担当，也有责任通过基金会的平台，更多聚集大家的智慧，来促进我们国家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我就这三句话，建立的时候，是扬帆起航、应运而生；在发展过程中成果累累、建树颇多；今后，我们依然需要聚思汇智、任重道远，不断做出我们新的贡献。这我自己有感而发。最后衷心祝贺我们 30 年的成果，同时期待新的未来。谢谢大家！

吴晓灵致辞

张立平：根据会议安排，我代表基金会宣读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女士发来的贺信：

贺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 30 周年。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沐浴着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春风，开启了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贡献智慧的研究之旅。30 年来基金会在学术交流和课题研究中发挥了民间研究平台、聚集人才、服务社会发展的作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刻，我们都看到了基金会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近几年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仍能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围绕国际金融治理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在研究中坚守底线尊重常识，体现了智库的研究准则。未来的国际国

内环境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更需要研究者的智慧和担当，祝愿基金会在波澜起伏的后浪中永立潮头。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

张立平：下面致辞的是上海市原副市长，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沙麟先生，大家欢迎！

沙麟致辞

沙麟（上海市原副市长，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新老朋友，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我们发展研究基金会 30 年的庆典。

我感到很高兴，也很自豪，参加过一段时期的基金会的工作。回想起来，那是 2004 年，时任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战同志找到我，说起我们在 1993 年改革开放之初由老一辈上海市领导倡议，成立了上海发展研究基金。当时，主要还是募集资金资助有关发展研究的项目，但是没有大量开展其他方面的学术活动，主要是资助性的。当时王战同志建议我能不能出任新的作为独立法人的基金会领导。我当时已经有其他邀约，但是我思考一下，觉得这个基金会是改革开放新的产物，是一个新的事物，应该对它寄予希望，有机会参与这项工作也是更好地为改革开放服务。然后，我们就成立了新一届的理事会，由我担任法人代表和理事长，乔依德同志开始担任我们的秘书长。虽然我只参与了一段时间，基金会后来有很好的积累，有很多新的发展，但是我还一直

关注我们基金会的发展和活动。我觉得这些年来，基金会不仅是学术交流平台，也起到了沟通社会和政府之间桥梁的作用，沟通地方和中央之间信息交流的作用。特别是它形成了几个亮点，我觉得很值得分析和继续发展。

第一是上海发展沙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关注当前社会经济、科技各方面的热点和大家感兴趣的深层次问题，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企业家发表他们的看法，进行交流讨论。我记得第一次是 2004 年 4 月份余永定教授讲汇率问题，他当时敞开谈了很多他个人有前瞻性的看法。从这个时候开始，近 20 年来，我们的沙龙已经举行了 180 次，这是很好的平台，也是我们一个亮点。

第二，这些年来基金会举办了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基金会突出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题，它是经济研究、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环境和整个经济环境研究的汇集。

第三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特别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基金会要珍惜、延续这些年已经形成的和美国、欧洲及其他国家的国际学术机构的双边交流和沟通关系。这样才能够成为一种桥梁，成为一种补充，能够有利于我们整个改革开放，以及我们经济和各方面的发展。

我们基金会这些年持续做了这些工作，前面还有很多的路可以开拓，可以走。在这里，我要特别向我们基金会的工作班子表示谢意，这么多的工作，这么多的出版物，这么多活动的组织，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精干的班子完成的。没有他们的贡献，没有他们努力，没有他们的辛勤，没有他们在

那里的无私奉献，我觉得没有基金会今天这样的成果。这里我要特别向乔依德秘书长致敬，因为这些年来，在我的印象中，乔依德同志作为基金会的秘书长兼副会长，他不仅自己有很强的造诣，特别可贵的是他一心扑在基金会的工作上，没有其他的要求，我觉得他是无私的奉献。在这里，我作为一个见证者，要向乔依德同志致敬！

三十而立，我们的基金会一定会走得更远、更好。谢谢大家！

张立平：下面有请上海市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胡延照先生致辞！

胡延照致辞

胡延照（上海市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1993 年上海发展基金会应运而生。

1992 年，邓公南巡讲话，再次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军号，从此中国改革开放蓬勃发展，势不可当，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我们基金会从某一个截面，记载着这样一段历史的事实。在浦东开发开放形势下，上海一批学者型的领导，比如王战同志、蔡来兴秘书长等许多有识之士，倡导倡议成立了基金会，在黄菊同志的大力支持下，走出了新的一步。

今天，我们又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形势，需要继续坚持改

革开放，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尊重基本的常识，基本的经济规律，需要来自民间的声音，来自各方面的智慧的声音。

刚才沙麟同志讲三十而立，屠光绍同志讲任重道远，确实如此。我衷心希望我们基金会再接再厉，继续发挥应有的声音和作用，真正做到行稳致远，为中国改革开放，为上海的健康发展继续做出有意义的贡献。谢谢大家，谢谢各位！

张立平：下面有请，上海市原政协副主席、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王荣华先生致辞！

王荣华致辞

王荣华（上海市原政协副主席、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来宾，20 年前，我在市政协担任副主席，2004 年我兼任社科院书记和院长，不多久沙麟同志就约我谈，希望我来接棒。出于对沙麟同志的尊重，同时也是感恩他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我在复旦大学做青年工作的时候，沙麟同志对青年工作理解和支持，可以说仗义执言。

虽然我当时已经有二十几顶“草帽”在头上，我仍然答应了。这期间，市政府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曾经坦率地跟我说，成立这个基金会是因为决策咨询研究存在着“有钱不许用，有奖不能评”的情况，成立基金会就是做政府“有心难为”的事情。基金会定位是研究型、公益型，要淡名薄利。转眼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 30 周年了，它诞生于上海这座城市的快速发展期，那时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同时，它

也是在建设四个中心的重要发轫期，应运而生、与时发展，成为专业性、公益性的一个重要时刻。

过去 30 年发展，乔依德有一个工作报告，我是赞同的。特别是对我来说，帮助我了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趋势、难点、热点、焦点和堵点所在，这个对我帮助很大。今后 30 年我们要把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基金会，怎么精准大国大城的定位，怎么把握时代进程，怎么来谋划出高端高质的成果，影响上海，影响全国，甚至于世界，发挥信得过、用得上、离不开的高端智库作用。我在社科院就研究智库，现在还在关心这方面，我觉得中国普遍存在“库多智少”、“有声传不开”，“重要意见没有及时让重要的人听到”等问题。

在新形势下，我们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发挥理性之光，“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个“君王”指国家、民族和人类，至于“名”，“事如芳草春长在，人似浮云影不留”。谢谢大家！

张立平：下面一位是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王战。他有事出差不在上海，我们一起来看他发来的录像。

王战致辞

王战（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首先，我祝贺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 30 周年。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的背景是 1980 年中国第一个政府的智库成立，就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应该是 1990 年浦东开发开放。在 1993 年的时候，我们市委市政府组织第二次大的讨论，这个大讨论题目是“面向 21 世纪的上海”。在这个大讨论中，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这是中国又第一个研究类型的基金会，是一个创新。

这个基金会成立了以后，推动了上海决策咨询的工作。所以在上海发展基金会成立差不多同时，上海发展研究中心开始组织政府咨询课题项目的发布与研究，组织政府咨询的评讲活动，所以说基金会和上海政府咨询在上海都是走在前头的。

基金会 30 年来做了很多工作。我印象最深的是这 30 年来，基金会形成了一个发展沙龙。成立沙龙的初衷，是为了使在上海的许多国内外学者，还有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能够第一手得到政府政策方面的信息，而且能够给予解读，让他们更多知道中国和上海改革开放发展的信息。应该说这个沙龙对改革开放，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我祝愿我们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 30 周年以后，能够再接再厉做出更大贡献。谢谢！

嘉宾发言

张立平：张立平：下面进入自由发言的环节。今天非常高兴有两位北京的嘉宾专程赶到上海，来参加我们今天 30

周年的庆典。先请这两位嘉宾做一个发言。

乔卫兵（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社长）：我是中国出版集团的，我们为基金会做了一些出版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在基金会成立 30 周年喜庆的日子，我很荣幸受邀参加会议，今天到现场特别高兴，聆听了上海这么多老领导的精彩发言，对我们基金会成立的背景、历史、做出的重要贡献有了一个深切的感受，体会很多，让我们有很多的感悟和学习的机会。接下来，我们将尽我们所能，继续跟基金会有一些合作，在出版方面提供更多帮助。谢谢大家！

王玉荣（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秘书长）：我在 G20 在中国召开期间，第一次跟乔秘书长在成都合作了一个论坛。这之后不断加深合作，两年之前基金会与清华大学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联合发起“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屠市长也是我们的顾问。两年多来，我们开了 15 场会议，刚刚在北京举行了第十五届会议“论坛智库化，智库论坛化”，这个是一个趋势。

除此以外，我们还做了另外一个品牌。2023 年美国有一本书《2030 全球展望》，美国有这个，我们也应该有。2023 年春节之前，我们在中央党校会议室召开了“2050 中国与世界内部研讨会”，这个会到现在已经开了六届，2020 年我们在上海与王战院长、乔会长一起办了一场。

在这个会的启迪下，我们召开了“国家形象传播智库”会议。国家形象也是大事，今年 10 月 15 号将召开第二届。在 2017 年时任清华大学书记的批准下，我们创办了“全球

教育 50 人论坛”，今年将召开第六届。

到今天为止做得最成功的，是跟乔老师和屠市长一起办的“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这个是有门槛的，一般人感兴趣，感兴趣的人不一般，因为这是挺专业的事。

有多遥远的过去，就有多么伟大的力量。30 年过去了，未来应该还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重要的是，要找到这个时代最紧要的问题，甚至是世界最紧要的问题，我认为一定要找几个大问题好好研究一下，在这里我提几个小建议。

第一，2017 年美国国防部找相关智库研究，美国的兵种里还差一个思想的司令部，因此建立所谓的“2050 司令部”，2018 年这个司令部跟美国密西根大学合作建立“未来司令部”。美国已经干到 2050 年去了，所以我们要再超前一点，建 2051 或者 2080 未来司令部，因为现在世界发展太快了。我建议在上海这个伟大的地方建立，只要在座诸君一声令下，我们就可以做。

第二，这次俄罗斯和美国的金融战只相当于 12 级金融海啸，中国和美国如果发生金融战，就相当于 18 级金融海啸，对于 18 级金融海啸我们准备好了吗？因此针对这个，我建议，联合上海交大、上海财大、复旦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及相关机构，建立一个面向 2050 年中美金融战的国家级实验室。

第三，在中国的大地上，除了长三角还有京津冀，还有珠三角，还有成渝地区。所以希望基金会其他地区建立二级研究院之类的机构。

谢谢大家！

张广生（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我刚才看到资料上提到，黄菊市长在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工作会议上讲“改革要先行，开放要扩大，决策咨询研究必须要超前”。当时的报告是我起草的，我讲这三句话的背景。首先，当时我们经过中央批准，上海在三个保证的前提下，率先改革、自主改革、自费改革。其次，随着浦东开发以后，开放要扩大，而且当时还面临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修订，所以“迈向 21 世纪的上海”的课题组织也正在筹建之中。当时就提出来，上海为了能够发展未来，决策咨询研究必须超前，而不是同步进行。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应运而生。再回顾这 30 年，基金会做了很多工作。

目前国家对上海的定位非常清楚，五个中心、四大功能，历任中央领导都提出要上海发挥龙头作用、领先作用、示范作用。现在关键问题是，决策咨询研究怎么从彼岸到此岸，现在我们缺的是这个。我的建议是，我们决策咨询研究要更接地气，研究重点要做一点调整。

为什么这么讲？我一直对浦东，包括自贸区，讲一个历史最基本的经验。九十年代浦东开发的时候，国家给了第一轮开发政策，到期是 1995 年。但是我们对下一步的政策，在 1993 年就开始研究了。当时总理到上海来做分税制调研的时候，问上海浦东开发政策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在上海各方面专家的研究和支持下，我们就提出了第二轮开发的政策建议。事实上浦东开发第二轮的时候，我们的政策储备和研究一年以前就准备好了。所以当时在研究浦东开发进一步扩

大的时候，我们有政策的准备，而不像现在某些环境下，中央给你提出一个东西，我们任何的政策方案都没有，那就延后了制度创新设计的时效。我关注的就是此岸到彼岸的桥，是我们决策研究的一个重点。

多谢基金会邀请我多次参加会议，今后我会尽自己力量，积极参加基金会的活动。谢谢大家！

杨建荣（政协上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原金山区委书记）：首先我借这个机会祝贺上海发展基金会成立 30 周年，今天的活动以座谈会和论坛的方式来召开非常好，我看到有这么多上海的老领导拨冗出席，还有北京来的领导专家，说明大家对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30 年的工作还是肯定的。

上海发展基金会成立这 30 年，也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 30 年，基金会的成果是非常丰硕的。我看了以后，脑子里面浮出一个词，基金会是“不挂智库名字的智库”，中文是智库，英文就是思想库，最重要就是要有思想。我期待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在未来 30 年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大环境下，在研究领域，特别是高水平改革开放方面，做出进一步贡献。

我当区长、区委书记的时候想，我们如果方向不明、方向不清，决策错误的代价就很大。刚才王主席讲智库的声音传得不够远，我希望智库的声音能传得远一点，重要的是能够让重要的人特别是决策者听到。我们共同努力。谢谢大家！

沈国明（社联副主席、教授）（书面发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值此贵会成立 30 周年之际，谨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贵会诞生于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上海进入大发展的关键时刻。当时改革开放和上海发展面临很多难题，需要学术界和实务界联手予以破解。贵会在这方面发挥独特优势，做出了卓越成绩。

贵会组织的研讨会和学术沙龙，高举改革开放发展的大旗，凝聚了国内外顶级专家学者传播思想、交流信息，极大地调动起众多人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也为不少人释疑解惑、指点迷津，作为很多活动的参与者，我获益良多。

当下，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国际局势比较严峻，我们只有进一步做好自己，才可能有效应对困难的局面。相信贵会一定会一如既往，调动各种资源，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以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希望在今后的岁月，贵会能获得社会广泛的理解和更多的支持，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让自身变得更大更强。

祝贵会日益兴旺发达。

张立平：非常感谢刚才几位发言的嘉宾，他们都为我们基金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第一阶段的致辞和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下半场：“稳经济、促改革，进一步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研讨会

乔依德（主持人，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各位来宾，我们下半场研讨现在开始。上半场主要是围绕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 30 周年，大家对基金会的过去、现在、将来进行了讨论，对于我们基金会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跟鼓励。下面，我们想通过研讨活动，纪念基金会成立 30 周年。下半场的主题是“稳经济、促改革、进一步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中央主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同时，我们也要稳定经济，以促进改革来推动对外开放。两者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我们非常荣幸和高兴地邀请到四位重量级嘉宾，给我们做演讲。第一位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席余永定，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余永定老师给我们做主旨演讲！

余永定：关于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几点思考

余永定（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席）：首先，对基金会表示热烈祝贺。我也跟大

家同甘共苦了 30 年，从一开始我就参与了，这次看到很多老朋友，感触良多。

我的题目是“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几点思考”。从 1979 年以来，中国在过去 43 年确实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迹。1979 年中国的 GDP 只是 7800 亿美元，是日本的 17%，2010 年中国追上了日本，去年中国 GDP 是日本 4.2 倍，听起来怪吓人的。中国确确实实创造了了不起的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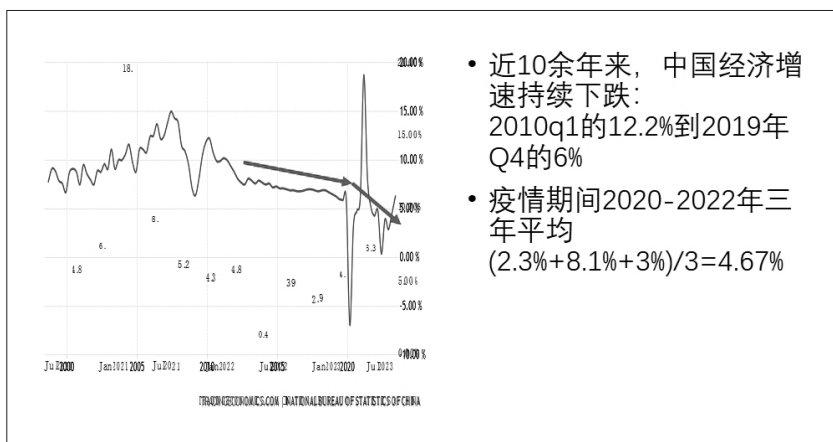


图 1：中国奇迹结束了吗？

但是最近 10 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跌，从 2010 年第一季度 12.2% 降到 2019 第四季度 6%，我们看到中国进入持续下跌的阶段。在疫情期间，平均增速是 4.67%。今年第一季度还好，中国表现还不错。第二季度，中国情况不是很好，在基数很低的情况下没有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于是，在国际上关于中国撞墙，中国走在危机边缘等声调越

来越高，看西方的言论，感觉都在看中国的笑话。

Larry Summers.

- "As with Russia and Japan, this reflects the fact that countries whose growth **is driven by super-high capital investment in manufacturing eventually hit a wall,**" he added.
- "On top of that, China's export growth engine is stalled by a lack of global willingness to accept more of its production, and its infrastructure and real-estate sectors **still must work off the massive overbuilding of recent years,**" the former Harvard president continued.

Paul Krugman

- China seems to be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a crisis** that looks a lot like w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nt through in 2008.
- with a real estate sector **even more swollen** than those of Western nations before 2008. China also has a large, highly troubled shadow-banking sector. And it has some unique problems, notably huge debts owed by local governments.
- **suppresses private consumption**, bu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mask it largely by creating an immensely bloated real estate sector. This strategy, though, was unsustainable. China's current predicament was only a matter of time.

图 2：美国关于中国经济撞墙的各种说法

这是美国关于中国经济讨论的一些原文。这个问题我们上次讲过，今天就不多重复了。在认识中国经济形势、考虑中国应该采取什么经济政策的问题上，我们有些方法论的错误，现在可以专门来谈这个问题。这种错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逻辑错误，这和是否学过经济学无关，是逻辑不对。还有一个是经济学理论有问题，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去细讲这个问题了。

简单讲一下美中宏观经济政策不同的结果（图 3）。大致来看，美国宏观经济政策是 QE 加零利率，这个政策受到广泛的评议，但是实际结果是美国创造了 1850 年以来最长记录的经济正增长，120 个月，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

中国从 2010 年第一季度开始不断下跌，几乎每个月都在下跌。我们的政策，我不知道怎么概括，官方文件上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加稳健的货币政策。什么叫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不知道有没有消极的财政政策这种说法。如果你收缩货

币，货币政策是稳健还是不稳健？如果你扩张货币，货币政策是稳健还是不稳健？咱们的提法比较模糊，比较中性。咱们是学术讨论会，我就直言不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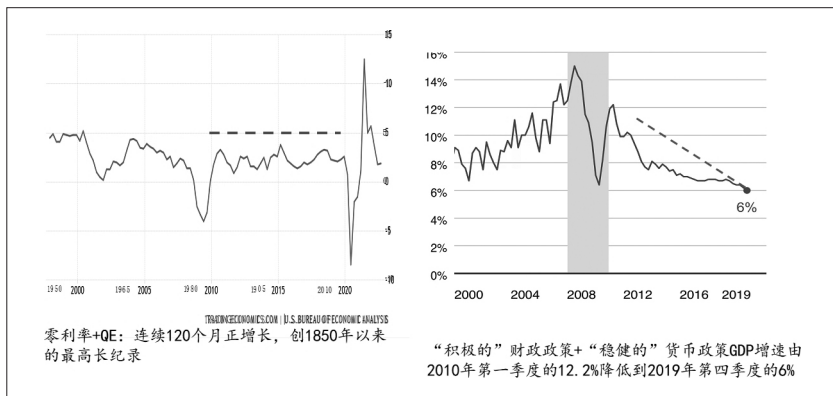


图 3：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不同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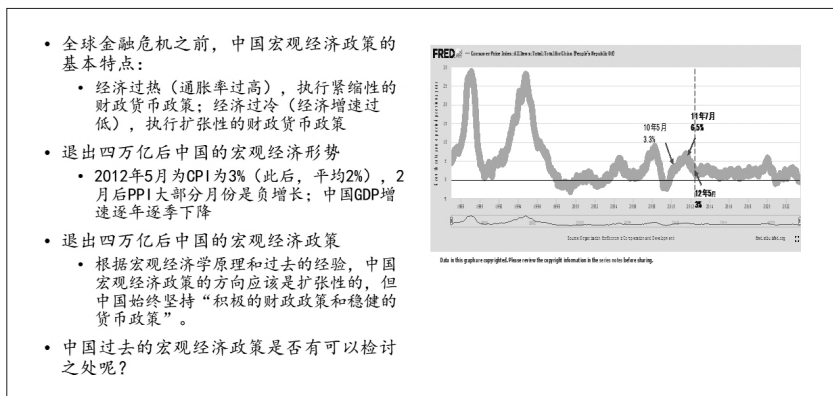


图 4：2008 年后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形势

基本形势是怎么样？我们回顾一下。在 2018 年之前，中国基本上经济过热。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经济又过热，又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我们管它叫周期。经济政策的目标一般

来讲，是要争取一个尽快、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速，所谓紧运行，这是过去 80 年代比较时髦的一种说法。你采取一系列措施，使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之后，往往导致这几个季度，比如说 4 个季度，通货膨胀起来了。这个时候就把政策重点转为抑制通货膨胀，当你抑制通货膨胀时，很快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下跌，下到一定程度，通货膨胀也过去了，这个时候我们又重新踩油门，让经济上去。看起来好像有些波动，却是非常实事求是的正确方法。结果说明一切，既然如此，我们政策就是正确的。

2008 年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简单来说，2012 年 3 月我们的 PPI 进入负增长，连续 54 个月，后来多次重复这种情况。所以，2012 年以后中国的大部分时间，从 PPI 角度看经济处于负增长，2019 年后又十几个连续月负增长。我们比较重视 CPI，CPI 在 2012 年 5 月份之后打破 3%，以后持续下降，基本上处于 2% 这种水平。2% 的通货膨胀率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是相当低的，发达国家还定了 2% 的通货膨胀目标。从 2010 年，特别是 2012 年之后，中国基本状况是通货膨胀很低，PPI 是负增长，我不把它叫通货收缩，通货收缩概念有争议，总而言之我们的物价增长速度是很低的。

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增速是在持续下跌的，这样一种经济增长跟 80 年代、90 年代的那种是不一样的，那时候一会儿踩刹车，一会儿踩油门，摇摇晃晃，车是在高速的行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经济增速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吗？

我相信是不可避免的，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中国经济不可能永远保持 8%、9%，甚至 10% 的增长速度。但是中国经济能不能保持 6% 或 5% 的增长速度，这个就很难说了。所以我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够事先设定中国经济增速能达到多少，对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10 个经济学家有 10 种不同的算法，而且差距还不小，你到底听谁的？所以还是用一种非常实用的方法，我们来试，过去就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看着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看着通货膨胀率很低，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我们当然还要考虑其他许多其他因素。但是我们是不是有些可以总结的地方？

最近一段时间我就比较仔细地看过去 10 年所有工作报告每年的提法，看中国持续的经济表现，得出一些感想。我的结论就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即使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这样，也比美国强很多，美国今年上半年 2.2%，下半年估计 2%，明年美国经济年初会负增长，明年全年是 0.8%，所以我们不跟他们比。

对于过去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我总结了几条。

第一条，未能准确区分“产能过剩”的不同性质。我过去是过剩产能压缩派，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没有特别细致地区分什么样的过剩产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一种产能过剩是所谓结构性的，企业盲目投资，行业盲目投资，出现了产能过剩，过去我们经常讲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确实存在着这种结构性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有许多产能过剩，或者某个行业的产能过剩，在某种情况下

是我们紧缩过度的结果。比如，2012 年一些企业老板说生产一吨钢的利润不够买一根冰棍，这确实存在结构性问题，也跟我们退出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太快有关。

- “产能过剩”是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出现频率最高的主题词之一。
- 2012 年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两吨钢的利润“不够买一根冰棍。”
- 产能过剩是企业过度投资的结构性问题还是宏观增速过快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财政赤字率 09 年 2.8%；11 年 1.1%。新增贷款 9.6 万亿元；11 年 7.5 万亿元
- 总需求急剧下降（2012 年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都急剧下降）
- 是“关停并转”还是增加有效需求：黄奇帆的解决办法。不同方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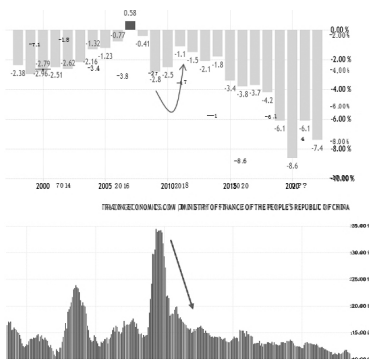


图 5：未能准确区分“产能过剩”的不同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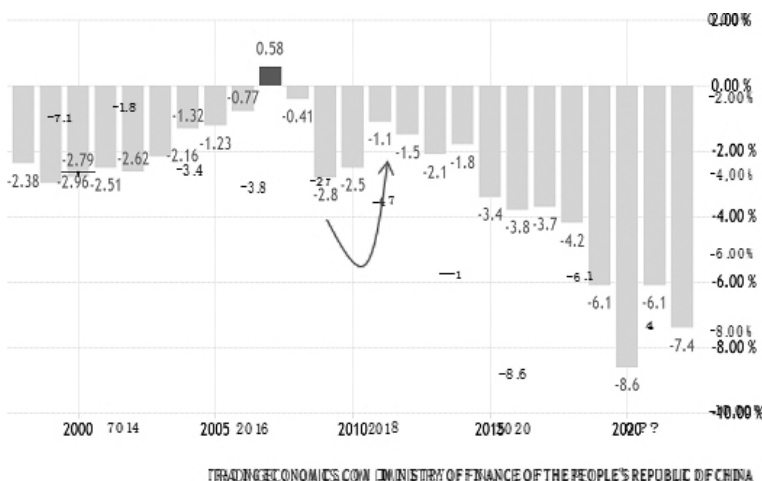


图 6：中国财政赤字

从图 5 可以看到，2008 年我们的财政赤字是 2.8%，到 2011 年减到 1.1%。美国可不是这样，美国不断在增加，比咱们高得多，当然它也进行过调整。2009 年，咱们新增信贷 9.6 万亿，确实太高了。后来第二年减到 7.9 万，第三年 7.5 万，极大地压缩了。原来是极大扩张，突然猛一转弯，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产能过剩。这种产能过剩就不一定是结构性的，可能是们紧缩过度造成的。当然事后说很容易，在当时是很难把握的。这里我不得不佩服黄奇帆，黄奇帆当时就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办法解决这种产能过剩，我们建筑材料用钢量远远低于世界标准，为什么我们不能多用？采取这种方法，我们的建筑质量过关了，产能过剩也会解决。

第二条，稳房价目标对以保增长为最终目标的宏观调控形成干扰。2011 年开始调控房地产，那时房地产比较困难。然后 2013 年上海房价猛然上涨，2014 年第二季度从杭州开始房价猛然下跌，2015 年极为放松，2016 年房价又上去了。我们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要考虑房地产价格，货币政策的目标中应不应该包含资产价格，这个事情可以讨论的。如果我们把房地产价格作为一个调控目标，那么货币政策和一些限价、限贷、限购政策叠加起来，会对经济产生一种下降冲击作用，这个我们应该仔细研究。我个人强烈反对对房地产过分投资，我认为跟其他国家比，中国房地产投资在 GDP 中的比重太高了。但是另外一条，中国房价确实很难说是不是泡沫。从房价开始上涨到房地产泡沫，这段时间大概是 13 年，美国是这样，日本是这样，他们都是涨了

4 倍。在同样的时段内，中国还不存在房地产泡沫的情况，我们涨了 1.6 倍，比他们低得多。另一方面，从房地产投资在 GDP 中的比重来讲，我们比美国、日本要高得多。我认为这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我们应该把更多的资金用于其他方面，哪怕是基础设施，最好是支持创新产业，使这些产业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我相信，房地产时代大概是过去了，但是房地产问题我们一定要处理好。

第三个问题，过于强调财政平衡。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2011 年财政赤字率由 2009 年的 2.8% 降到 1.1%。2013 年经济受到下行压力，政府坚持“不扩大财政赤字”。2019 年，李克强召开的会议我去参加了，当时特别想强调所谓《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财政赤字对 GDP 的比不能超过 3%，国债对 GDP 的比不能超过 60%。这些是毫无理论根据的，而且西方国家全部都抛弃了这两条标准。你看看日本，看看美国，完全都抛弃了。这个问题我受到日本经验的深刻影响，1996 年我常常到日本去，他们对我说：我们现在财政赤字占 GDP 超过 4%，国债占 GDP 超过 92%，非常危险，如果不马上纠正财政不稳定问题，日本财政将会崩溃，所以我们必须要马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越快越好。他们想把财政赤字压回到 3%，使他们国债占 GDP 的比经过几年之后稳定到 60%。于是在 1997 年，日本增加了消费税，还减少了财政支出，日本经济一下子就下来了。所有这些杠杆都是分子比分母，减分子的结果使分母减得更多，日本杠杆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现在日本国债占 GDP 的比

是 261%。当初 92% 的都受不了，现在 261% 还没有完蛋。这些年日本经济不是特别好，最近有所好转，但是它的财政并没有崩溃。很简单，它的利息率是零，有的时候是负的。我们不必死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标准。

第四条，财政政策过于强调减税降费，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主要来自增支而不是减税。我认为，这是深深受到供给学派的影响。供给学派给里根出过主意，给特朗普出过主意，减税对经济增长是有刺激作用。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要点是增加财政支出，所以拜登政府完全反过来。我不说拜登政府完全对，但是要说明一点，特朗普是失败的，里根政府的财政政策也是失败的。我是 70 年代后期到社科院，当时我办的杂志，封面叫“财政黑洞”，就是里根政府的财政问题越来越严重，失控了，经济增长上不去，供给学派的说法根本没有被任何主流经济学家承认，但在中国很有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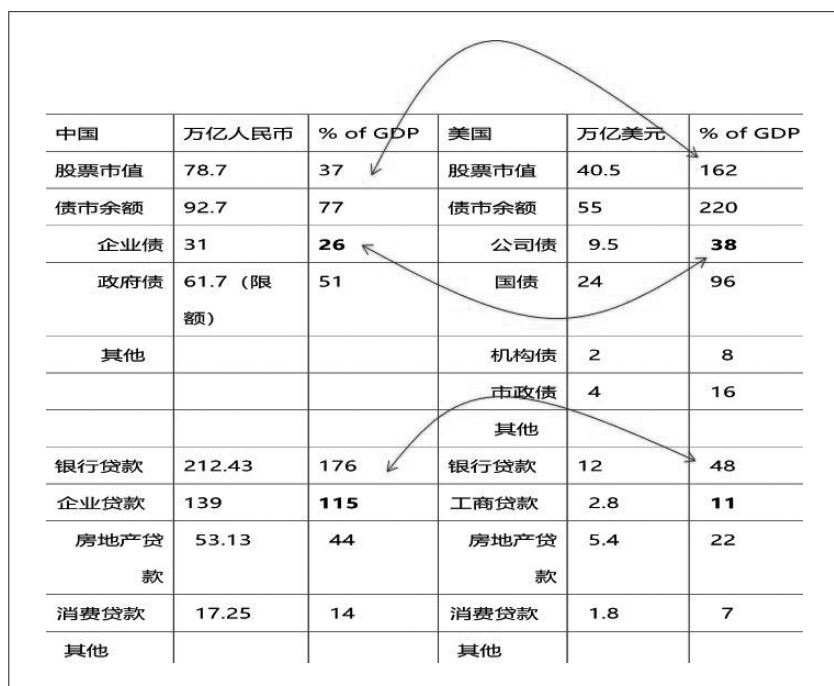
第五条，政府一般公共预算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持力度太小。在 4 万亿的时候，政府出了 1.18 万亿，剩下的是地方政府自己找钱。我们应该看到，在后来，中央一般公共预算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持力度非常少。在 2018 年之后，不超过 0.3%，2021 年中央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持大约只占了 0.1%，都是这么一个占比。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的支持力度高一点，一般在 10% 左右，还有专项债，还有政府性基金，所有东西加起来不超过 40%，大部分钱要靠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去筹资，或向银行借。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要让地方政府担负起搞基础设施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重任，同时又不给钱，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很多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是比较高的，那么地方政府陷入债务问题，应该说是难以避免的。当然，话又说回来，地方政府的问题也非常严重，有很多贪污、低效的问题。我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没有问题，只是从中央角度来讲，想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提高基建投资，中央政府就应该多发钱，多发钱意味着多发债，多发债意味着不要死守 3%。我觉得要实事求是，现在要使我们经济增长稳定下来，我们还有很大的财政政策空间，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增加财政赤字，多发国债。如果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国债市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水平 and 能力将会有非常大的提高。

第六，过度强调留有余地，保留政策空间。2011 年 GDP 的实际增速是 9.1%，2012 年 GDP 的增速目标却是 7.5%，我不知道为什么明明上一年增长是 9.1%，上一年通货膨胀率也并不是那么可怕，当时温家宝总理提出现在主要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在当时是非常难以判断的，这绝对不是批评谁。以后很多年都是这样，都是要低几个点，这跟 80 年代、90 年代财政状况是不一样的。这么做的目的，是引导各方面把中国的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来。我不知道这两者的关系是否这么密切，实践已经说明了问题。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最基本特点，有两条非常重要。第一点，中央提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

突出矛盾”，多年以来没有见到过的提法，这种提法非常正确，而且给我们指明了宏观调控的方向。第二点，消费是收入的函数。用什么来推动经济增长，靠发钱吗？我有点怀疑。如果收入不能增长，如果收入预期不能改善，消费会增长一段时间，会在一定程度上增长，但不可能持续增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必须要上去，这样消费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所以我觉得当前应该积极贯彻中央的这两条，把这两条落实，中国经济是能够稳定下来的，甚至反弹到某一种程度。



中国	万亿人民币	% of GDP	美国	万亿美元	% of GDP
股票市值	78.7	37	股票市值	40.5	162
债市余额	92.7	77	债市余额	55	220
企业债	31	26	公司债	9.5	38
政府债	61.7 (限额)	51	国债	24	96
其他			机构债	2	8
			市政债	4	16
			其他		
银行贷款	212.43	176	银行贷款	12	48
企业贷款	139	115	工商贷款	2.8	11
房地产贷款	53.13	44	房地产贷款	5.4	22
消费贷款	17.25	14	消费贷款	1.8	7
其他			其他		

图 7：中国的金融结构与企业高杠杆率

日本	262
意大利	151
美国	137
西班牙	118
新加坡	118
加拿大	113
法国	113
欧元区	95.6
德国	69.3

图 8：西方国家的国债 /GDP（%）

最后强调一下，我们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空间是很大的。西方国家说中国企业杠杆率太高，但是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的融资结构，就会发现主要问题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太不发达了。从图 7 可以看到，去年中国股市市值 78.7 万亿人民币，美国是 40.5 万亿美元，中国占 GDP 的 37%，美国占 162%，非常强烈的对比。美国公司的融资主要来源于资本市场，咱们股票的情况今年可能更惨。中国的企业债占 GDP 的比重是 26%，美国是 38%。关键是银行贷款，中国企业的银行贷款占比重的 176%，美国才 48%。所以美国是严重依赖资本市场的。我们想要降低杠杆率，一个非常关键的做法就是必须大力发展健康的资本市场。现在资本市场没

搞好，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搞好了，中国企业杠杆率太高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债务的空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中国官方宣布的显性债务是 50% 多，如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是 102%，但它这个定义里很多东西是错误的。即便如此，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比日本、意大利、美国、西班牙、新加坡、加拿大、法国这些国家都好，比德国稍微差一点。我们有充分的空间用，我们有良药来治病，我们要把药留到某个时候再用。

一直说咱们劳动生产率低，实际上中国劳动生产率在世界名列前茅的。ICOR 这一项中国低于印度（图 9），我们的政策是有效的（ICOR 即增量资本产出率，是投资与经济产出增量之比。增量资本产出率越小，投资效率越高）。

总结一下，我们应该尽快打消各种顾虑，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中国有足够的政策空间稳定经济增长，并解决房地产企业爆雷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解决房地产企业爆雷做法，世界上有很多先例，我们完全可以采用。第一，通过各种手段防止这些企业的资产价格进一步下降；第二，给这些企业足够的流动性，不要因为流动性而违约、垮台。还有一个可能更重要的，是实行临时的国有化，这个在许多国家都干过，美国就干过，一干就好了。而且很多问题什么事都不用干，只要央行或某个领导说句话，形势就稳定了。比如欧债危机的解决，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说了一句话：我们政府保证把你们不买的国债都买

掉。就这么一句话，国债市场就稳定了。

国家	ICOR
中国	7.2
印度	7.9
美国	10.8
俄罗斯	12.7
巴西	15.8
加拿大	16.5
欧元区	22.1
法国	23.7
德国	34.6
南非	60.3
英国	24.3
意大利	130.0
日本	-147.1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图 9：增量资本 - 产出率 ICOR：国际比较

关于地方政府债，债务重整、债务置换我们现在都在做，也完全可以控制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关键问题是，我们现在没有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我们担心的是发生通货收缩。我们有充分的财政政策空间，有充分的货币政策空间，如果充分利用好，完全能够解决我们目前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在若干年，我不知道多少年，维持较高经济增速 6% 应该是可能的，至少可以试一试。如果现在不试，由于经济学上

的所谓磁滞效应（hysteresiseffect）和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累积作用，你以后想增长也增长不了，机会窗口就永远关闭了。我想强调一点，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仅仅是维持稳定较高经济增速的必要条件之一，不是充要条件，改革和结构调整也是必要的，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这里就不多讨论了。谢谢大家！

乔依德：首先非常感谢余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精彩的演讲。有很多人听过余老师的演讲，他的演讲主题比较鲜明，层次清楚，而且他的基本观点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改变，就是希望政府能多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能够加大一些力度以稳定经济。在座各位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提一两个问题。

赵广彬：余老师，你怎么看待国际上现在普遍看衰中国经济？

余永定：这是他们希望的一种表达方式，只有这么说，然后才可能影响你去争取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要保持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不纯粹是经济问题，这是地缘政治问题，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谁高兴，谁不高兴，你自己应该把想清楚。

吴信如：这段时间人民币贬值的趋势比较明显，你怎么看？

余永定：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多少年了，在上海说过多少次了。我最近不太关注这个了，理由有几个。

第一，我认为汇率几乎是无法预测的。我一直强调，破 7 不破 7 没关系，“一旦破 7 一泻千里”这种事情不存在，

这是我基于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信心。中国汇率会调节，但是不会大幅度下跌，中国不是土耳其，不是那些国家。

现在为什么跌呢？很清楚，因为资本外流，我们贸易还是顺差的。资本外流有各种各样的复杂原因，到底外流了多少，也有不同看法。我认为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让中国和外国的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信心，有了增长，有钱赚，他的钱就流到中国，而不是流出中国。所以恢复信心是关键，我们的经济要增长。如果看好中国经济的人都没钱赚，一肚子怨气，那么原本看好中国发展的人也开始不看好中国了，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当然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但这不属于我研究范围。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使经济增速稳定下来，而且反弹，这样的话资金就会回流。我们国际收支是没有问题的，这方面真正有问题的是美国，美国 2006 年净外债是 1.8 万亿，去年是 16 万亿美元。1.8 亿时，大家都担心美国财政收支不平衡会导致美国出现危机，现在变成 16 万亿了，大家都不慌不忙不谈这个事，这里有大问题。我觉得，美国在未来可能会出问题，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不必太过于重视汇率问题，应该允许汇率浮动，尽可能不去干预它。

乔依德：最近 8 月份数据出来，经济有边际改善，这种情况下还需不需要你刚才讲的那些措施？

余永定：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也去问过市场上很多人士，看大家觉得怎么样？他们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如果

有根本性改变，上述的一些措施可能就没有必要，但是目前大众认为还没有根本性改变。所以我觉得，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赌，只不过概率高和概率低的问题。我认为从概率角度来讲，如果我们不采取比较重大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这种市场悲观情绪还将继续存在，会影响我们未来的增长。我们应该看到，经济确实有了好转，对这种好转我们应该大力宣传它，告诉外部人员，中国经济可能已经触底反弹了。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讲，还是往坏的方面想，多想点对策。

朴实：您认为下一个 10 年或者更长的时期，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有哪些？

余永定：这超出我的研究范围了。我感觉中国未来的希望就在于那些新的产业。华为了不起，突破 7 纳米，很有信心，尽管这凑合那凑合，但我们突破了，美国对我们芯片的封锁是失败的。还有比亚迪电动汽车，最近在德国汉诺威车展给了德国人极大的震动，朝野震惊，德国人问自己这些年干了什么，居然被中国踩到这个样子，可见我们成绩多么大。另外商飞 C919 的 1061 架订单也是非常了不起。总装集成是最难的，日本放弃了，韩国放弃了，我们没有放弃，我相信假以时日我们会继续突破。一旦我们这边成了气候，我们过去的很多假说就全成立了，供给决定需求。什么叫供给能决定需求？就是新兴产业能决定需求。华为手机出来，你就买了。在没有什么突出变化的时候，要着重于总需求，但是如果新一代产业起来了，我们过去所希望的都能变成实

际的了。我们中国经济增长不要太依赖房地产增长，不要太依靠基础设施投资，过去多少年制造业增长很大程度上受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这不是一种持久之路。中国政府现在强调这方面的重要性是完全正确的，希望政府继续加强政策支持力度，来支持这些企业。据我所知，一些企业，例如商飞，还是缺钱的，还是有经济方面支持的需要，希望政府考虑多给他们支持。

乔依德：下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杨伟民先生，他的主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六个重大问题”。五年以前我们请他来给我们做过演讲。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杨伟民老师表示欢迎！

杨伟民：我国经济发展的六个重大问题

杨为民（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非常荣幸来到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刚才余老师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报告，他讲得非常好，其中很多观点都很重要，有些，我也是同意的，当然不可能 100% 同意。只要是两个人，观点就不可能完全一样。

今年二季度中央政治局提出，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一季度比较好，二季度不太理想，8 月份又有所好转。现在来看，实现原来提出的 5% 的目标，问题不太大，但实

现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目标，面临很大挑战。我个人认为，解决我国现在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不能够仅靠宏观上的财政、货币政策。因为我国经济存在的一些内在的、机制性或机理性问题，仅靠宏观政策是难以解决的，需要兼顾长远，兼顾政策和改革统筹解决。

我讲几个问题：第一是居民消费稳定增长，第二是房地产市场稳定，第三是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第四是民营经济预期转好，第五是加快城市化，第六是进出口稳定增长。

这六大问题，既是当前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关键点，也是未来经济长期向好的关键点。

一、居民消费稳定增长

首先看总供求，2020 年总供求是相等的，但国内总供给比国内总需求大了 2.5 万亿元。本世纪以来的 20 年，我国的国内总供求一直大于国内总需求，供需之差就是进出口之差。2007 年达到之前的最高点 2.3 万亿，后来我们提出转变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来拉动，确实取得明显的效果。但是 2020 年后受疫情冲击，我们经济发展重回更多依靠出口拉动的局面，2020 年进出口之差扩大到 2.5 万亿。

现在来看总需求。我们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以后，总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内需比重提高，外需比重大幅下降，外需占最终使用的比例，从 2010 年的 22%，降到 2020 年的 16%。投资占比也在下降，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比重提高。

刚才是整个经济的总需求，现在来看工业的总需求。从

工业的最终使用即总需求看，10 年来，外需占比也是下降的，但是 2020 年，工业对外需的依赖仍然高达 40%，2010 年是 45%。这说明，出口减少对工业增长的影响大。现在的经济增长放缓，主要是工业增长放缓，服务业恢复的还不错，而工业增长放缓，主要是因为出口增长下滑。

近 3 年，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减少 14 个百分点，政府消费减少了 5 个百分点。投资提高了 5 个百分点，出口贡献率提高了 14 个百分点。经济发展方式重新回到过去的更多依赖投资、依赖出口的发展方式。

再看最终消费，最终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从 20 年的情况来看，最终消费中政府消费比重提高 4.5 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比重下降 4.5 个百分点，最近 10 年，政府消费在提高 1.14 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比重下降 1.14 个百分点。有关部门经常说最终消费率提高，投资率下降，其实总消费要分开看，政府消费率的提高掩盖了居民消费率的下降。

最近三年，受疫情冲击最大是居民消费。除了上面见过的支出法中的居民消费外，再看三个单项指标。第一个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三年年均名义增长 2.5%，实际增长 0.8%。第二个指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这里面包括服务支出，疫情对于面对面的服务业影响最大，所以消费支出增长更慢一些，实际增长只有 0.2%。第三个指标，住房消费，我国在统计上把住房消费统计在投资当中，但绝大多数人买房子不是为了投资，而是为了消费。所以，我认为住房消费是居民消费重要组成部分。2022 年，住宅商品房

销售面积 11.5 亿平米，比 2019 年的 15 亿平米减少了 3.55 亿，三年年均缩减 8.5%，今年上半年仍然不到 6 亿，全年可能比去年仍难转正，但下降幅度不会像原来那么大了。

从国际比较看，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例，我国比韩国低 7.8 个百分点、比日本低 21.5 个百分点、比美国低 30.7 个百分点。人均消费支出，我国相当于韩国的 29.8%、日本的 22.9%、美国的 10.1%。

以上，可以得出的结论和政策是：

第一，我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国内总供给大于国内总需求，持续 20 年都是这样。这意味着，只要有需求，就不愁增长。供给相对于需求是过剩，但只要有订单，马上就可以组织生产。21 年、22 年，包括 2020 年的部分时段，我们制造业迅速恢复，证明我们工业有强大的韧性。但是我们的边际增长是由外需决定的，21 年、22 年就是这种情况。

第二，最终消费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消费率提高的贡献，而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是在下降的。政府消费的扩大，主要集中在两大类。一类是公共管理，背后是公共管理人员增加过快，在所有行业当中，公共管理行业的就业增长速度仅次于建筑业，公共管理行业现在的就业人员大数 2000 万，最近 10 年增加了 500 多万。另一类是公共服务，我们这些年特别注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增长还是非常快的。但是这些公共服务对居民消费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挤压。如果政府没有收入，怎么去消费，政府收入增加了，若企业的收入没有变化，意味着居民收入受到挤压。看劳动

报酬占比是提高的，但从可支配收入占人均 GDP 的比例看是在下降的。扩大公共服务供给对改善民生有意义，但对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私人消费，因为公共服务支出仅相当于居民个人消费支出的 26%。

第三，当前的需求收缩，主要是居民消费的收缩，内需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不足。笼统讲内需不足，政策执行中就会去扩大投资以及政府消费。

如何恢复和扩大居民消费，要在思想上、观点上、理念上要做一些改变。思想认识决定政策。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毫无疑问就是以人民生活为中心，人民生活看什么，过去我们主要看居民收入，十八大首次讲 GDP 增长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翻番。此外，人民生活不仅仅要看收入，也要看居民消费。从疫情三年来的情况来看，居民收入是增加的，但是实际上居民总消费是收缩的，这个收缩主要是居民住房消费收缩。经济恢复，怎么恢复？居民消费要恢复到疫情前的规模和增速。因此，扩大居民消费，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更是发展的目的。过去我们往往把消费当作刺激经济的一个手段，增长是目的，消费是手段，正好搞反了，增长是手段，消费才是目的。居民消费是改善民生的实践标准。让实践来检验政策和工作，经济工作最终就是看居民消费到底是不是扩大了，这是我们发展的一个价值导向。一个地方的发展，最后要看老百姓的生活即消费有没有改善，若发展最终没有带来居民消费的扩大，这种发展是没有意

义的。

第二，自主消费、自主选择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什么是市场经济，过去以为，企业自主决策、自主投资，就是市场经济了。疫情期间，给企业减税降费是必要的，但还不够，如果企业没有营业收入，没有利润，减什么税呢。这个时候需要什么？需要消费者去购买。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企业来决定资源配置，消费者也在影响和引导着资源配置。我们经常讲要不干预企业正常的依法经营，没有讲或很少讲不干预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对消费的行政干预也不少，限房、限车、限购、限贷、限行。一出现问题，首先想到的办法是限制消费。应该确立一个消费者自主消费、自主选择的原则，这是市场经济一个重要原则，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重要原则。

第三，确立消费大国、生活大国的目标。我们一讲到发展，首先想到就是扩大投资，今年很多地方讲“拼经济”，一看就是集中开工项目，还是扩大投资。这些项目有些可能是必要的，但是有些是值得研究的。如，各地也在找民生项目，今天建个 XXX 馆，明天干个 XX 馆，后天再建个 XX 馆。但钱从哪里来，从银行来的，怎么还？投资上去了，增长速度好看了，这个债今后谁来背？最后，还是老百姓。我们有建设制造大国和生产大国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但没有消费大国、生活大国的目标。现在，我们到了从生产大国向生活大国，从制造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的阶段，各项政策要随之转变。否则，生产与消费循环不起来，增长必然的、

迟早要减速。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这要求改变以扩大投资为主的扩大内需政策，实行以扩大居民消费为主的扩大内需，工作重心转移到扩大居民消费上。

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行给居民让利的金融政策，以及给居民减税降费和加大转移支付的财税政策。降低利率，银行已经开始做了，但还有空间。2020 年银行业的营业盈余有 5 万亿，房地产的营业盈余是 3.8 万亿，两个加起来，相当于整个制造业的营业盈余，制造业只有 9 万亿。

对不同收入群体要实行不同的政策，比如说，对低收入群体，特别是疫情期间消费能力严重受损的群体，应该给予转移支付，应该给补贴；对中等收入群体，通过减少对他们的消费干预，让他自由买车买房；对高收入群体，要扩大高端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我们现在承认高收入群体，但是缺乏高收入群体相应的消费品和服务。

二、房地产市场稳定

最近十几年，我们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房地产企业、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三个主体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大家利益捆绑在一起，拉动了经济增长。最近 10 年，在 42 个行业中，金融、房地产、建筑业合计拉动了 26.5% 的经济增长，金融拉动 10%，房地产拉动 8%，建筑拉动 7%，制造业拉动了 19.4%。另外，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拉动了 7.4% 的经济增长，政府公共管理拉动 5% 的经济增长。

目前，随着人口达峰、对房地产的需求减弱，加上房地产企业、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风险敞口增多，再加上多年来的行政调控，特别是三线四档等政策，房地产行业已经连续六季度负增长，今年一季度转为为 1.3%，二季度又回到 -1.3%。

对房地产问题，也是一个思想统一、从而进行制度重建的问题。第一，居民住宅到底是不是达峰了？2015 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一个任务是去库存，即，“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打通房地产供求关系，促进房地产稳定增长”。但执行时，却变成了转杠杆，房价再次上涨。

现在房地产到底是不是达峰了？如果是达峰，就要按照达峰产业来调控，就要压制。问题在于，中国房地产表面上来看，总量上可以说达峰了，人均 38 平米，户均一套。问题是不平衡。中国有 9.2 亿城镇人口，其中 3 亿人口是非户籍人口。城镇户籍人口可能户均 1 套多，但非户籍人口在城市住在哪里，要不要考虑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

第二，3 亿流动人口能不能回去。按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统计，非户籍常住人口是 2.52 亿人，按农民工统计是 2.96 亿人。这 3 亿人，作为个体，相当一部分人会回去，但前赴后继，他的下一代又来了。2008 年、1998 年，包括疫情期间，有些人认为农民工要回去了，结果怎么样呢？短暂回去后，马上又回来了。因为现在中国的

城市运营以及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是离不开这些人的。哪个城市能离开快递小哥。所以这些人作为一个整体是回不去的。回不去了，要不要在城市解决他的住房问题？如果要解决，3 亿人需要多少房子？而且中国城市化还并没有完，即使按常住人口统计的也只有 65%。所以，城镇居民对房子还是有需求的。

第三，高房价的原因是什么。部分城市特别处一线城市的房价太高，为什么房价太高呢？是因为地价太高。中国四个一线城市住宅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例，最高的北京也只有 30%，最近 10 年，北上广深人口都是大幅度增加，但这 4 个城市居住用地增长大大慢于人口的增长，上海和深圳是减少的。居住用地占比低，跟财税体制有关系，也跟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重生产、轻消费，先生产、后生活的观念有关。

所以，保持房地产长期稳定，既需要短期政策，更需要长期的制度供给。短期，主要是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长期，要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推动形成房地产业发展新模式。这个问题，我后面还要讲。

总之，房地产问题，既是一个短期调控和风险管控问题，更是一个住房制度，以及由住房制度所决定的房地产发展模式的重建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改革问题。要统一思想，多部门协同、制定综合性、长期性、制度性的房地产新政，明确与房地产相关的土地、税收、金融、公积金、预售、租赁、租售同权等的制度安排。这虽然是长期工作，但现在就

要赶紧做，不能久拖，这样才能给购房者、租房者、房地产企业、金融机构以及给地方政府一个长期可见的预期，市场才能稳定，房地产业才能稳定发展。

三、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过去 10 年，信息技术服务业年均名义增长 17.6%，其中的互联网行业，即平台经济 2017 年到 2020 年，年均增长 36%，有力拉动了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推动创新和改善民生。过去 10 年，42 个大行业中，增长最快的是研发行业，研发中相当大一部分也是平台企业。但 2021 年一季度以来，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开始减速，从 2020 年四季度的 21% 降到 2022 年二季度的 7.6%，今年二季度增长 14.6%，同疫情最严重的 2020 年一季度持平，因此，信息技术服务业仍有加快发展的空间。

当前，青年就业问题严重，6 月份青年失业率超过 21%，去年最高的毕业季 7 月份是 19.9%，现在没到 7 月份已经超过 20%。过去 10 年，信息技术服务业是吸收就业的主要行业之一，累计新增就业 300 万人。目前，吸收就业多的行业，近几年预期都不太好，发展减缓，如房地产、金融、信息技术服务业、教育、医疗等。

针对信息服务业预期转弱、增长放缓的情况，2022 年一季度中央政治局强调，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2022 年二季度强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对平台经济实施

常态化监管，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今年一季度中央政治局继续强调，推动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鼓励头部平台企业探索创新。

中央如此重视平台经济的发展，是因为数字经济是未来经济的主要形态，是未来拉动增长的两个主要动力之一（数字化和绿色化）。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平台企业是平台经济的主体。平台企业在推动科技创新、增强国际竞争力、引领经济发展、扩大就业特别是大学生就业等方面起着带头、带动作用，没有平台经济，就难有未来的增长。

四、民营经济预期转好

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具有“五六七八九”的地位，同时，贡献了 50% 以上的工业、50% 以上的投资、50% 以上的出口。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三重压力”中的预期转弱，当时主要是指民营经济预期转弱。前两年私营工业企业增长一直快于全部工业和国有工业，2022 年后开始减速并低于国有工业，今年以来，私营工业增长仍在下滑，7 月为 2%，8 月有所回升，为 3.4%。2022 年开始，民间投资增长也呈下降态势，今年 8 月为 -0.8%。民间投资的疲弱，既有疫情的影响，也有非经济政策带来的预期转弱的影响。

过去十年，吸收就业主渠道是民营经济。稳就业中更难的是青年人口就业，特别是大学生。青年就业，主要是民营

经济特别是其中的房地产、金融、信息服务、教育卫生行业的预期转弱。2021 年同 2019 年相比，其他单位（民营）在教育、卫生、文化、社会组织等行业减少了 115 万个就业岗位。

中央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去年召开的二十大，首次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方针。最近又出台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 31 条，目前正在贯彻落实。同时，有几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强化研究。第一，市场准入。我们说对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在法律上同等公平对待，在政策上一视同仁，这是写到党的十九大报告里的。后来提出“红绿灯”。需要讨论的是，是制定一个红灯、还是绿灯。如果制定红灯，就是一个负面清单，就是在这些领域，民营经济不要投了，意味着红灯以外都可以投。制定一个绿灯清单，就是明确民营经济哪些可以投，是一个正面清单。

第二，理论研究。“31 条”提到了要“加强理论研究”，但是没有具体展开。为什么会屡屡出现对民营经济不正确的议论？原因之一是我们在理论还需完善。要加强对于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基本经济制度当中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研究，要从理论上将这三点进一步阐释清楚。

第三，依法治国。在经济治理、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市场监管等等各个方面，都要依法。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过去 10 年来做好经济工作要坚持的五个基本经验，当然也可以说是六个，其中一个就是要推动经济在法治化轨道上运行。从市场经济改革和法治建设角度来讲，我们法治

上还不够完善，政府如何依法进行经济治理，企业如何依法经营。

第四，政商关系。要明确哪些要问责，哪些要追责。让各级领导干部安心、放心地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

五、加快城市化

现在扩大内需不是没有办法，我们 9.2 亿城镇人口中，有 3 亿人是非户籍人口，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在就业地是没有房子的，至少没有功能比较齐全的稳定住房，相当一部分人居住在城中村。当然并不一定要在就业地买房子，有房子也包括长期的租赁住房。

2008 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当时在国家发改委任副秘书长，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改革措施，积极解决农民工定居问题”，中心思想就是扩大内需的政策不能忘记农民工这一最需要帮助的群体，积极财政政策的阳光雨露也应该洒在农民工身上，建议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拿出一部分资金，帮助他们解决居住问题。

现在看，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面临两个难点，一是户籍制度，二是住房制度。放开户籍，现在已经没有吸引力，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在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在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产权。多年的实践证明，放开部分城市户籍限制，很难真正解决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的问题。因为农村的户籍是同集体所有制挂钩的，放弃了农村居民的户籍，等于放弃了承包地、宅基地、以及集体经济的产权。所以，可以研究身份证制度改革来替代放开户籍，即身份证按常住地的住

址登记，不再按户口所在地的住址登记，并据此划分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持有城市住址身份证的人口，就是城市人口。登记的住址，可以是产权房，也可以是租赁房。这样，可以解决农民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的问题，否则，没有很好的教育，他们的第二代仍然是农民工。

二是住房制度。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去库存”的思路是：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要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之后的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之后，十九届四中、六中全会，以及二十大仍强调加快建立这样一个新的住房制度。

当前，在扩大内需中，应启动主要面向农民工的安居工程，利用空置工业用地、过剩商业用房等建设或改造低价住宅或公租房，同时，扩大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的居住用地供给，主要来源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空置的宅基地。

六、进出口稳定增长

我们要纠正一个观念，不能简单用“三驾马车”看待进

出口在国内国际循环的地位。2022 年，外需占总需求的比例是 3.3%，国内大市场占总需求的 97%。但国内大市场不等于国内大循环。循环不仅是一个市场问题。2020 年，我国 16 万亿进口中，74% 是用于生产的。进口占全部中间使用的 7%。若无进口，国内生产将缩减 7%。进口已在国内生产中融入了国内大循环，也就是说，国内大循环本身已经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结果。16 万亿的 74%，在 365 天的每一个 24 小时进入到了我国的生产过程。如果没有进口，即使不考虑产业链影响，生产也将萎缩 7%。我国自有资源不足，难以支撑 100 万亿的经济和 14 亿人口的美好生活。十年来，没有初级产品进口的成倍增加并融入国内大循环，我国经济不会增加到现在的 100 万亿。过去，出口是为了换汇，为了买设备和进口技术，现在，出口更多是用来买铁矿石，买大豆，买原油，否则经济就没法运行、没法循环。

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未来的实现现代化，都离不开扩大对外开放，离不开对外贸易。所以，要纠正国内市场足够大，足以拉动经济增长的认识，对外资，对外需，对外贸要有足够的重视。

要学会在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扩大开放的本领，提高在矛盾挑战增多的国际环境中扩大开放的能力。我国已经到了必须扩大制度型开放，才能进一步扩大商品流动型、要素流动型开放的阶段，要主动对接国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体制改革，通过制度型开放，引领贸易和

投资继续壮大。为此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推动经济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研究务实管用的稳定进出口和外资企业的增量政策，想方设法留住外企、民企的出口龙头企业。研究采取特殊政策如通过减税弥补美国加征关税对我出口企业的损害

最后，我简单总结一下，我同意余老师说的我国经济有潜力，长期向好，但到底是 6% 还是 5%，这都可以研究，但我国经济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问题就是红利，什么叫红利？把问题纠正了，就会变成经济增长的动力。解决好这些问题，首先要统一思想认识，思想认识决定政策，决定改革。统一思想认识，需要广泛的讨论，甚至争论。

以上，是我对六个问题的认识，谢谢大家！

乔依德：时间比较紧，杨主任讲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六个问题，这六个问题都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关键的，由于时间有限，他提到的很多观点都很重要，特别是关于“双循环”，中国内循环不能单纯误解为只要我们有一个国内大市场就够了，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话，我们还留点时间，简单提一两个问题。

嘉宾：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好，给我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人很多新的信心，这些问题能解决就是红利。我们担忧，这些问题好像不太能解决，中央三令五申讲要多渠道增加住房供给，已经提了很长时间，我们看到北京、上海这样一些城市就是没有增加，像挤牙膏一样在弄地，农民工户籍的问题，我看原来有政策，只要拿到城市户籍就把在农村的地给

取消掉，但是也落实不下去。

杨伟民：农民工不相信。法律规定如果放弃户籍就没有土地了。

嘉宾：像民营企业的问题，有些省给民营企业派党委书记，这些省领导还一个一个都被提拔了。您给我们提到的这些事，实际上解决不了。

杨伟民：还是要有信心，这些问题解决确实需要一个过程，解决问题要统一思想认识，统一思想认识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我说服你，你再说服我，这个需要讨论和争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前提，我觉得是需要大家多说、多讲，思想认识变了，政策就好变了。

乔依德：以后还有机会进一步讨论，由于时间关系，不能拖得太长。下面热烈掌声对杨主任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

下面我们要讲开放，由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先是给我们做视频演讲。

黄奇帆： 新时代、新格局下我国开放的新特点、新任务

黄奇帆（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重庆市原市长）：各位老朋友，各位好兄弟，非常高兴参加今天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30 周年的活动，30 年前我们就是好朋友，都是共同为上海发展出谋划策奋发努力

一起干活的同事，所以我非常愿意来参加今天 30 周年的活动。本身因为国资委在山东有个活动，比较早的跟我就约好了，无法分身，今天只能采用视频的方式跟大家一起做个交流。

按照基金会 30 周年活动主题，我想谈一下新时代我们国家更高水平开放，更深层次开放，更宽领域开放的新特点和新任务。分两个部分：

首先讲新时代，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五个新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形成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五个显著特征。第一是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引进外资方面，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的背景下，外商对中国投资不降反增，近 10 年平均每年吸引外资 1400 亿美元左右。2022 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更是上升到近 1900 亿美元。在对外投资方面，中国对外投资平稳发展，稳中有进，2022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1537 亿美元，流量规模首次位于全球第一。据统计 1979 年到 2012 年 34 年里，中国境外投资一共投了 5 千亿美元。仅仅在 2017 年到 2021 年这 5 年时间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就达到了 7700 亿美元，双向投资的特征很明显显现了出来。

第二，从扩大出口为主转变为既鼓励出口又鼓励增加进口双向并重。近 10 年，我们国家稳步降低关税水平，适度扩大进口，提升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事实上，当今世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因为出口的货物可能大量属

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料加工产品就可以了。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进口所需的外汇可能来自技术和服务贸易顺差，外汇纳入货币提款权，成为世界货币，各国直接结算。预计未来几年内，我们国家关税总水平由 2021 年平均 7.4% 降低到 5% 左右。我们国家主动降低关税水平，一是可以直接降低消费者的进口成本，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增加群众消费福利。二是有利于增加进口，促进实现进出口平衡，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创造条件。三是有利于新一轮经贸谈判占据主动，增强我们国家在世界经济舞台话语权。

第三，从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2000 年以前，我们国家各类国家级开放措施都是从沿海开始，80 年代 14 个开放城市在沿海，27 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也都在沿海，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提出的五大特区也在沿海，浦东新区、滨海新区都是在沿海。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任何新的开放措施，都是东西南北一体化开放。比如十八大以来，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雄安新区等战略的加快推进，中心部地区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日益加快，全方位开放格局日益显现。国家相继在 10 个中西部地区、5 个沿海地区建设 17 个新区，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均衡发展新格局。2010 年以前，中国 70 多个保税区都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无关。2010 年以后，保税区增加到 168 个，新增加的 70 多个保税区有 60 多个布局在中西部地区，当然也有十几个新增在沿海地区。所以现在中国 150-160 个保税区东西南北中均衡发布。再就是自贸

试验区，国家前后批了 21 个自贸区，其中东部有 7 个，中部有 7 个，西部有 6 个，再加上海南岛作为自由港的存在。开放本质上是一种理念，一种制度，一种办事的方式，和地理位置、区位无关。中国开放从过去以沿海为主，现在已经转变为全国东南西北中全方位开放，沿边和内陆协同开放的新格局。

第四，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准，转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2001 年以后，我们国家进入 WTO，外资金融机构在全国各地概念上都放开了，但这只是在部分条件上的开放，在准入前国民待遇、股权比例限制，以及营业范围上，内在的约束还是很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对服务业、金融业和工商产业准入前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各种限制都逐步取消，实现了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开放。比如在金融领域取消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期货公司、寿险公司的外资限制，制造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国别限制。在农业领域把小麦新品种和种子生产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国别不低于 34% 等等。现在中国开放度越来越高，今后这方面会有更大的提升。

第五，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改。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国际贸易国家，不管是投资领域还是贸易领域，中国都有重要的影响力和发言权。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要积极参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修改，一起参与

谈判，确立国际贸易规则中新的制度。所以中国不仅是适应了现行的国际贸易规则，而且开始介入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和修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在双边或者地区间自由贸易协定 FTA 新的贸易规则讨论谈判当中，参与各个贸易规则的讨论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在 2022 年正式生效。RECP 目前在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而中国正是 RECP 坚定的支持者。中国还与欧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 CAR 的谈判工作，并提出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更加深入参与全球新一轮经贸规则制定。另外“一带一路”倡议涉及世界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也体现了这一点

第二个专门讲一下，二十大确定我国下一阶段开放的五个新任务。党的二十大提出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为此部署了 5 个方面的开放任务。

一是要以推动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贯通内外循环。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由过去要素流量型开放转向为以稳步扩大规制、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让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成为全球要素资源配置的强大引力场，这就需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具体来说，一方面要内外贸一体化，实现同线、同标、同责，促进内外贸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依托开放平台开展内外贸一体化试点，打造内外贸融合发展平台，支持建设内外贸一

站式解决方案。再一方面，还要围绕我国对外开放长期存在的短板领域，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继续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同时要在国民待遇公平竞争、知识产权、环境保护、政府采购、公共服务等方面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在政府行为，法治化方面迈出新的步伐。

二是以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为重点，建设贸易强国。过去十年，全球价值链重构，主要是由密集型服务业所驱动，到 2030 年全球商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将因为智能制造等技术减少 10%，到 2040 年服务贸易占比有望提高 30% 以上。中国已经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要成为贸易强国，必须在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上发力。近年来，我们国家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但对比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高附加值的行业结构，我们国家 40 年来服务贸易发展速度，我们国家服务贸易存在着逆差规模大，结构效益不高等问题，对服务贸易发展领域的带动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已经连续 4 年召开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流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作为服务贸易中最具潜力发展空间最大的数字贸易，这些年发展迅速，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工业报告数据显示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的比重已由 2011 年 48% 增加到 2020 年 63.6%，数字贸易正成为全球贸易新形态，未来贸易发展的新引擎。可以预见，未来我国服务贸易占全部贸易额比重逐步提升，服务贸易中数字贸易比重将会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与货物贸易共同支撑中国贸易强国的建设。

三是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带动全域全方位对外开放。“一带一路”倡议到实施短短 10 年不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改变世界经济版图的时候，也在深刻影响和塑造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中欧班列开行和运营堪称“一带一路”的模范，沿线口岸经济、枢纽经济快速发展，为内陆城市对外开放发展拓展了新空间。迈入新征程，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突破一些瓶颈和障碍，加入形成以中欧班列为依托，沿线主要枢纽为支撑，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国际经贸合作大通道。其中特别是要考虑通过运力布局优化调整，为带动全域全方位对外开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比如说西通道开行运力，将由现在 9 千个专列，提升到 1.8 万个专列，而中通道、东通道年开行运力将从目前 6 千个专列一年，上升到 3 万个专列，潜力巨大。提升北上通道，将给东北地区开放带来新的契机，除了北上通道，还有西出的通道两大战略，还有南向大通道。其中一个西部陆海新通道，另一个是通过老挝、越南和缅甸三大通道为依托，面向中南半岛的南向通道。这些通道在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无缝连接在一起的同时，将带动相关区域对外开放迈上新的台阶。此外，全国各地依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条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空中丝绸之路、网上丝绸之路等等。

四是实施高标准自贸试验区网络建设。海南自由港建设已进入施工阶段，按照海南自由港总体方案要求，到 2025 年将实现通关运作，这将是一个里程碑。作为新时代改革开

放试验田，各自贸试验区主动对标国际经贸规则，形成了一大批创新探索成果。如何通过自贸港、自贸试验区探索，为我国和其他国家地区共同推进自由贸易协定服务。近几年来，美、日、欧发达国家正酝酿超过 WTO 高标准经贸规则，中国参与 RECP 也已顺利签署，正在申请加入 CPTPP。总的来看，国际经贸规则演进基本方向“三零”，更加强调营商环境趋同化，要求自贸港、自贸试验区更大的力度、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开展创新探索和压力测试。重点围绕高水平经贸规则所涉及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劳动权利保护，数字贸易，以及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开放等各方面形成突破。

五是以“人民币国际化+高质量走出去”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二十大报告提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责任步入到制度设计与行动有序发展新阶段。2021 年 12 月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提高到 2.7%，超过了日元。2022 年 1 月进一步提升到 3.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官方外汇储备构成数据显示，2022 年一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达到 2.88%，比 2016 年人民币刚加入特别提款权 SDR 货币篮子时上升 1.8 个百分点。从 2022 年 8 月开始，IMF 货币篮子政策生效，人民币在其中权重由之前 10.92% 上调到 12.28%。此外，我国与 40 多家央行和金融管理当局建立货币互换机制。特别是 2022 年 7 月，人民银行与香港金管局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改为常备协议形式，为人民币离岸市场健康发展提供制度型保障。接下

来，要在进一步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币互换和清算安排的基础上，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和贸易投资尽可能以人民币计价、收付、储备，在扩大使用中进一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将取得重大进展，预计人民币在支付结算中的比重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到 2035 年，人民币在支付结算中的比例将达到 17% 左右。

总之，我们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呈现五个新特征，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确定开放的五大新任务，既跟我们过去 40 年开放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这也将成为之后指导 2050 年开放的特征和任务。

我今天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乔依德：我们下午的研讨就到此结束。

晚餐主旨演讲

左学金（主持人，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监事、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各位好，按照会议议程，今天有一个晚餐主旨演讲。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金行长担任过很多重要的职务，包括财政部副部长，亚行副行长，现在他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行长。他本人不能亲自来，我们来看他发来的视频。

金立群： 坚持多边主义，树立和维护负责任大国形象

金立群（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尊敬的乔依德副会长，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非常荣幸视频参加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三十周年庆祝活动！由于我正在埃及主持亚投行理事会年会，无法线下参加，敬请大家谅解，期待未来有机会与各位当面交流。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大背景下成立的。30 年来，基金会为上海市的发展和开放做出了积极贡献，也成长为讨论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重大问题的高端智库平台，得到中外各界的广泛认可和赞誉。在此，我谨向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 30 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热烈祝贺！

今天的庆祝活动也是一场交流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思想盛宴。值此机会，我想结合亚投行的创立与发展进程，与各位分享对多边主义的看法。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5 周年。回顾 45 年对外开放进程，多边主义始终是中国所坚守的根本价值取向。习近平主席在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是多边主义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为增进全人类共同利益应有的担当。

中国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十年以来，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发挥了增长发动机、发展稳定器和全球议程推动者的重要作用。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以上，是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世界货物贸易总额在中国入世后翻了近一番。

——1998 年和 2008 年两次金融危机当中，中国再次展示了其经济的韧性，不仅有效保持了自身经济和金融稳定，而且通过 G20、10+3、APEC 等全球和区域多边论坛与各方开展广泛的宏观政策协调，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的重要贡献。在新冠疫情和复杂地缘政治形势下，中国确保了全球供

应链基本畅通和稳定，坚定支持和维护多边贸易则，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面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的诸多重大挑战，中国积极推动《巴黎协定》的达成和落实，并向世界庄严承诺 2030 年碳达峰和 2060 年碳中和目标，以及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为推动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重要支持。

2013 年 10 月，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提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这是中国新时代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为推动国际经济治理完善、支持全球发展议程提出的重要倡议。在亚投行的创建和运营过程中，习近平主席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对外系统阐释了中国倡议创建亚投行的初衷、亚投行的初心和使命及其治理和运营原则、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作用等重大问题。习主席指出，中国是国际发展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也是建设性的贡献者。倡议成立亚投行，就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推动完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动，有利于促进各方实现互利共赢。成立亚投行的目的是推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深化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亚投行应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成为推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的桥梁和纽带。习主席强调，亚投行是一个国际性的金融机构，其规章制度和运作要由各成员国协商决

定，并不是中国一家说了就算的。亚投行应该秉承开放包容的区域主义，欢迎所有有兴趣的国家积极参与，实现合作共赢。亚投行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并同现有多边开发机构相互补充，加强合作，共同致力于促进亚洲和世界经济繁荣。亚投行应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经验和做法，在治理结构、业务政策、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坚持国际性、规范性、高标准，确保专业运营、高效运作、透明廉洁。

回顾十年前提出创建倡议，近八年的良好运营，亚投行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洗礼中砥砺前行，在高起点上快速发展，不断诠释多边主义的价值与内涵。

第一，始终坚持互利共赢，促进共同发展。开业近八年来，亚投行通过各项投融资业务，在促进可持续基础设施发展、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深化区域合作方面不断发力。截至目前，亚投行董事会共批准 233 个项目，总金额近 450 亿美元，撬动总投资近 1500 亿美元。惠及 35 个域内外成员。这些项目包括交通、能源、城市发展、水资源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也涉及公共卫生与教育领域的社会基础设施发展。为推动全球共同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尤其是在绿色基础设施发展方面，亚投行在《中期发展战略（2021—2030）》中确立了到 2025 年实现气候融资占比 50% 的目标。截止 2022 年底，我们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投资规模超过 110 亿美元，占亚投行当年总投资额的 56%，提前三年实现中期发展战略确定的目标。今年 7 月我们实现了所有融资项目与《巴黎协定》相关目标完全保持一致。

努力帮助发展中成员，特别是低收入国家应对危机挑战是亚投行义不容辞的责任。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亚投行迅速设立“新冠疫情危机恢复基金”，以支持发展中国家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目前，已经向 26 个发展中成员提供了近 147 亿美元的快速资金支持。中国北京、重庆、武汉都受益于亚投行的抗疫资金支持。与此同时，对于受到内外冲击的斯里兰卡和遭受罕见洪灾的巴基斯坦，亚投行去年以来分别向其提供了 1 亿美元和 15 亿美元的纾困支持。

第二，始终坚持开放包容，合作推动全球发展议程。作为亚投行首倡国和第一大出资方，中国在筹建亚投行之初就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开放包容的区域主义，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各方共同打造这一多边平台，一方面在谈判中始终坚持民主协商，求同存异，平等待人，并不以老大自居；另一方面，中方不搞小圈子、小团体，一直敞开大门，广泛邀请美日欧西方国家参加。目前，亚投行已由 57 个创始成员发展到来自全球六大洲的 106 个经济体。这次埃及年会期间，理事会还将批准 3 个新成员，总数达到 109 个。我们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当中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同时包括大量发达国家，是成员数量第二大的全球性多边开发机构。在股份结构上，虽然发展中国家的股比占大多数，但西方成员的总股比也超过了 25%，在需要 75% 特别多数的重大事项决策上也拥有否决权。董事会和管理层遇事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以共识为基础讨论决定机构重要事项，不需要启动投票程序。大家和睦相处，共商发展大计，始终保

持融洽的合作气氛。这一平衡安排和独特优势为亚投行在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奠定了制度基础。

作为多边开发机构大家庭的一员，亚投行从创立之初就积极与各方一道协力推动全球发展议程。2022 年，我们专门成立了业务伙伴关系局，以进一步强化与各类机构的协同。目前，亚投行已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传统多边开发机构建立了稳固的伙伴关系，与包括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在内的 32 个多双边组织和区域金融机构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开展联合融资、知识共享、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合作，共同帮助低收入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我本人也参与或主持由 12 个多边开发银行共同参与的多边开发银行行长会议，推动国际对话，探讨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应对气候变化、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问题的多边方案。

第三，始终按照多边规则高标准、规范化运营。在内部治理上，亚投行参照多边开发银行的通行做法，设立了完备的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三层管理架构，确保每一个成员，无论经济体量大小，都有发言权，都会被尊重、被倾听。中国作为第一大股东也通过理事会和董事会来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亚投行还根据透明、公开、独立、问责的原则建立了有效的银行监督和问责机制，通过行长与董事会之间的合理分工以及开展行长履职年度评价等制度和机制，建立互信、推动高效决策。

在制度建设上，亚投行不断推进各项银行政策与内部治理准则的改进与完善，包括制定和修订《社会与环境框架》、

《融资运营政策》、《问责框架》、《采购政策》、《信息披露政策》等重要政策规则，并建立了受项目影响人群协调机制（PPM）、独立问责机制（IAM）等，严格予以实施，在项目执行和内部管理中避免腐败，化解环境、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矛盾。

在队伍建设上，亚投行章程明确管理层遴选应遵循“公开、透明、择优”的原则。将该原则体现在机构最高法律文件中，这在所有主要多边开发银行中还是第一家。亚投行的员工招聘也不局限于成员，而是面对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开放。目前，亚投行打造了一支来自 65 个国家和地区、以 500 个专业人员为核心骨干的高素质员工队伍。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将会有更多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优秀人才加入亚投行。

得益于我们始终坚持亚投行多边机构性质与合作平台定位，始终坚持国际性、规范性和高标准运营，亚投行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经受住了各种风浪的考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赞誉。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一直给予亚投行的最高 AAA 级信用评级。

亚投行的成功创建和运营是多边主义的胜利，体现了各国对和平、发展、合作的共同追求，也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领导力、公信力和感召力。2017 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美联社记者问我：亚投行的成立是否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成功？我回答道：“当然是！但也是其他 56 个创始成员的外交成果。毋庸置疑。”

面对百年变局，中国领导人站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上倡议创建亚投行，不断为其健康运营和长远发展给予战略指导。2020 年 7 月，习主席在亚投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开幕式上致辞中提出，亚投行应努力将自身打造为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与时俱进的新型发展实践平台、高标准的新型国际合作机构以及国际多边合作新典范。这为亚投行的未来发展指出了更高努力目标。面对交织叠加的全球性挑战，亚投行将迎难而上，继续高举多边主义大旗，与各方一道共创和平红利、发展红利、信任红利、治理红利。

最后，我再次感谢会议主办方的邀请。我也期待各位嘉宾继续关注和支持亚投行的发展！谢谢大家！

左学金：金立群行长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视频演讲，现在请大家享用晚餐！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政策刺激还是改革开放？

魏加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巡视员，研究员
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学术顾问兼首席经济学家

上海发展沙龙第 180 期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我们今天这个活动，时间很合适，炎热的夏天刚刚过去，开始凉快，前两天还在下雨。特别是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和高兴地邀请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原副部长、研究员魏加宁老师给我们做演讲。最近大家议论比较多的，就是关于中国经济到底怎么回事，应该以什么办法来解决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他的题目比较有针对性“到底是靠政策刺激，还是靠改革开放？”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魏老师给我们做演讲。

魏加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原巡视员、研究员，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学术顾问、首席经济学家）：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乔会长给我提供一个宝贵的机会，来到上海和大家交流，尤其是到锦江饭店，让我非常感慨。我第一次来锦江饭店是 1984 年，当时我给孙尚清主任当秘书，他那时带队在长江考察，我们从云南，金沙江，一直走到上海，考察了两个半月。可能是我头一次离家这么久，所以在

结束的晚宴上，在锦江饭店我喝多了。本来那天晚上要陪孙主任去上海社科院看他的同学，结果就没有陪成。所以从那以后，我发誓不再喝白酒了，我到现在依旧不喝白酒，这是一个感慨。

再一个是对上海的感慨，坦率的说，我们是亲眼看见改革开放以后上海怎么崛起的。我记得在 80 年代，我出国学习之前，赵紫阳总理给我们中心两个任务，一个是振兴东北工业基地，一个就是振兴上海。等到我从日本回来，第一次到上海来，陪着日本政府的海外基金、日本官方的金融部门过来。他们要求看浦东，我记得带他们去的时候，浦东简直是惨不忍睹，一片空地，办公室都是小的木板房。从那种状态到现在，我们眼睁睁看着浦东一步一步崛起。我们这代人是亲眼目睹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崛起，我们是感受最深的。

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我今天写了这个题目，就是“政策刺激还是改革开放？”也就是说如何面对当前面临的三大挑战。和每次演讲一样，我都会做三点声明：第一点声明，今天所讲的声明，都是我个人的观点，与任何单位无关，纯属我个人的一家之言。第二点，本人只是一个学者，讲宏观经济与股市无关，讲改革与政治无关，我完全从学术角度来进行探讨。第三点，不要媒体报道。

为什么我有这些声明？一个原因是，2009 年时为了刺激经济，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还有 10 万亿的天量信贷。2009 年上半年贷款增长很快，去哪里了呢？去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我回到北京钓鱼台的内部会议，当时在中财办领

导、发改委领导、中心的领导都在场的情况下，我提出我的担心，后来领导还让我写了报告。我后来不光是在内部会议，在公开的会议和文章里都提醒有关部门要警惕地方平台贷款增长过快的风险。后来在浙江的一次会上，我讲的时候作为铺垫，我说在我们调研过程中，一些地方、一些银行反应有多少资金流向股市和房地产，说这个话是作为铺垫，说明有更多的资金到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结果我讲完以后，上海一家著名的媒体也没有跟我核实，就在头版头条发了一条消息，说据我测算有多少资金流向了股市，结果引起那天上海股市的大幅度振荡。所以从那以后，每次演讲之前，我都做这么三点声明。

再有一个，为什么我们老说被“卡脖子”？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专家学者被卡脖子。看着我们在这里讲，背后不知道有多少只手在卡着你的脖子，这个不许说，那个不许讲，不能讨论。没有思想解放，没有思想市场，怎么去创新？没有创新，未来中国经济怎么去增长？我后面会讲，没有创新，就没有增长。从改革者的角度，我看马国川的日本三部曲，其中就提到日本当年的改革者胜海舟有一句话：作为改革者，一方面要面临体制内保守派的攻击，说你们整天要改革，要这个要那个；同时又面临体制外的人攻击，说你们就是想维持这个体系。这是改革者实际上所处的一种困境。

下面我讲一些具体的说法。首先第一部分，我想简单过一下，就是去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断崖式下跌。我在 2022

年 1 月份新经济论坛的形势分析会上，说要警惕断崖式的下跌，下面这张图是当时 PPT 里的。

一、1月份预警：有可能出现断崖式下跌

- 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
- 工作基调：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 遗留问题：
- 需求收缩：乘数效应，巡视效应，奥运效应，滞后效应
- 供给冲击：新冠疫情冲击，大宗商品涨价，供应链紊乱
- 预期转弱：舆论信号混乱，政治举报模式，经济罚款模式
- 稳字当头：自行车，不进则倒；（飞机，重新起飞）
- 经济下行，一旦过了临界点，断崖式下跌，谁也托不住！
- 当前对策：继续投放货币，刺激房地产，只能是饮鸩止渴

图 1：2022 年：中国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

我讲完以后，媒体有报道。这个报道是这么说的：经济下行，不可能像我们有些人所期待的那样“软着陆”、“L 型”，由于前面所讲的乘数效应等各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旦过了临界点的话，就有可能出现断崖式下跌。到那个时候，你花再大的力气可能也托不住了。所以，要尽可能在到达临界点之前，把这个下行趋势止住。

后面的状况大家都知道了，很快 4 月份数据出来以后，中国经济明显出现断崖式下跌，然后失业率快速上升，时间关系我不细说了。5 月份国务院紧急召开了 10 万人的大会，采取了 6 大方面，33 项措施，12 万亿的投资计划。

这是什么概念？2009 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出台了 4 万亿投资计划，引起了国内外的巨大震动。可是这次

呢，12 万亿的投资计划，砸下去连个影都没有看到，经济继续下行。

魏加宁 财经智库CJZK 2022-01-18 16:30

财经智库

CAIJING THINK TANK

经济下行不可能像我们有些人所期待的那样“软着陆”、“L”型，由于前面讲的乘数效应等各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旦过了临界点的话，就有可能出现断崖式下跌。到那个时候，你花再大的力气可能也托不住了，就跟一个雪球一旦滚下了悬崖你是托不住的。所以，一定要在它到达临界点之前把下行趋势止住，否则后患无穷。

过去40年的基本经验，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困难、经济危机的时候，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实现新的思想解放的话，我们就能够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如果我们能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话，就能够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就能实现中高速、迈上中高端，早日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还有经济社会的真正稳定。

—— 魏加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
原副部长

图 2：财经智库报道

第二个我想谈一下，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当前中国经济下行。我认为有三大方面，第一个是短期的，就是新冠疫情，

这个大家都知道，不详细展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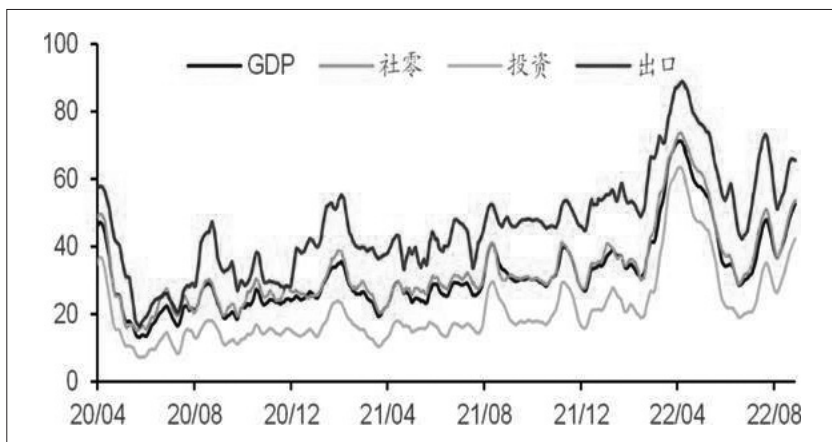


图 3：4 月份数据：断崖式下跌

在这两次座谈会之后，决策层立刻推出了这个“**12万亿救市计划**”，这说明经济下行压力确实“**很大**”，救市政策出台急需“**紧迫感**”。

那么，本次推出的“**12万亿救市计划**”，都主要包括了哪些内容？

- 第一，全年退税总额高达**2.64万亿**。
- 第二，国家融资担保资金1万亿，带来企业**5万亿**资金融资。
- 第三，铁路建设债券**3000亿**。
- 第四，专项债规模**3.65万亿**，8月份要用完，可能还会提前下达2023年的专项债规模2万亿左右，预计**总投资5.6万亿**。
- 第五，**900亿**商用货车贷款。
- 第六，**4000亿**小微贷款。
- 第七，**3500亿**航空专项贷款和债券。

以上规模全部加在一起，一共可以释放出**12万亿左右**的天量资金来推动整个中国的投资拉动。

图 4：12 万亿救市计划

第二个是长期趋势，所谓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主要原因我也不展开讲了，我的观点是：一方面人口红利消失了，另一方面资本红利也消失了。所谓资本红利消失，就是从长期

看，储蓄率是在下降的，而且还有很多负债，吸引外资也越来越困难了。从技术角度看，山寨技术遇到了知识产权保护，引进技术遇到了中美高科技冷战。所以现在三大红利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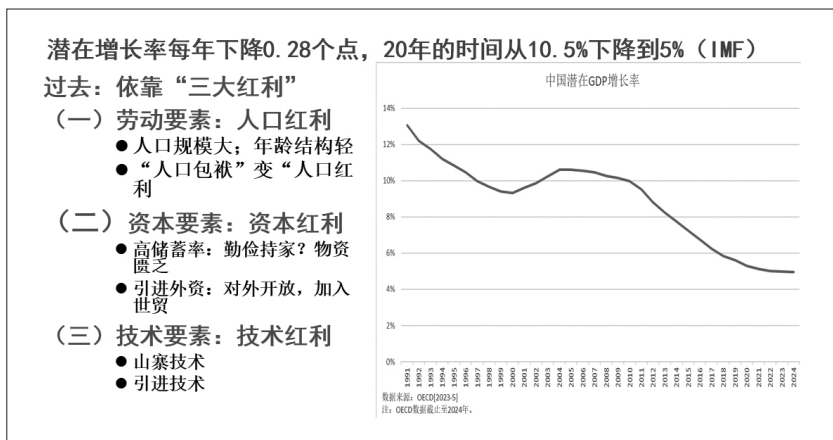


图 5：长期趋势：潜在增长率下降

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国家要从发展中国家转成发达国家，那么一定要从技术追赶模仿型，转向前沿创新型，否则就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从微观层面上，过去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依靠的主要是套利型企业家，但是现在套利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能套利的地方都套得差不多了。今后要主要依靠创新型的企业家。所以一个基本结论是，中国未来如果没有创新，就没有经济增长，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因素。

第三个因素就是改革红利消失。说得更坦率一点，改革这些年停滞，甚至有些方面出现了倒退。如果讨论对中国改

革贡献最大的两位经济学家是谁，我不知道大家的答案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一个是吴敬琏，一个是厉以宁。倒不是因为吴敬琏是我们的老师，我才这么说，而是大家回过头来看，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改革做对了什么？无非是两件事，宏观上有了市场经济，所以有吴市场一说；微观上引入了股份制，所以有厉股份一说。但是这些年为什么中国经济又放慢了呢？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林有为打败了吴市场，强调有为政府，所以各地政府胡乱作为；另一方面郎国进打败了厉股份，所以有国进民退。

2004 年郎顾之争，不仅把顾维军送进了监狱（事后证明是冤案），而且把中国的国企改革全面叫停。我一直在思考，如果当年国企改革不叫停，继续往前推，今天的中国经济还会像现在这么困难吗？那么把中国的国企改革叫停，把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对谁有好处？谁是最大的受益者？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台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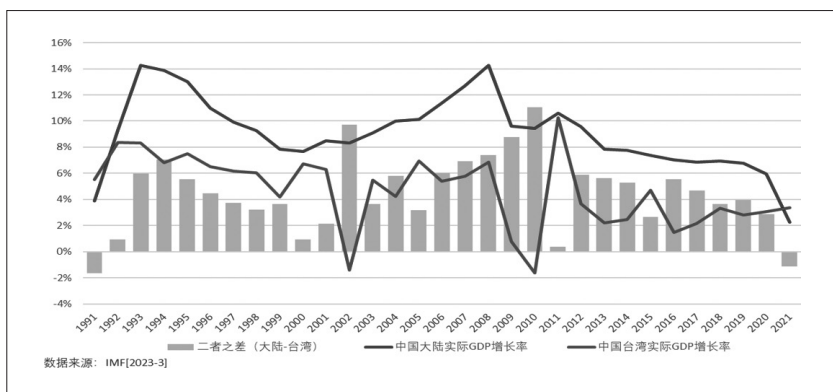


图 6：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 GDP 增长率对比

为什么？因为在邓小平那个阶段，对台湾问题的做法很简单，就三件事，第一个，经济上，我们快一点，台湾慢一点；第二个，政治上，我们往右一点，改革开放往右走，台湾往左一点，大家都往中间靠拢；第三件事，体制上，到底是一国两制，还是一国三制，还是联邦制，可以商量，可以谈嘛，对不对？结果现在倒过来了，我们的增长放慢了，台湾的速度在提高，这样对谁有好处？

第三部分，我们当前面临的三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最近的连锁爆雷，我们早就预料之中。我 2015 年做了《十三五时期经济风险评估》，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的，大家可以找来看。外部风险和人口老龄化风险加起来，影响财政、金融，经济下行，通货紧缩，这是当时的图，我不展开了，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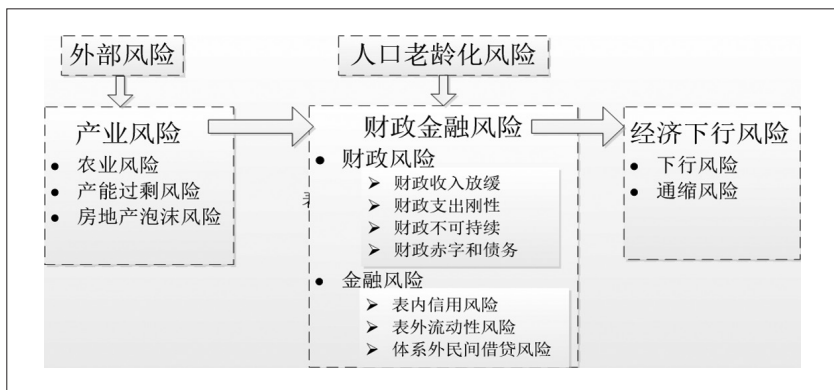


图 7：“十三五”期间我们面临的主要风险结构图

第二个风险，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就是我们很有可能错失新技术革命的机会。上一次新技术革命这个机遇，让我们

抓住了。在上世纪 80 年代，当时很有意思，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一个是 1978 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变革，事后证明，这个论断非常准确。当时我们中心老领导，也是社科院院长马洪同志，带着社科院，带着发展中心的人，大力宣传新产业革命，后来叫新技术革命。因为左派说，你这个新产业革命是为资本主义涂脂抹粉，资本主义已经奄奄一息了，后来为了回避这个观点，用了新技术革命。当时还出版了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等。很有意思的是，1983 年一边是中宣部批精神污染，一边是发展中心这边马洪带着大家讨论新技术革命浪潮。然后一次一次的讨论，中央，地方，然后部门，甚至协会，都在讨论这个事情。所以当时大家形成了一种共识，就是我们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然后有了紧迫感，所以改革开放，我们抓住了上一轮的新技术革命，我们赢得了技术。

日本在创新方面的教训，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展开讲了。当年日本获得了汽车产业的崛起，电子信息产业的崛起。目前日本的汽车产业还处于领先地位，因为汽车产业还处于工业时代，而电子信息产业后来被我们的台湾省和韩国赶超了，为什么？因为电子信息产业已经进入了数字化时代，这是日本人自己的反思。我顺便反思我们中国。大家想想，我们 50 年代曾经用农业社会的思维搞工业化，大炼钢铁。今天的我们是不是在用工业时代的思维在搞数字化？这是我的提醒，大家可以讨论。

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凤凰卫视吕宁思做过一个视频，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他讲，这场战争一开始就决定了胜负，为什么？这是两代人之间的战争。俄罗斯是普京这一代老人，用工业时代的思维，打的是钢铁战。乌克兰是一批年轻人，用数字化的思维，打的是数字化战争。所以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胜负，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事情。

今天数字化在全面提速。上一次拐点是在 90 年代，信息成本变为零，信息无所不在。过去出门你要买张地图，花 3 块钱，你现在出去，拿着手机一导航，根本不用花钱了，这是上一个拐点。现在新的拐点就是大模型的出现，将来模型无所不在。那么未来人的价值是什么？你要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见解，所有其他事情都会被大模型替代，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现在的国际社会，新数字技术迭代在提速，与此同时我们在干什么？所以要有一种危机感，要有紧迫感，如果这一轮新技术革命浪潮我们赶不上，真的是要被淘汰了，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挑战。

第三个就是民营企业政策。大家都知道，从去年年底经济工作会议以后，中央高度重视民营企业，关于民营企业的政策层出不穷，昨天央行又组织了金融部门支持民营企业的政策研讨，今天都发布了。我们过去有过“非公经济 36 条”，这次是“民营经济 31 条”，我们不断出台新的政策，但是企业家的信心指数在下降，投资在下降。

有一种担心，就是民营企业政策会不会陷入塔西佗陷阱？这个预警不是今天才提出，2020 年 1 月 19 号，就是新

冠疫情公布的头一天，我在参加一个论坛时就提出要警惕民营企业政策陷入塔西佗陷阱。什么叫塔西佗陷阱？就是说，一旦政府失去了公信力，无论你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公众都会认为你是在说假话；无论你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公众都会认为你是在做坏事。这个词是我在 2012 年，中财办委托我做改革方法论课题时，无意中看到这个观点，我就把它写进了报告。这个报告给了中财办，也给了中改办。然后两年不到，2014 年习总书记去河南兰考的时候，就提醒全党要警惕塔西佗陷阱，所以这个词一下子就流行开来了。我们很担心，现在的民营企业政策是不是已经掉入塔西佗陷阱了，你降息降税，降什么也不管用，照样不投。所以我很担心，会不会出现雷颐写的《中国切片，1900》那本书里的局面，讲的是清朝末年，由于在洋务政策上清政府来回摇摆，最后失去了公信力。我建议有时间可以看一看这本书。当前面临的问题，当然还有很多，陷阱也好，我去年讲的僵尸化也好，那些都不细说了。我就重点讲以上这三个方面的挑战，是我们当前非常需要警惕的。

怎么应对？我的观点是，第一，以政策转型应对经济下行。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潜在增长能力，这一点我是同意林毅夫的，至于是不是固定在 8%，可以另外讨论，但是肯定不应该是这么低。但是，我不赞成他给的药方，他给的药方是有为政府。我认为当务之急不是建设有为政府，而是有限政府、法制政府。首先，要做正确的事，然后才是正确地做事。如果大方向错了，你越努力，可能离目标越远。如果政

府把法制环境搞好了，用不着招商引资，也不需要优惠政策，国内外的投资就会不请自来。因为要挣钱，要牟利，这是国内外企业自身的内在动力，不用你去操心。只要把法制环境搞好了，外资外企在这里有安全感，能够盈利，就会不请自来。所以我认为中国最重要的营商环境，一个是法制，一个是“两平”。什么叫“两平”？这是一个民营企业给我概括的，我有一次在福建讲完一天的课，一个民营企业家说，你讲的“两平”太好了，我们民营企业就需要这个。我给说愣了，我说是哪“两平”？他说是你说的，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公平。我说，这一天的课，让你两个词就给概括了。确实民营企业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两平”，一个是和平发展，一个是公平竞争。这是第一个。

- 同意，说中国经济还有一定的增长潜力
- 但是，不同意其实现的方法——“有为政府”
- “有为”：首先要**做正确的事**，然后才是正确地做事，否则
- “有为”：应当是“法治”
- “法治”，不是用法律治理他人，而是政府自己接受法律约束
- “法治”：政府只要把法治环境搞好，国内外投资者就会不请自来
- “法治”：用不着“招商引资”，也不需要“优惠政策”
- “政府”：只需要提供**依法治国、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 最好的营商环境：是“法治”，是“两平”（“和平”“公平”）

图 8：“有为政府”还是“法治政府”？

第二，投资拉动还是消费拉动？我个人认为，凯恩斯主义已经走到尽头了，靠政府投资拉动的效果是递减的。从下面的图可以看出来，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比重越来越高，

可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低，说明投资拉动效果在递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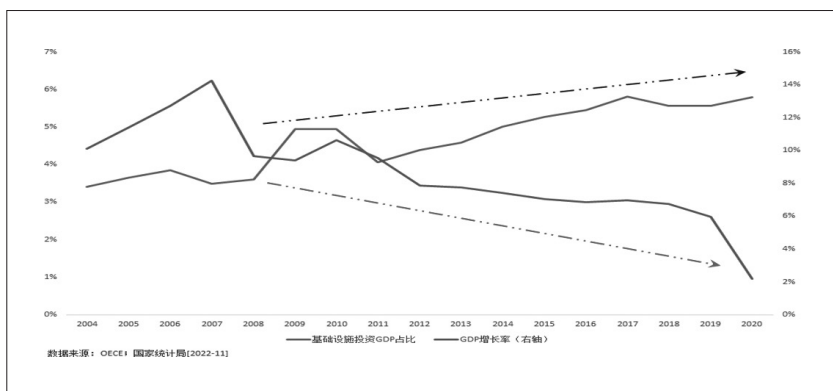


图 9：基础设施投资 GDP 占比 & GDP 增长率

然后怎么做？我的主张是政府与其投资项目，不如投消费，因为消费的乘数大于投资的乘数，而且投资乘数在递减。1998 年朱镕基修公路，经济效益好，社会效益也好。到了 2008 年，再修公路就不行了，有效益的都修完了。然后 2008 年修高铁，到了 2018 年，再修高铁也不行了。这两年修高铁，都是老少边穷地区，修完了谁去坐，谁坐得起？没有人坐，你拿什么回收成本？

2020 年提出新基建，4 月份我提的观点是，当务之急不是新基建，而是新医院。2022 年 12 月 24 号，我参加西南财大的金融安全论坛，我讲了这个观点，12 月 24 号正是疫情放开的时候，我就说了点意见，结果被全网封杀了，网信办告了我两次。我其中就讲了一个时机不对，如果去年上海疫情的时候顺势放开，夏天时症状会轻很多，冬天本来就是呼吸道传染病最流行的时候，这时候放开就要严重很多，

这是我说的第一个观点。再一个呢，就是姿势不对，什么叫撤退？背向敌人那叫撤退吗？第三个观点是，准备不足。医院病床准备不足，疫苗药品准备不足，然后医生护士全都阳了。如果当时把这个资金投入在建医院、建病房，疫情过后这些东西还可以用啊，而且中国整个的医疗服务水平就上一个台阶啊。结果我们把钱都干什么去了？盖核酸小屋，盖这个仓那个仓，疫情过了以后全都得拆掉，方仓拆了以后浪费多大。广州拆方仓的时候，空调都是新的，但是在那种地方用过的空调谁敢要啊？造成了大量的浪费。我说你当初要是建医院多好，我不展开讲了。投资乘数下降，消费乘数大于投资乘数，这是一个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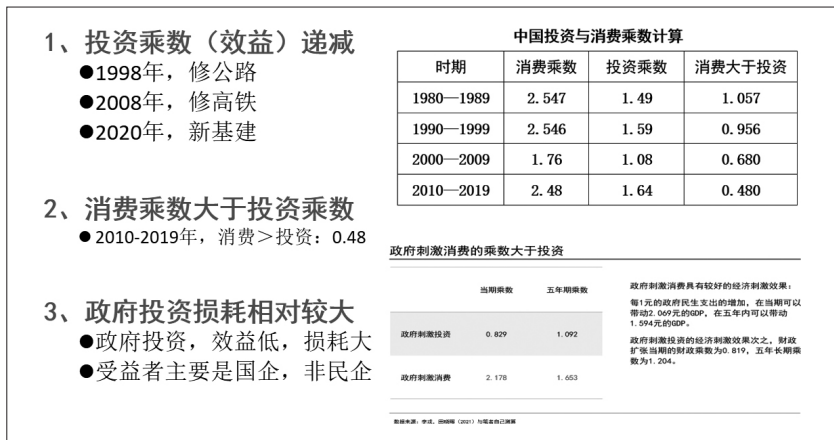


图 10：政府：投项目不如投消费

还有就是我们的消费占比过低，无论跟发达国家比，还是跟发展中国家比。

我认为政府投消费，不如投社保，为什么？因为高收入

组的消费乘数效应相对较低，低收入组消费乘数是较高的，为什么？你给富人 100 块钱，他就存起来了；你给穷人，他立刻消费了。我主张政府把钱投到社保，减免企业的社保缴费，让它腾出精力搞投资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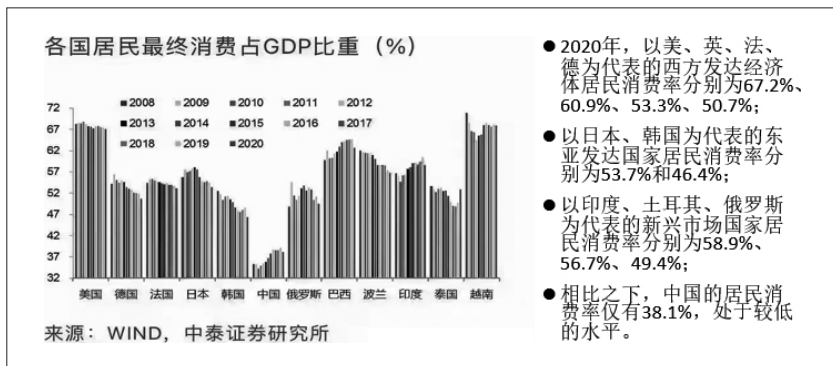


图 11：居民消费占比过低（国际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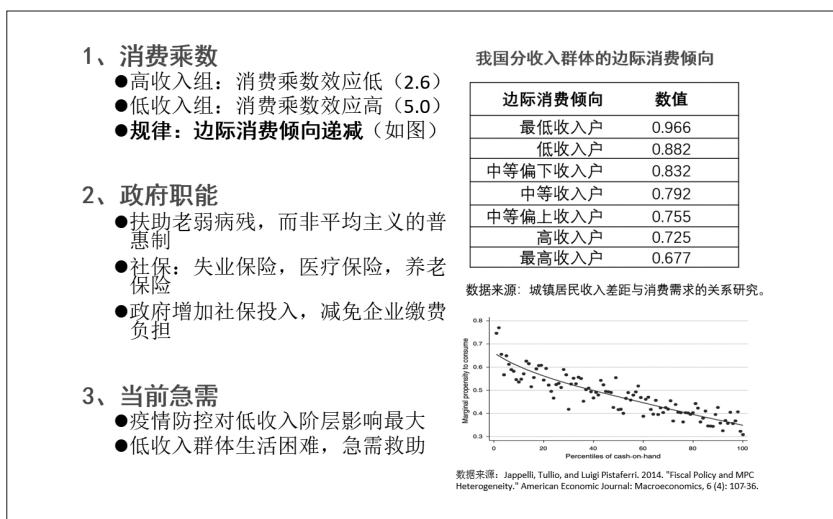


图 12：政府：投消费不如投社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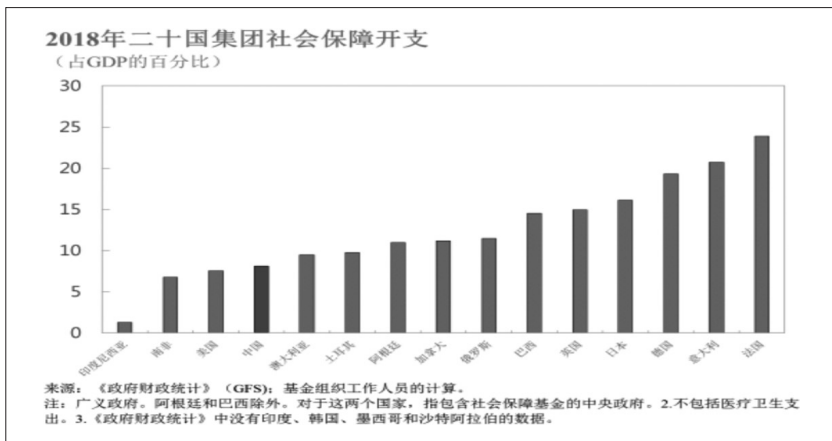


图 13：中国社保支出偏低

我们的社保水平是在 G20 里也是偏低的。所以我的再一个观点就是，不是说不要投资，投资让谁投？让民企投，因为民企的投资效率要比国企高得多。这是一个基本观点，用政策转型来应对经济下行。

要以数字化转型，来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浪潮。数字化时代，创新发生了哪些变化？首先，在研发环节，工业时代强调的是专注式思维，它是一种求同的思维。在这方面，日本人的单一文化有其优势。但是到了数字化时代，需要的是是一种发散式思维，是一种求异的思维，说白了就是找不同。在这方面，美国人的多元文化具有优势。

我记得我当年刚参加工作时，第一次听于光远老师讲课，他讲了一个“笼养苍蝇”，大家理解不了。那时因为我们农业还不够发达，解决不了蛋白质的问题，于光远先生突发奇想，他说苍蝇的蛋白质非常丰富，但苍蝇不能吃，因为

它到处乱飞，还脏。那么我把苍蝇从小养在笼子里，不接触外界，苍蝇就不脏了，那就可以吃，就可以解决蛋白质的问题。于光远先生是发散式思维，像什么生产力经济学、国土经济学，都是他提出来的。数字化时代更需要这样的专家学者。

- (一) 研发环节：
- 工业时代：专注式思维；求同思维；单一文化，日本人擅长；学者类型：如日本丰田，几十年专注研发氢能源
 - 数字时代：发散式思维，求异思维；多元文化，美国人擅长；学者类型：如于光远，国土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
- (二) 生产环节：
- 工业时代：运输成本下降，生产消费分离；垂直一体化
 - 数字时代：信息成本下降，研发制造分离；横向水平分工（零部件模块化，接口标准化，生产外包全球化）；
- (三) 消费环节：
- 工业时代：耐用品（固定电话=大型交换机；大型计算机；需要20-25年保质期的高质量芯片，成本高）
 - 数字时代：快消品（笔记本，手机；只需3-5年保质期的芯片，成本降低）；市场调研的重要性（日本VS三星）
- (四) 决策环节：
- 工业时代：垂直的集中决策；科层体制；
 - 数字时代：横向的分布式决策（如蚂蚁社会，群体智能，无中央控制系统）
- (五) 企业环节：
- 工业时代：价格竞争
 - 数字时代：创新竞争，创新成为企业间竞争核心（日本，人口减少，市场缩小；提高价格，附加价值，依靠创新）
- (六) 创新模式
- 工业时代：日本开发式创新，政府主导，企业研发部门，让现有技术实现效益最大化；在熟悉领域渐进创新转型
 - 数字时代：美国探索式创新，民间主导，外部风险投资，客户剧增，赢家通吃，超额利润，平台垄断，社会文化
- (七) 企业文化：
- 工业时代：纪律严明，整齐划一，统一工作服
 - 数字时代：宽松氛围，自由随意，个性化服装

图 14：数字时代，创新发生了哪些变化？

在生产环节，工业时代强调的是垂直一体化。数字化时代，由于信息成本的降低，强调的是横向的水平分工、零部件模块化，然后是接口标准化。零部件模块化，意味着很多零件在华为手机上可以用，在别的手机上也可以用。为了可以通用，就要接口标准化。

生产外包、全球化是数字化的一个特征，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因为消费环节发生了变化。过去的工业时代，我们用的计算机都是大型计算机，固定电话都需要大型交换机。大型计算机、大型交换机需要的芯片，保质期至少在 20 年

到 25 年以上，所以日本人精雕细刻、高投入、高性能、高品质的芯片就占有优势。但是现在，消费发生了变化。大家想想，我们现在电脑用多长时间？笔记本电脑用多长时间？三年，最多五年。我们手机用多长时间？两年，最多三年。所以现在耐用品变成了快消品，日本人花那么大成本、精雕细刻的高质量芯片，有意义吗？保质期 25 年有意义吗？根本没有意义。所以韩国和台湾发现，能用低成本、短时间快速生产出来，这叫技术优势，这是消费环境发生了变化。

再就是决策环境发生变化。工业时代强调的是垂直的集中决策，所以科层体制非常发达。数字化时代强调的是横向的分布式决策，所以团队非常重要。

在企业环节，工业时代是价格竞争。到了数字化时代，强调的是什么呢？是创新竞争。日本财务省和东京大学前几年出了一本书，我一直想把它翻译成中文，但拿不到版权，它不给。那本书讲什么呢？就是如何来提价。为什么？因为老龄化以后，市场在缩小，如果企业拼价格的话，最后所有企业全得死掉，所以就要想方设法要提价。怎么才能提高附加价值？创新，是这么引出创新的题目。那本书讲得非常好，就是说企业的竞争环境发生了变化，不像过去拼价了，现在要拼创新了。

再有是创新模式发生了变化。日本过去的创新模式是什么呢？日本的习惯是我现在卖的产品，要和我企业研发的产品之间保持 10 到 20 年的距离，为什么？他说我现在新产品推出去，是因为我前面的产品卖不动了，所以日本人有按

部就班的研发模式。在日本，你可以看到商店里，比如照相机，如果是有英文或中文说明书的，一定是落后好几代的；只有日文说明书的，往往是新的，而且企业在研发中的要比它还先进，这是日本人的研发模式。但是它碰到现在美国这种探索式的颠覆式创新，甚至是上着大学，上半截、辍学的学生，有个好的 idea，风险投资一拥而上，就把产品搞出来了，管你前面产品卖得动卖不动，这就是颠覆式创新，打败了日本按部就班的开发式创新。

再有是企业的文化，工业时代强调的是纪律严明、整齐划一、统一工作服。到了数字化时代，强调宽松的氛围，自由随意，个性化服装。



图 15：企业文化：工业时代 vs 数字时代

大家看这个图，工业时代的老板穿着西服，打领带，工人要穿工作服。现在数字化时代，老板穿得很随意，员工穿

得很随意，为什么？一个宽松的氛围，才有创新的意愿和创新氛围，才能有新的思想出来。都整齐划一，强调统一思想，怎么创新？所以我说，要用数字化转型来迎接或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机遇。

第六部分，我想说要以政党转型应对塔西佗陷阱。历史上解决失业问题靠什么？都得靠民营企业。

- （一）第一次就业危机：三年困难时期：城里人返乡
- （二）第二次就业危机：文革期间，城里知青：上山下乡
- （三）第三次就业危机：文革结束，知青返乡：个体经营
- （四）第四次就业危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展民营企业
- （五）第五次就业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刺激
- （六）第六次就业危机：2023年，只有发展民营经济，才能克服危机

图 16：只有发展民营经济，才能解决失业大潮

朱镕基那届政府的时候，大量的国企下岗职工，怎么办？在国务院开会的时候，吴敬琏老师就给朱镕基提了建议，说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让民营企业来承接这些下岗职工。朱镕基一听，好主意，说发展民营企业有什么困难，让吴老师去调研。我 1998 年陪着吴老师到浙江走了一圈，就是考察民营企业。后来发现浙江的民营企业没有出口自主权，必须先卖给上海或广东的国有贸易公司转手，才能出口；国有贸易公司没有积极性，效率又不高，民营企业也不知道国际市场需要什么。所以吴敬琏老师就给朱镕基建议，赋予民营企业出口自主权。所以中国那一轮的增长是怎么上来的？一边是加入 WTO，朱镕基他们推动中国加入 WTO，

等于是出口的需求侧大门打开了；然后赋予民营企业出口自主权，等于把供给侧大门打开了。供给需求一对接，中国出口快速增长。所以在前两年，还是特朗普时期，我陪领导到美国参加中美经济论坛，我就说：中国出口快速增长靠的是改革开放，而不是特朗普说的什么不公平交易。我们给民营企业出口自主权，不就是改革吗？加入 WTO，不就是开放吗？

去年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对民营企业的政策非常明显，针对社会上对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议论，亮明态度，毫不含糊，而且要从制度上、法律上把平等对待国企、民企的要求落实下来，而且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大家注意，头一次讲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以前都是国企做大做强。并且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习总书记在经济工作会议上讲，“我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的”。

我刚才提到了，民营企业是不是有掉入塔西佗陷阱的危险？其实我在 2020 年 1 月的演讲就把问题提出来了。我就搞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就往右走，鼓励发展民营经济，扶持个体化；等到经济形势一好了，又想起初心了，消灭私有制，往左走，又折腾。你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是跳不出这个历史怪圈。当时全场好几百人鼓掌，说明大家有共识。这是为什么，我没有想明白。后来正好第二天，疫情一宣布了以后，大家注意力都转移了，都防疫去了。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后来我想明白了，为什么？是因

为我们党已经是执政党了，但是转型不到位，指导思想还是革命党的理论。消灭私有制，造反有理，这是革命党的理论。你现在是执政党了，你再去消灭私有制，把经济基础干掉，是拆谁的台，不是拆自己的台吗？对不对？历朝历代，造反的时候，夺天下的时候，都说造反有理；得天下以后，立刻要转型，要鼓吹儒家文化，为什么？那就是转型了。最典型的是清朝，满清当时打不进北京，就是因为有袁崇焕，袁崇焕又忠诚、又聪明、又勇猛，满清拿他没有办法。最后使了一个离间计，崇祯皇帝糊里糊涂把他杀了，杀完以后不到 14 年，明朝就完了。满清进了北京以后，干什么？第一件事是给袁崇焕平反，说这是我们使的离间计，他是忠臣。如果满清没有这个转型，也不可能有后面的 200 年。所以作为执政党，一定要转型。

再一个，我们虽然是执政党了，但是我们心态还是在野党的心态，什么国有企业是共和国长子、党的执政基础，那是在野党的心态。什么叫执政党？就是要为全体国民服务，全体国民都是你的执政基础，这是执政党的心态。

再有一个，我们现在已经是执政党了，但是我们的治理方式还是地下党的治理方式。这话不是今天才说的，2016 年在在中办座谈会上，我当着领导身边的人就这么讲了，我说怎么还是用我父亲当年地下党的办法，口口相传，单线联系？说是依法治国，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文件治国，甚至连文件都不发。疫情期间大家都体会过，说查核酸，查健康码，说查就查，然后老百姓就跟居委会吵架。我就问他们，谁让

你们查的？他说是上面，那你把上面的文件贴在这里，不就完了吗？安民告示，老百姓谁跟你吵？他们说没有文件，都是口头传达。这个口头传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大家想想，将来出错以后，怎么纠错？是你传达错了，还是我听错了，还是我执行错了？对不对？

我顺便讲一个历史故事。张学良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大家想一想，当年张学良从东北撤兵需要什么，是他想撤就撤的吗？他得有蒋介石的手谕，对不对？结果他从东北撤兵以后，全国骂他是不抵抗将军，张学良为了证明自己是清白的，所以发动西安事变。发动完西安事变以后，又觉得对不起老蒋，又送老蒋回来，结果老蒋把他扣住。为什么老蒋扣住他，一直不敢杀他，什么原因？我从小听说的，蒋介石的这个手谕被张学良的前夫人于凤至带到美国去了，而且双方达成一种默契，你不杀人，我不出示。我没有去考证这个事，但是大家想一想，逻辑上是对的，对不对？

无痕治理的结果，将来谁承担责任？既然是执政党了，就要用执政党的办法。像什么宏观经济政策、公共政策，都是要公开讨论的。秘而不宣的结果，是很多政策一出门就见光死，要么是一日游回去了，为什么？就是没有充分讨论。为什么要强调法治化、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什么？讨论的时候，充分听取各种意见，可能立一个法、修改一个法很难。但是一旦法律通过以后，一时半会要再变回去也不容易了，所以就能给投资者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这是依法治国的真谛所在。

这是我们为什么说，党一定要转型。指导思想要从革命党的理论变为执政党的理论，要重新解释共产党宣言，有专家最近讨论很多，我不细说了。再有一个，执政理念要服务于全体国民，要把民企从阶级敌人变成自己人，只要照章纳税，遵纪守法，就允许发展壮大。治理方式要从地下党变为执政党，从阶级斗争变成四次分配来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从文件治国变成依法治国。这是我想说的要转型，政党转型。

法律上，要以法治建设为中心，我认为最好的营商环境是法治。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受伤害最大的恰恰是法治。现在有人说，要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不太赞成，为什么？现在说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人信你了，民营企业家不信了，这两年说放弃就放弃了。所以我的观点是，提出以法治建设为中心。前面讲了，只要把法治环境搞好了，投资者信心自然就会上来。2016年时，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出台过一个产权保护文件，文件是国家发改委起草的，由我们发展中心做第三方评估，这个评估是我牵头做的。我当时就提出，要把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写进宪法，我推动这个事，结果到现在这个也没有修。我说什么时候把这个写进了宪法，企业家就会真正吃了定心丸，就可以根治恐慌症。

制度上，要确立竞争中性的原则。2018年，我们给中财办写竞争政策报告，就提出要竞争中性。竞争中性的基本原则是监管中性、融资中性、税收中性。监管中性，就是作为监管者，你不能说国企是自己的亲儿子，民企是干儿子，外企是别人的儿子，各行一套，一定要一视同仁。融资中

性，不能说国企贷款利率就低，民企贷款利率就高，昨天开会也是讨论这个事。税收中性，不能这边拼命向民营企业收税，那边给国有企业大把大把补贴。所以我们提出，一定要实行竞争中性的原则，具体不细说了。

在政策上，要坚持三个善待。这几年我一直在讲，一个市场友好型政府，一定要善待资本、善待人才、善待创新。前面两条是新加坡成功的经验，善待创新是我加的。为什么？未来中国没有创新，就没有经济增长。

再有，解决短期问题要依靠长期主义。现在我们在那儿整天考虑宏观政策，都是短期行为，政府自己都是短期行为，你怎么能让企业家有长期主义呢？所以，我主张要用长期主义来解决短期问题。前些年，恨不得把教科书都改了，要给“文革”翻案。幸亏 2021 年六中全会历史决议，重新强调了对“文革”的定性。很有意思，去年在新供给论坛的一个会上，我在念六中全会决议的原文，关于“文革”的定义时，直播就给我掐了。后来我问他们怎么回事，年轻人说一听“文革”，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就给掐了。我说你们是为什？年轻人说得保饭碗。我说：你们保饭碗我能理解，但是我担心的是，你们把饭碗保住了，粮食没有了。

前年中财办委托我们做研究，我们有一期报告专门写了关于滞胀的研究，讲这个事时我们用了经济学的合成谬误。经济学讲理性人，人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是一个组织如果所有人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个组织会崩盘的，这就是合成谬误。后来我们这个报告送上去以后，中财办的

领导看了后，大家都在讲合成谬误，这个词就这么出来的。

在国内经济形势判断上，不能总是面临颠覆性的风险。2021 年上半年，国家网信办明确讲，不许唱衰中国经济。然后年底，总理就讲，当前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年底经济工作会议说，中国经济面临三重压力。

国内政策上，也不能总是面临颠覆性的风险。这几年，大平台员工下岗，大教培员工下岗，打击网游。后来我在各种场合讲，打网游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为什么？现在在美国，如果你的孩子网游打得好，家长可能接到美国军方的来信，你的孩子网游打得不错，能不能跟我们配合，一流大学你随便挑，奖学金我们出，干什么？毕业以后参军，因为现代化战争，武器操作很多跟打游戏是一样的，就看谁反应快，谁动手能力强，谁判断准确。乌克兰战争，乌克兰就是一帮年轻人打数字化战争。我们把网游干掉了，这都是威胁国家安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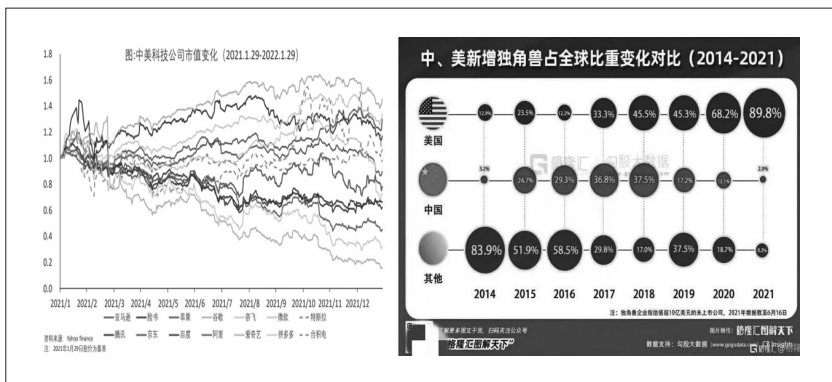


图 17: 中美分叉

打击平台的结果，我去年做了上面这个图，红的是我们平台的市值，蓝的是美国平台的市值。本来我们的市值还高于美国，但这些年我们的平台一路下行，美国的平台一路上行。据说有人把我这个图和这篇文章送给了最高决策者，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后来平台的政策开始发生了变化。

最后我再讲一点，要以新一轮改革开放，争取新一轮发展红利。我刚才讲的好像挺悲观，其实我认为，恰恰是这样一种形势，如果能倒逼我们改革开放的话，我们就能够赢得新的发展红利。关于政策刺激还是改革开放，现在网上讨论最多的是什么？到底是打激素，还是吃伟哥，很少有人说动手术。大家想，与那么大的一个肿瘤，把民营企业压到这种状态，营养都给了肿瘤，正常细胞得不到营养，你不动手术等什么？有人说，动手术要补血。但是如果光输血，不止血，会是什么结果？我的老领导孙尚清是怎么去世的？他有胃溃疡，还便血了，但是为了接待基辛格他们，1996年4月18号陪美方代表见李鹏总理，19号见江泽民主席，20号见荣毅仁副主席，朱镕基亲自宴请，李岚清亲自到会讲话，孙尚清带着病挺着。结果把美方代表送走以后，他胃大出血，到了北京医院，年轻大夫一看，也没有止血，上来就输血。大家想，光输血，不止血，会是什么结果？心脏受不了了，孙主任就这么去世了。所以我说，动手术，该止血就得止血。

前不久辜朝明在香港有个演讲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认为日本走出经济衰退靠的是财政政策。我们的观点正好相

反。前几年，大概 2015-2016 年，有一次在清华的中日研讨会，吴敬琏老师让我去给日本专家做点评。那个日本专家讲了三次改革，我发言的时候就讲，还有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桥本龙太郎搞的政府改革。当时日本专家在主席台上，直拍大腿，说我说的对。吴老师总结的时候，把这个加进去了。

●日本究竟是如何走出“大衰退”的？

●1996年，桥本内阁，“行政体制改革”，22个省厅压缩到12个

●1998年，小渊内阁，“金融大爆炸”，中央银行独立性，金融厅

●2002年，小泉内阁，竹中“金融再生”改革，清理不良资产

●2012年，安倍内阁，“三支箭”，第三支箭，（邮政体制）改革

图 18：日本如何走出“大衰退”

后来我们又回顾了一下，有关于日本人失去了 10 年 20 年 30 年的很多说法，但是日本人在做什么？1996 年桥本龙太郎先搞行政体制改革，把 22 个省厅压缩到 12 个。然后 1998 年，小渊内阁实行“金融大爆炸”改革，首先把中央银行独立了，把金融厅独立出去。然后 2002 年，小泉内阁“金融再生”改革，清理不良资产。到了 2012 年安倍的改革，说是三支剑，我们国内只关注了第一支剑货币政策，第二支剑财政政策，都不讲第三支剑，安倍的第三支剑就是改革。所以日本这些年一直在改革，至少政府在改革，在努力往这里走。当然很多日本专家觉得还不够，不给力，不够劲，效果不好，还不太满意。但是我说，它至少在改，它能走出困境是这个原因。

我担心的是我们的各种陷阱，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讲一个，改革停滞陷阱。关于辛亥革命，各路学者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据我观察，清朝完在哪里？就是改革停滞倒退。几个方面的倒退，一个是太平天国起来的时候，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就拼命放权，该放的放，不该放的也放，外交军事司法全都放了。等到太平天国平定下去以后，清政府开始收权，该收的收，不该收的也收，包括铁路国有化。然后，洋务运动左右摇摆。地方咨议局本来是要民主改革，结果最后咨议局里大部分是满清的遗老遗少，一半以上是指定的。到最后一刻好不容易组个内阁，又成了皇族内阁，内阁 10 几个人大部分是满清贵族，汉人只有两三个。虽然我是满族，但是我公平的说，这是清政府的一个教训。最后整个倒退，才导致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并不是有人说的因为改革而导致的，恰恰是因为改革倒退。

日本的明治维新，本来走的很快，但是政治改革、社会文化改革都没有跟上，最后改革倒退。日本人自己反思，倒退就是从不许媒体发声开始，然后财阀扩张，统治经济，军部暴走，最后东条英机当了首相，然后一亿玉碎，就是美国人打仗最后日本人准备死一亿人，最后一刻因为原子弹叫停了。不多说了，大家可以看马国川的日本三部曲。

第三个案例就是苏联，前年我们在写滞胀这个课题的时候，无意中发现苏联也有滞胀，只不过隐形化了。我们发现最后苏联垮在哪里？实际上恰恰是戈尔巴乔夫搞改革，保守派政变把戈尔巴乔夫关起来，结果让叶利钦趁机做大。

所以很多事情要反思，恰恰因为改革停滞而导致了灾难。

如果我们中国推行改革的话，我想，至少有这么几个红利。一个就是竞争政策红利，这个我们 2018 年算过，由于不公平竞争，不仅会带来效率的损失、公平的损失，还会带来福利的损失。我们大概算了一下，能够占到 GDP 的 22.8%，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实现公平竞争的话，每年 GDP 能够提高 1.5 到 2 个百分点，这是一个。

再有就是，如果推进国企改革的话，我们就可以获得风险化解的红利。2008 年国家发改委请我去开会，研究如何解决铁路亏损问题，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要涨价。我说，如果你不引入竞争机制，涨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今年涨了，以后还得涨。所以我就特意讲了日本当年国有企业改革的案例，大家有时间可以在网上查，现在还挂着呢。日本那么小一个国家，尚且还进行国铁改革，拆分成七家公司，改制上市，不仅解决了债务问题，解决了经营赤字问题，而且效率提高了，服务提高了。所以如果国铁改革，我们是解决国铁债务风险的。

然后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的企业结构和金融结构正好是反着的，企业结构是以民企为主，所谓的 56789（民营经济贡献了 50% 以上的税收，60% 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 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 以上的企业数量）。我们的金融结构呢，恰恰以国有大型银行为主体，这是完全错配的。我的主张就是把商业银行去国有化，然后发展壮大。如果减持国有

股用来化解不良资产，实际上是很大一笔资源。

再有就是地方国企改革，就是出售地方的国有资产。大家都讲地方债务，我们 2003 年就提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我们可以说是在国内最早提醒这个风险的。结果是你提醒你的，他不听，就越做越大。现在也并不是说没有办法，我们 2016 年给国务院写的报告就讲这个事，地方政府不能一边攥着大把的国有资产，一边跟中央政府要钱还债，怎么还债？你首先卖你的国有资产嘛。

有一次商务部请我去成都开烟酒糖大会，我批评国有企业，没有人鼓掌。下来以后，主持人告诉我，在座的可都是国有企业。我当时大吃一惊，我说怎么烟酒糖还有国有企业？这又不是国家命脉，为什么都是国有企业，要说这个地方挣钱，那你不是与民争利吗？另外有一次，在旅游行业的会上，旅游专家说我们的饭店 60% 以上是国企。大家想一想，有没有这个必要？地方政府化解这样的风险，对民营企业可能就是机会，如果你要盘活国有企业的话。

我在工商联讲过一个观点：就是全国人大设一个评估委员会，让国资委把国企的数据拿来，让工商联把民营企业的数据拿来，一个行业一个行业进行评估，凡是民营企业能够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做得很好的领域，国有企业就坚决退出，退出干什么？我不是说不要国有企业，而是国有企业要干民营企业干不了、干不好的事，这才能真正发挥国有企业的作用。所以我的提法是叫做“民进国升”，这样就可以获得布局调整的红利。

回顾过去 40 年，我们一个基本经验，或者从基本规律来看，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困难、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2018 年习总书记两次讲话，一次在北京，一次在广东，讲要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我想说，如果我们能够实现新一轮思想解放的话，我们就能够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如果我们能够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我们就能够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就能够实现中高速，迈向中高端，早日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

我今天的演讲就讲到这里，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们一起讨论，谢谢大家。

乔依德：刚才魏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演讲，很有意思，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

赵广彬：魏老师演讲特别精彩，我觉得如果中央领导按照魏老师这样的思路，就不会面临这么大的困境。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知道，你对房地产怎么看，怎么样解决房地产目前面临的困境？

魏加宁：这个是最不想提的。为什么？提了就伤心。在国内，我们现在老说中日有什么区别，我认为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日本当年房地产泡沫的时候，举国头脑发热，是一个教训。我是最早在 1997 年，把日本房地产泡沫的教训写了一个报告，发展中心送不上去，我是通过社科院送上去的。当时国家领导人还有批示，写完以后没有两天，就碰到吴老师，吴老师问我在忙什么？我说把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写

了一个报告，送上去了。吴老师说，你别写日本了，你去东南亚看看，一模一样。这个时间应该是 1997 年 9 月，然后我到东南亚一看，果然跟日本是一样的事情。然后到了 2005 年，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我在清华的一次演讲说，我们千万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辙。我讲完以后，有一次内部媒体座谈，我又重复了一下，当时有浙商里的经济学家，听了半信半疑，不到一个月他接待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带队的日本专家，其中一人是日本泡沫经济时期大藏省负责银行监管的局长。他听了之后，就写了一篇文章，结果被网上骂得一塌糊涂，说他是乌鸦嘴。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经济学家就应当乌鸦嘴，然后给我发过来，我才知道。所以我们一直在提醒。

到了 2015-2016 年，刚才我讲的那个是中办座谈会上，本来是谈社会稳定的话题，我提了两个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一个是金融，一个是房地产。我记得在会上，我说房价再这么涨下去，没有买房子的人要疯；将来有一天，房价跌的时候，买了房的人要疯，怎么都不好使了。为什么？房价太高了。然后我讲，在国外房价跌就跌了，政府不用着急。在中国，谁在这里卖地？地方政府。谁在这里买地？国有企业。买地的钱从哪里来？国有银行。我说将来房价跌了以后，政府往哪里躲？我讲完以后不久，我记得从 2016 年的十一开始，各地开始调控房价。

我想说什么呢？到了今天，就非常难办了。你继续刺激它吧，我去年 1 月的 PPT 就讲了，等于是饮鸩止渴；可是你

不刺激它吧，又找不到新的抓手，经济发展怎么办？找不到新的动力。这是现在的两难。实际上房地产这些年不断地在烙烧饼，2009年以来，经济不行了就刺激房地产，房地产价格一涨，老百姓不满了，又开始控，一控制经济就下来了。来回烙饼，就是没有长期主义，没有想好到底中国将来依靠什么。我的观点是，将来还是得依靠创新，国家从上到下，都应该把注意力放到创新上。

至于房地产本身，现在比较难了。因为根据我们过去的研究，任何一个国家，房地产只要有了泡沫，没有不破的，但是破的做法不一样。我举个例子，比如当年鄂尔多斯，至少十年前了，鄂尔多斯白天看是一片房子，盖得非常漂亮。晚上你再去看，一盏灯都没有，鬼城。怎么解决的？银行一看房子卖不出去，找房地产商催贷，结果政府领导把银行叫来，不许催贷。所以房子卖不出去，价格还在那里，银行帐面上的不良资产还很低。实际上，你拖得越久，将来问题越大。

还有一个矛盾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本来商品房就已经过剩了，然后这些年又建经济适用住房。按道理说，应该在当年推商品房的时候，同时推经济适用住房，这是新加坡的做法，至少你要同步推。已经这样了，应该怎么做呢？韩国据说是怎么做的，当房子卖不动的时候，政府帮着银行去催贷款，在催贷款的情况下，房地产商就得降价销售，对不对？降价销售，然后还银行贷款。等价格降得差不多的时候，政府出手把它买过来，作为经济适用住房。我觉得

这是比较聪明的一种做法。当然作为房地产商，现在很多在转型，增加附加功能比较多，比如有的房地产商和养老、医院结合，附加一些其他的功能。我也只能说到这里，比较感慨，因为一直在提醒，但是没有用，看着它发展成这样。

吴信如：我问一个地方债的问题。地方政府大力发展项目，借了很多的现金或隐形债务，地方政府有些项目是效益比较差的，很难通过项目本身偿还银行利息。中央政府呢，不愿意帮着置换，或者很少置换，地方政府也没有这个钱。这个问题到底最后怎么解决？魏老师，你有什么意见？

魏加宁：你问的也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我们 2003 年就研究这个事，2016 年给国务院一个报告，讲通盘解决的方案。很有意思，有一次在政协开会，坐在我左边的是财政部专家，坐在我右边的是银监会局长。财政部专家说什么呢，说这个地方债不是债，没有风险，为什么？那都是或有负债，就是可还可不还的。银监会的局长就急了，要是可还可不还，不就变成银行的风险了吗？所以当着我的面，两个人干起来了。我对面是政协的领导，我就笑着问政协的领导，我说你是要财政危机，还是要金融危机？都推给财政，那就是财政危机；都推给银行，那就是金融危机。所以我们 2016 年写了一个建议给国务院，就是要国务院成立一个债务处置委员会，包括财政部、主要银行，甚至国资委都进来，因为你要盘活国有资产，统筹解决。这是我的一个建议。有兴趣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本书《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与新型城市化融资》。去年鹤岗市债务危机时，有关部

门又找我，说希望我写一个东西。我说还用写吗？书都出了，我说你们去看那个就完了。

不改革的话，就没有救，现在一般这种政策建议，我也懒得出了。为什么？朱镕基当年搞金融改革，明确讲不改革的话，没有解。为什么地方政府债务不改革没有解呢？你想想，一个地方政府没有任何约束，在国外的话，发债至少议会得讨论吧？在美国，财政局长和市长是同时选出来的，你说财政局长听老百姓的，还是听市长的？得有制衡机制啊。所以我们这些年一直讲地方自治，没有地方自治，地方债无解。朱镕基当时就讲，谁家孩子谁抱走，理论上是对的，但是法理上说不通啊，为什么？你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相当于你的分公司，我地方政府官员的乌纱帽你管着，我的事你管着，钱也管着，然后你说，债务你不管，说的通吗？所以你一定得管。从法理上讲，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的债务中央政府就得背。背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刚才讲的，地方政府看准道德风险，一定会把债务做大，最后把中央财政拖垮，一定是这样的。

这背后还有一个地方官员的利益博弈，为什么地方官员一定要把地方债做大呢？说白了，我把债务做大了，如果我升上去了，我就可以动用上一级政府的资源来填原来的窟窿，对不对？我不用填，别人会替我填，对不对？所以将来这个政治斗争会越来越剧烈，这个债务窟窿会越来越大。所以不改革，无解。我的观点是，一个地方政府要发债，当地政协、人大至少要有约束，而不是光听书记一个人的。这

个约束机制跟企业一样，过去中国的企业为什么搞不好？因为我们中国没有企业，国企那都是政府的附属物。科尔曼讲的软约束，都是这个问题，地方债也是这个问题。这是我的观点。

乔依德：时间不早了，我们最后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魏老师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新华盛顿共识”与全球化的未来

崔凡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研究部主任

上海发展沙龙第 181 期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各位来宾，我们今天沙龙的演讲马上开始。正如我们发给大家的邀请函中所讲的，今天给我们演讲的嘉宾是崔凡教授，他现在是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国际贸易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海南研究院首席专家，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研究部主任，在商务部、财政部、科技部、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里都担任各种兼职工作。崔凡毕业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以及国际商法法学硕士学位；同时他拥有对外经贸大学的国际贸易学士与硕士。从他的经历和学历可以看出他既有有经济学的功底，也有法学的功底，这是非常难得，非常好的。

我们在 5 年以前，请过崔凡教授给我们做演讲，那个时候中美贸易战刚开始，他那次演讲的题目是“中美贸易关系跟 WTO”。今天他演讲的题目是“‘新华盛顿共识’与全球化的未来”。所谓“新华盛顿共识”，主要是美国国家安全

顾问沙利文几个月前在布鲁金斯学会有个演讲，这个演讲我再三说非常重要，理解透这个演讲就知道美国政策的哲学或学术功底，现在把沙利文的演讲叫做“新华盛顿共识”。好多年以前大家都讲“华盛顿共识”，也有各种批评。眼下先提出来“新华盛顿共识”，我们就听听崔凡老师给我们做的解读。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崔老师！

崔凡（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研究部主任）：非常感谢能够又一次到这来参加沙龙的活动，我5年以前来过一次，所以今天我来之前还回过头去翻了一下5年前我讲的内容。那时是2018年年底，中美贸易战，如果说正式宣战是2018年7月6日，前面几百亿肯定是已经打起来了，那段时间是正在升级的过程中，而且世贸组织的上诉机构即将停摆。后面大家也都看到了，我们没有想到这几年来了一个世纪疫情，原来讲脱钩论，目前看来相当大程度上这个脱钩是出现了。

我前一段时间稍微回顾了一下，看了一些历史书。有很多人讲第一次全球化、第二次全球化，但其实真正全球化的历史时间是很短的，冷战以后才有真正的全球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是美国主导的，是半球化，是两个国际分工体系。在更早的自由贸易历史，1846年那时候也只是半球化，很多国家实际上并没有在这个自由贸易的体系中。真正的全球化，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几乎都在里面，只是冷战以后的事情，但是没想到全球化的黄金时期仅仅过了10多年，到2008年各种指标就见底了。

我们今天再来说讲全球化这个问题，后面会怎么走？这个题目说老实话太宏大了。“‘新华盛顿共识’与全球化的未来”这个题目，就是借“新华盛顿共识”这个概念来讲全球化。沙利文讲了“新华盛顿共识”以后，出来很多篇英文评论文章，批评的很多。大部分评论认为，并没有一个什么所谓的“新华盛顿共识”，这个共识到底是像原来的华盛顿共识那样的国际组织的共识，还是西方国家的共识，还是什么群体的共识，实际上并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的大范围的共识。原来“华盛顿共识”针对的是给发展中国家的建议，告诉发展中国家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做哪些改革可以使其经济发展腾飞起来。“华盛顿共识”那 10 条建议要是放在美国自己身上，好多都不见得实施了。

比如第一条是财政约束，财政纪律。国际上通行的 3% 赤字率，现在发达国家有多少做到了？可能也就是中国在那死死守着 3%，有时候是 3.2%，3.6%，今年依旧安排在 3%，不能超的太多。但是 3% 的约束早就被很多发达国家抛弃了。关于美国的赤字率，甚至出来了“现代货币理论”，前几年比较热门，主要讨论财政赤字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这一段时间通货膨胀压力这么大了，“现代货币理论”就没有那么多讨论了。

所以说“新华盛顿共识”这个叫法是有一点名不符实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唯一的一点道理实际上是针对之前的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带有自由主义色彩，沙利文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自由主义给美国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这种负面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过去的“华盛顿共识”提出来之后，那么多届美国政府，也就克林顿政府的财政纪律守得比较好，甚至还有盈余，后面到现在美国财政赤字越来越大，美国的国际投资头寸是净负债，在这几年是在16万亿到18万亿美元之间那么大的规模。

这种情况能不能持续？今天我讲全球化，后面主要会从价值链贸易的这个角度来说。金融的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可能对全球化未来的影响更大。乔老师做了很多的研究，包括金融规则，包括金融基础设施等，那么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走向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不会太说金融方面的问题，但是贸易与金融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

我今天主要从四个方面给大家做汇报。首先，简单提一下沙利文“新华盛顿共识”的背景。然后讲三个问题，一是稍微回顾一下历史，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转折点，这个时候回顾一下历史演变过程，可能对我们判断未来趋势会有一点帮助。二是跟大家讨论一下目前全球价值链的一些演变情况和趋势，可能有的观点跟现在国际组织以及研究全球价值链的专家们会有点稍微不同。三是跟大家讨论一下未来制度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格局，一个是制度，从两个方面讨论全球化未来的问题。

沙利文谈“新华盛顿共识”是在今年4月份，在布鲁金斯学会演讲时提的。整篇文章总结起来，其实是4个挑战、5个对策。他在演讲中，对美国之前推行的政策，特别是里

根以来的自由主义政策，提出了很多的批评。他认为造成了4个问题，第一个是产业空心化，产业大量的流失。这一轮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美国把自己的制造业外包到中国，把自己的一部分服务业外包到印度，这是这次全球最主要的内容。尤其是制造业方面，他认为产业空心化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了损害。第二是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的新环境，这里面实际上主要就是中国的挑战。第三是气候危机加速。第四是国内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造成了很多矛盾冲突，甚至对美国的民主体制产生了侵蚀。这四个问题在很多年以前有人隐隐约约就提过，但是没有引起重视。

□ 沙利文“新华盛顿共识”

□ 沙利文列举的美国面临的挑战：产业空心化、地缘政治安全竞争新环境、气候危机加速、不平等及其对民主体制的侵蚀

□ 新华盛顿共识的主张：产业政策、结盟与友岸外包、不强调自由化内容的新型贸易协定、向新兴经济体的融资与基础设施建设、小院高墙的出口管制

□ 拜登经济学

■ 三个方面：灵活的公共投资、给工人教育并赋能、促进竞争；

■ 一个保障：减少赤字并向富人征税。

图 1：沙利文的“新华盛顿共识”

针对这四个问题，他提出五点主张。第一是产业政策。第二是结盟、友岸外包，或者叫盟邦外包，就是跟盟友密切贸易关系。第三是签新贸易协定。过去的几年，中国是在进行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美国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这两届政

府期间，自由贸易协定只续了一个，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在叫做美墨加协定，“自由贸易”这个词都不要。剩下的基本上没有完整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再也不签了。在印太经济框架里面，不管是贸易还是投资，没有任何降关税、放开壁垒方面的措施。第四是向新兴经济体融资与基础设施建设，是针对“一带一路”的。第五是“小院高墙”的出口管制。对这五个方面，这一段时间也出了很多信息，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解释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有新重商主义的色彩，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

在沙利文谈“新华盛顿共识”的同时，美国高官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提法，比如说“拜登经济学”，在白宫网站上6月份登了很长的一篇文章，系统地总结“拜登经济学”。“新华盛顿共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外经贸政策，而“拜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内政策。“拜登经济学”提出几个主张，要通过灵活的公共投资来加强美国的实力，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和一定的引导产业的投资，再给工人教育、赋能，包括支持工会。这段时间美国工人罢工，总统也都表示支持。再一个是促进竞争，反垄断。加强公共投资，钱从哪来？需要向富人收税，因为它有个约束条件，就是赤字不能扩大，所以就要向富人收税。“拜登经济学”的一些要点是这样的。

这两者一个是对外的经贸政策，一个是对内的政策，两个交叉重合的一个点是产业政策。当然，产业政策在美国立国初期就已经有了，但是像这样比较一致地强调产业政策，二战后好像没有这么密集地强调。美国的一些措施，包括对

半导体和新能源产业有一系列的法案，来支持实施这方面的产业政策。这是我们讲的一个背景，还有一些其他高官的提法，比如说布林肯讲到冷战后秩序已经终结了。

如果从他们的这些政策宣示来看，至少可以说过去的全球化似乎到了一个重要节点，全球化原本的旗手、主导者已经不愿意举这面旗了。以前是不是也发生过类似的撂挑子的情况呢？近段时间我回顾了一下，1934年前后英国和美国旗手接棒的那一段历史。

其实人类社会的自由贸易历史是非常短的。作为自由贸易旗手的英国，在1846年以前也是有两三百年长期实行重商主义。这种状况到了18世纪的时候，已经开始引起批评。英国在搞重商主义，法国的科柯尔贝尔也实行重商主义，都是带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重商主义。最开始在法国出现了反对的声音，法国出现了重农学派。上海财经大学的老校长谈敏，他的博士论文出过一本专著，专门讲中国与重农学派之间的联系。重农学派讲到自由秩序，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有关于中国的研究，因为当时没有系统的理论，亚当斯密还没出来，主要提倡者就是把中国古典的一些重农、自由秩序的一些思想，作为他们的一个影子，他们专门还出了好多汉学的著作。所以谈敏老师专门写了一本书讲之间的联系。但重农学派的理论基础确实比较缺乏。

到了亚当斯密的时候，1776年他出了《国富论》以后，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理论基础，重农学派的声音就弱下去了。但是亚当斯密的理论提出之后的很长时间，处于理论上有主

张，但政策上没有实施的状态。到了 1815 年，英国的贸易保护还出了一个很有名的谷物法，把谷物建立高关税。1817 年李嘉图出了理论著作，他研究了比较优势论以后，又当了议员，参与到政治辩论中。这些搞自由贸易的人，包括当时的反谷法同盟，持续斗争了大概 30 年，到后期这个斗争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终于在 1846 年废除了谷物法，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英国真正在政策上开始搞自由贸易了。自由贸易的历史，最早也就只能追溯到 1846 年，然后英国把服务贸易保护的航海法也给废除了。从废除谷物法，降低关税，废除航海法，直到 1860 年英国跟法国签科伯登条约，变成依据条约进行开放，这个条约建立了“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原则，成为以后很长一段时期里自由贸易最重要的基础。

英国搞自由贸易，1846 年自主开放，1860 年协定开放，很快就碰到问题了。到 1877 年出现逆差，开始有很多的声音讲，我们把自己的关税降到几乎都是零，人家的关税都比我们高，这不公平。1881 年开始有“公平贸易联盟”，然后政治力量持续表示要提高关税。1903 年亚瑟夫·张伯伦开始搞关税运动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必须要动手把贸易壁垒重新搭起来，但是由于政策是有惯性的，在他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一直没有干成。然后他的大儿子、小儿子，轮番努力了 30 年，一直到 1932 年，他的小儿子内维尔·张伯伦做财政部长的时候，通过了进口关税法，把英国关税抬起来了。也就是说以 1932 年为标志，英国开始放弃做自由贸易的旗手了。而且是一系列的政策配套，搞友岸外包，搞小圈子。

一方面建立高关税；一方面在英帝国内部，大概有 40 多个国家，30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范围内，通过渥太华帝国会议建立了帝国特惠税，就是内部搞关税优惠，但是对德国、美国，对外是高关税。同时有货币体系相配套，1931 年英国废除金本位，建立英镑区或英镑集团。

这时美国怎么反应？美国在 19 世纪末期，已经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了，在一九三几年已经是第一大市场。实际上，英国 1932 年彻底放弃自由贸易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也跟美国有关系。因为美国在一八九几年成为制造业大国以后，就开始有主张自由贸易的声音，但是这个政策的实行过程是相当长的。在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威尔逊总体提出十四点和平主张，其中的第三点就是要签订自由贸易条约，但是没办法兑现。威尔逊后面的两届政府都是共和党的，也都没有兑现。在 1930 年，美国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甚至把关税提到了一个历史高点，在一定程度上对英国也产生了冲击，加速了英国在 1932 年放弃自由贸易的政策。

这时英国自己把关税抬起来，又建立帝国特惠税，3000 多万平方公里那么大一个圈子对美国形成一个壁垒。在这种情况下，1933 年罗斯福就任总统，尽管有人说他跟凯恩斯见面时两个人也不是很谈得来，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干预主义者，是带有凯恩斯主义色彩的总统。但是在自由贸易这一点上，1934 年在罗斯福的推动下，美国通过了对等贸易条约法，美国从汉密尔顿主义立国开始，一直到

1934 年实行对等贸易条约法前，全部都是实施高关税。

美国在 1934 年突然把威尔逊十四点和平主张的第三点拿出来，提出我们愿意跟所有贸易伙伴签自由贸易条约，基础是对等贸易条约法。对等贸易条约法有几个关键点。

第一，美国原来的主张叫做“有条件最优待遇”或“美式最优待遇”，我这里面就不多做解释了。这个时候美国突然反过来愿意用英式的最优待遇条款，就是用 1860 年英法科伯登条约的条款，用无条件最优待遇。从这时开始，美国对外签自由贸易条约都是用无条件的开放的最优待遇条款。

第二，宪法规定美国外贸政策的权力在国会，国会给予总统快轨授权，3 年一授权，1960 年代变成 5 年一授权。后面很长时间的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很多谈判，都是在快轨授权下，由行政部门去谈成的。

第三，对等开放。现在美国是一个大市场，你们谁愿意跟我签自由贸易条约，你对我开放，我就对你开放，你愿意给我零关税，我也可以给你零关税。这一招，从 1934 年开始，美国努力了 30 年，基本上到一九六几年，在 30 年的时间里把英国的帝国特惠税打得千疮百孔，最后实际上是把它给瓦解了。

在这个过程中，从 1934 年一直到 1945 年，就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一共对外谈了 32 个盟约国。最后逼得英国没办法，签了一个盎格鲁 - 美利坚贸易条约。原来整个英联邦特惠税的壁垒，被 30 多个双边条约给瓦解了。

在 1945 年开始谈多边协议，那个时候美国已经一枝独

秀，力量是领先的。可以说从 1934 年以后，美国代替了英国成为自由贸易的旗手。英国后期尽管有非常激烈的斗争，但是最后英国还是慢慢又融入到了美国的自由贸易体系中来。在 1944 年到 1947 年这一段时间里，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间有一场非常激烈的斗争，就是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的斗争，二战后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实际上还有一场斗争，就是英国贸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普斯和美国助理国务卿克莱顿，这两个人对关贸总协定有一场激烈的谈判，谈判的焦点是什么？美国说整个关贸总协定的所有成员都必须按照无条件最优待遇，对所有贸易伙伴要一视同仁。英国说不行，应该给一个主副条款，原来渥太华协定下的帝国特惠税暂时别取消，因为已经有约定了，新的不搞了，但是原来帝国内部的那些优惠保留。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最后的结果实际上是达成一个折中，美国同意保留了先前的约定。关贸总协定原始文本有附件一、二、三，附件一把英国原来的殖民地全都列出来了，这里面的可以保留，但是优惠幅度只减不增。后面不断进行降关税谈判，实际上是把优惠幅度给它降掉，这么来来回回到一九六几年，实际上已经降没了。到一九七几年英国加入欧共体，就正式取消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威尔逊十四点和平方案里有很多反殖民地的内容，包括中东的那些事情，包括苏伊士运河的事情，美国的立场跟英法不一样，最主要的是把原来老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打掉。在贸易上最后是打得非常

彻底的，现在在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里，英联邦内外没有什么区别，帝国特惠税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可以说在一九六几年之前，美国的贸易政策的主要打击对象是英国原来的帝国特惠税。在一九六几年以后，对手换成了日本，英国原来走过的那条路，美国又开始走了。在一八八几年英国在搞公平贸易联盟，1974年美国也开始说不能光讲自由贸易，要讲公平贸易，那些文章的表述跟一八八几年的英国几乎如出一辙。在1970-1980年代，美日之间贸易关系的发展历史，实际上可以说最后美国把日本的威胁打掉了，这个时候开始真正进入全球化时代，冷战结束了。

冷战结束的一个最直接效果，就是使得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除了极个别的以外，都宣布搞市场经济。中国在1992年宣布支持市场经济，战后两个国际分工体系瓦解了。这个时候世贸组织成立，因为关贸总协定是一个临时的协定，在一九五几年、一九六几年、一九七几年，每一次关贸总协定谈判都会列入一个议题，就是把关贸总协定永久化，建立正式的国际贸易组织，但每一次都失败了。所以一九八几年把这个议题列进去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么一说，反正关贸总协定临时使用40多年，用的也还行，就这么延续下去。但是冷战结束，几乎所有经济体都宣布搞市场经济以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真正成为一种可能。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了以后，当时大家的情绪可以说是狂热的。我们当时可能感觉不到，但是回过头去看文献，看那

段时间的历史，我当时帮老师翻译每个术语，我就开玩笑说 WTO 我们翻译成“乌托”，就是理想。1995 年世贸组织成立，已经把关贸总协定原来的管辖范围大大扩展了，什么服务贸易自由化、知识产权纪律什么的都有了。然后 1996 年提出新加坡议题，同时 OECD 搞国民投资协定的谈判，要资本全球自由流动。四大新加坡议题，实际上只有贸易便利化协议最后落地了。其他关于政府采购多边化、透明度，以及竞争政策、投资议题，是没有完成的。但是当时全球经济体的那种情绪，特别是发达国家当时的情绪，都觉得这是全世界要建立起市场经济的一个体系，我们叫“超全球化主义”，旧的历史终结了，新的历史开端了。

在这样的一片狂热之下，1997 年出现亚洲金融危机，新型经济体出现了一些问题，欧美毫发无损，日本因为离得太近了受了一些影响。90 年代末，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发展中国家，所以发达国家是信心满满的。但是在 1999 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她是欧式国际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之一，1999 年去世之前最后一篇文章是《Westfailure System》，这个不太好翻，其实它不是说西方的体系是失败的，它是一个谐音，是指威斯特伐利亚这样的一个全球治理体系难以应对当前的全球性问题，后来我们叫“威斯特伐利亚失败体系”。里面论述了包括当时的全球化进程，包括世界贸易组织这些全球设施难以应对全球性问题。她提出三大危机或三大失败。第一个是（国际）公民社会的失败，指的是收入差距，括号

里是“国际”，意思是既包括国家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包括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第二个是星球的失败，就是环境和气候问题。第三个是资本主义的失败，指的是金融危机的问题。

- ❑ **冷战结束与1995年世贸组织的成立**
- ❑ **1996年新加坡议题**
- ❑ **1999年Susan Strange的The Westfailure System（西方失败体系？威斯特伐利亚失败体系？国际治理失败体系？）**
 - （国际）公民社会的失败：收入差距
 - 星球的失败：环境与气候
 - 资本主义的失败：金融危机

图 2：从全球化到新华盛顿共识

她提出的这三大问题，当时得到的反响是非常小的，文章发表的时候她已经去世了。其实这三大问题，不仅是西方面临的问题，是全球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中国在 2008 年以前的收入差距也是持续扩大的。因为国际体系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各国必须要制订国内政策来配套解决。我们到什么时候才真正去解决呢？是我们十九大提出“三大攻坚战”来应对这三个问题。

美国什么时候反应过来？到沙利文才反应过来。我们来看这三大问题跟沙利文讲的四大挑战的关系是什么？有的基本上是一样的，比如说沙利文讲到的气候问题，苏珊·

斯特兰奇在 1999 年也是讲了，这是一个重大危机。沙利文讲收入差距导致国内民主体制的侵蚀，苏珊·斯特兰奇也讲了。但是她讲的是国际收入差距和国内收入差距，真正发生的情况是什么呢？是国内收入差距在世界各国普遍拉大，很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收入差距都扩大。但是国际收入差距是不是扩大了？实际上没有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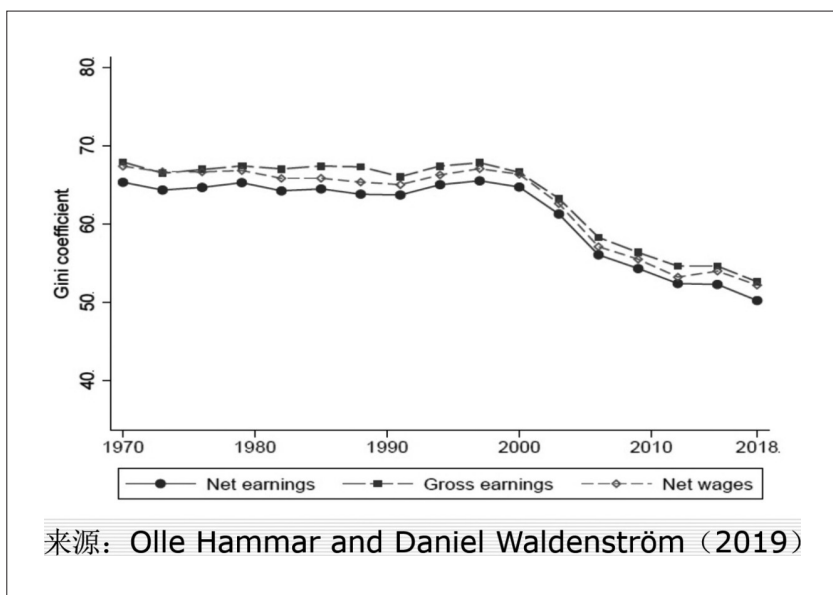


图 3：1970—2018 年国家间收入差距

这篇文章出来以后，从 2000 年开始，国际收入差距突然发生了上个世纪 100 年没有发生的事情，在上个世纪，国际收入差距要么扩大，要么就是保持不动。这篇文章是从 1970 年开始算起的，那时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上去了，比如 APEC 国家，但是整个国际收入差距还是没有缩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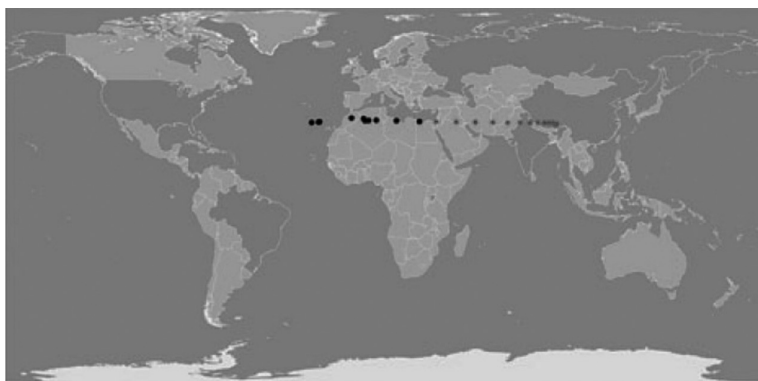
60年代为什么兴起新经济秩序运动？因为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了，一直没有出现收入差距缩小的情况。到了2000年以后却缩小了，从这篇文章到2018年之间，缩小了15个百分点，这包括中国、印度，以及了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上来了，收入差距就变小了。所以苏珊·斯特兰奇说的三大危机中，说对了两个半，有半个没有说对，国际收入差距实际上没有扩大。这个现象到了沙利文那里，就变成了地缘政治性挑战，就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特别是中国的崛起。

还有一条是两个人都提过的、有联系但是不完全一样的观点，沙利文说的是产业空心化，苏珊·斯特兰奇说的是金融危机。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但如果放到美国来看，一定程度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是由于其产业一定程度的空心化，持续的逆差，为可能的金融危机积累了风险。2008年之前，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达到GDP的9.9%，将近10%，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达到GDP的6%左右。金融危机把这个释放掉了一些，现在这个比例没有以前那么高，但绝对规模跟2008年以前差不多。这样的持续逆差以及产业空心化，在一定程度上给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一些不确定性。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全球贸易格局在发生怎么的一个变化？知识界很多人非常反感“东升西降”这个提法，但是“东升西降”是一个客观事实。

我的老师柯成兴（Danny Quah）是一个宏观经济学家，他过几天要在北京参加一个有关全球化智库的论坛，他现

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他在 2011 年写了一篇关于世界经济重心的文章，他说以 1980 年为起点，当时的世界经济重心是在大西洋上，由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世界经济重心持续往东移动，2007 年时移动到了埃及附近。后面的数据是预测数据，他用自己的一个宏观模型来预测以后的情况，所以变成了红点。他说红点还会持续往东移动，但是不能老在移动，否则移动一圈又回来了，这不可能。



以1980年为起点，到2007年经济重心东移了4800公里，预计到2049年一共向东移动9300公里（Quah, 2011）

图 4：世界经济重心东移

他算的那个公式有一个收敛逼近的点，他算到 2049 年，往后就算不下去了，他当时预测到 2049 年那个点基本会稳定在中印边界的位置上。世界经济重心持续的移动，同时带来世界基尼系数的下降，是确实存在的现象。过了一些年

后，他又拿实际的数据来验证当时预测的数据，结果发现基本上有这么个速度，但是这篇文章也只有 2017 年以前的数据，后面还会不会继续移动，其实也有新的不确定性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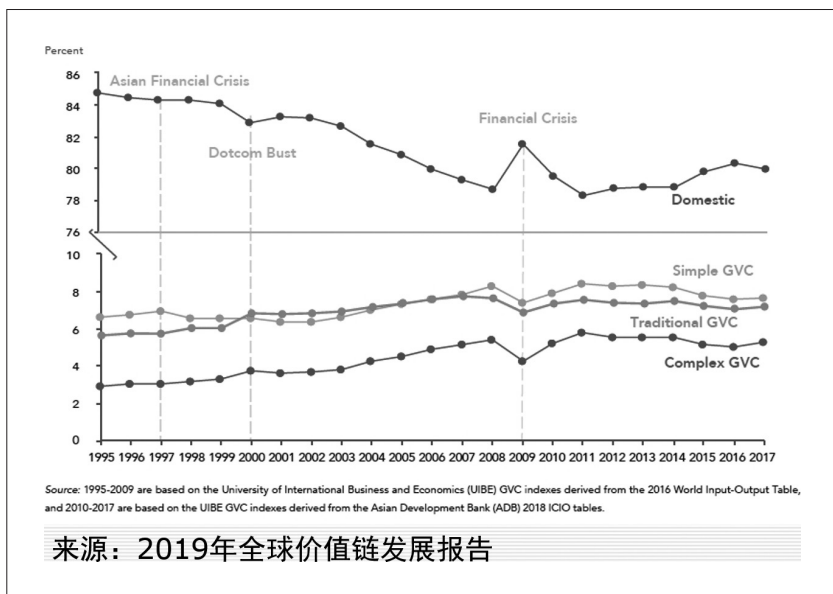


图 5：全球价值链形态演变

他描绘的这个过程，确实存在由于中国的崛起使得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事实。这个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其实就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欧美制造业的转移，东亚、东南亚国家经济的不断增长，这些因素使得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同时不断攀升的过程，可以说是这一轮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毫无疑问中国是获益的。但是这个黄金时期是相当的短。

在《2019 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的图中，最上面那一

条是国内贸易，在 2008 年之前是下降的。国际贸易的各种指标在 2008 年以前都是上升的，2008 年以后由于金融危机所以降下来，然后再反弹，但再也没有超过前期的高点。其实有一个更为简单的指标，就是世界的出口除以世界的 GDP，这个指标跟刚才这几个指标的形态是一模一样的，也是 2008 年到了高点，从 2008 年跌下来以后，去年已经要接近高点了，我看今年又要降下来一些。今年的贸易增长速度肯定比全球 GDP 的增长速度要低。在这段时间，用一个比较乐观一点的说法，就是全球价值链或全球化的盘整期，没有再进一步往上升，是一个盘整的状态。如果是盘整蓄力，可能以后还会升上去，但是目前盘整的时间已经非常长，而且我们看不到真正发力再往上走的力量。

在全球价值链演变的转折点 2008 年，有人提出了区域化的观点。我记得 2012 年、2013 年，瑞士经济学者提出区域经济和全球价值链，他使用区域价值链的概念，认为很多国家并没有卷入真正的全球价值链，而是在一个区域里进行价值链分工。我记得 5 年前上一次演讲时，当时有一位老师表示很不喜欢“区域化”这个词，我当时还解释了一句，说这不是提出一个政策主张，而是从数据上、从客观上来讲，存在的这样一个现象。尤其是亚洲价值链，在 2000 年左右还是中国和日本双中心，2015 年以后日益显著的是单中心现象，就是世界日益分化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价值链，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价值链，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价值链，出现区域化的形态。

- 第一层目标：制造业回归（reshoring）
- 第二层目标：以近岸外包重组美洲价值链（nearshoring）
- 第三层目标：中国多元化（China Diversification）
- USMCA例子：在该地区生产的乘用车的40%的成分到2023年以前必须由每小时工资16美元以上的工人生产。与此同时，乘用车与轻型卡车的生产，在2020年7月1日协议生效以前以净成本法计算，区域内价值成分需要达到66%；2021年1月1日达到69%；2022年1月1日达到72%；2023年1月1日达到75%。毒丸条款。

图 6：近期美国经贸政策的产业链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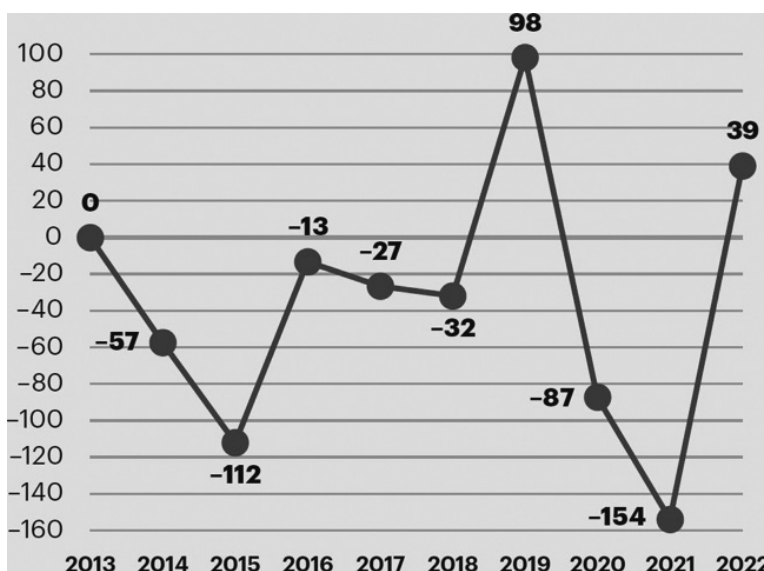


图 7：美国制造业回归指数

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从 2008 年开始美国就提出了

制造业回归的观点，美国已经感觉到了危机。2008 年是奥巴马竞选，2009 年他上任时就正式提出制造业回归的问题。

我们看科尔尼公司（Kearney）公布的美国制造业回归指数，它是从 2009 年开始公布的，因为 2009 年奥巴马开始提出制造业回归。特朗普上任以后，提出制造业回不来怎么办？境外外包，就是拉到墨西哥。如果境外外包还不行怎么办？就是中国多元化，有的叫中国加一，一部分生产能力挪到中国以外来减少风险。这三重目标是有优先级的，第一层达不到才开始第二层，第二层达不到才开始第三层，这中间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所以在美墨加协定谈判过程中，美国对墨西哥施加的压力也让墨西哥人感到很难受。这两届政府一方面捧印度，但同时又把印度的普惠制待遇也取消了。美国用各种各样的政策工具来实现这三重目标，最典型的就是美墨加协定，其中对汽车的种种原产地规定，包括劳动力区域原产地规定，在很大程度上都反映了这三重目标，并且有专门针对中国的“毒丸条款”。

墨西哥、印度、越南在这个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获益的。同时，我们的很多企业到墨西哥去投资，我们的很多中间产品通过墨西哥又绕道进入美国市场，这些现象都是同时存在的。前段时间，墨西哥看到这种情况后，可能是在美国的授意下，提高了 300 多种产品的关税，而且还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它是在世贸约束关税之下提高的，提高以后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的产品。

美国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推进这些目标，出现了一些效

果，尤其在最近。在制造业回归方面，特朗普好不容易搞了一个 301 关税，把制造业回归了一部分之后，结果来了一个疫情。在疫情的第一年、第二年，制造业又向中国集聚，美国的制造业回归一下降下来了。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去年没有把握好，结果去年美国就说又回归了。从去年到今年这段时间内，美国制造业投资方面的各种指标都有上升，近岸外包也有进展，墨西哥的贸易投资数据都有一些体现，去中国化进展非常明显。

在 2018 年 7 月 6 日之前，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占周边 14 个低成本经济体的比重达到 67%、68%、69%。在疫情的第一个季度，也就是在武汉发生疫情的时候，这个比例猛降到 48%，接下来反弹，去年又降下来了。因为科尔尼公司的报告是 4 月份给出的，所以报告上还没有写今年一季度、二季度的情况，估计也不会太好。那么这会走到什么程度？当然也可以说，我们虽然对美国的出口是在下降的，但是我们的中间产品大量出口到墨西哥和越南，最后又绕道到美国去了，这个是有的一些的，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朋友在计算这些具体情况。

如果我们稍微拉长一点来看，看它能持续到什么程度。上图是 1999 年到 2022 年美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的占比，在这个图里我是把进口和出口加在一起算的。在美国的贸易伙伴中，如果放长一点时间看，从 1999 年看到 2022 年，西方贸易伙伴在美国的贸易占比都是下降的，有的下降极其明显，最明显的是加拿大和日本，降幅都达到 6 个百分点左

右，这是非常大的下降。最上面那条是欧盟的线，看上去有波动，因为欧盟的成员总在变化，比如英国的脱欧。所以我后来也看了一下英国、德国、法国这几个主要欧洲国家在美国的贸易占比，虽然没有日本和加拿大的降幅那么明显，但是都是下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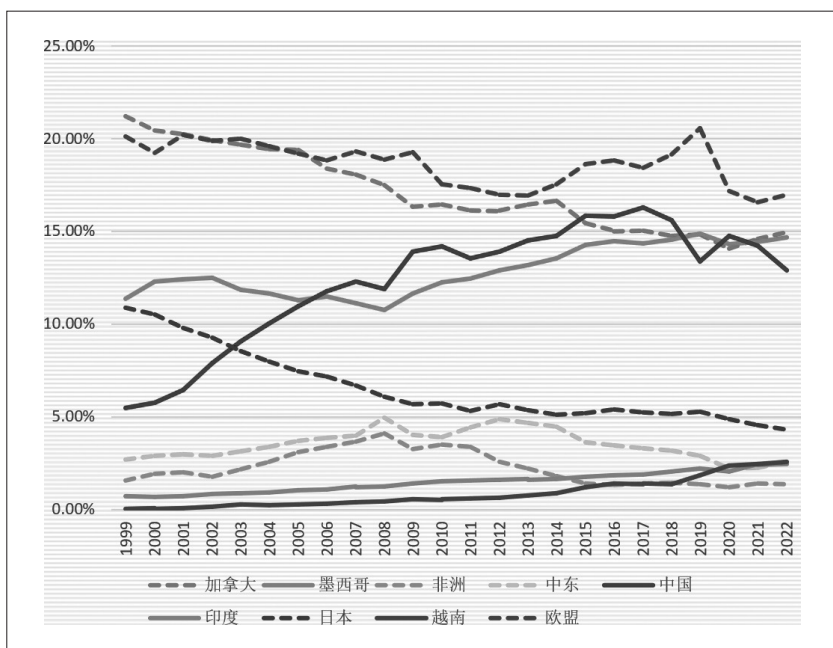


图 8：美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的占比变化

在美国的贸易伙伴中，从 1999 年到 2022 年，占比上升超过 1% 的只有 4 个国家，一个是中国，大概上升 6%；另外三个都是上升 1% 多一点，分别是印度、越南、墨西哥。拉开 20 年的时间来看，中国在美国贸易伙伴中占比幅度上升非常大，在 2017 年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后仍然比之前上升

了6个百分点。

另外，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东和非洲在美国的贸易占比都是上升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都是往下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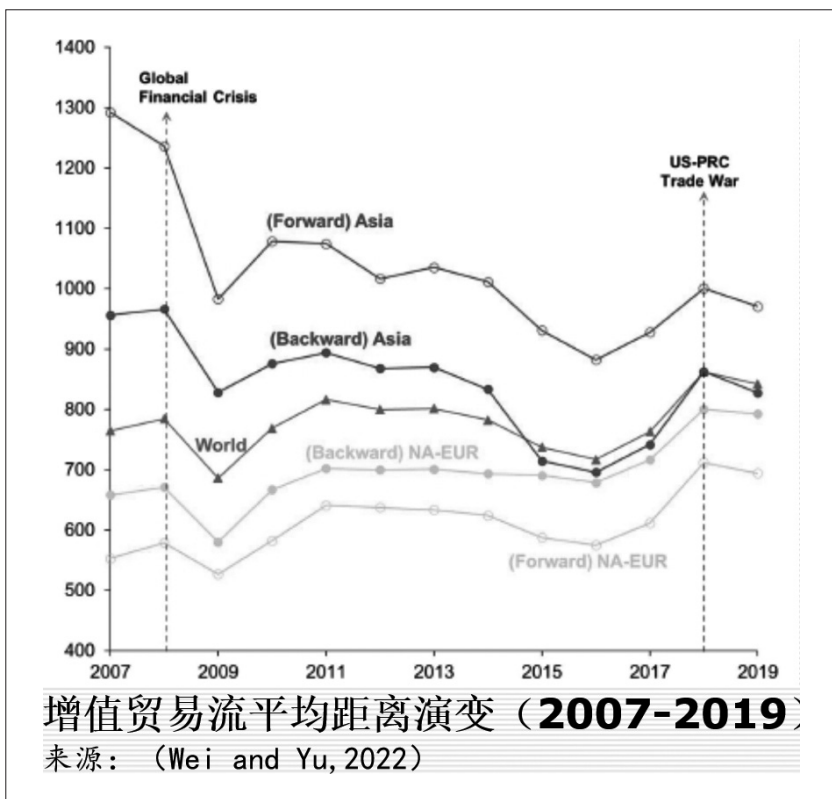


图 9：近岸化是普遍趋势吗？

各国跟美国贸易占比变化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要看经济体量。比如中国，如果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能够持续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我们还处于一个追赶的状态，那么跟美国的

贸易占比，尽管 2017 年以后是下降的，在安全逻辑上是下降的，但在经济逻辑上还会上升。像林毅夫教授所说，如果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经济体量能够达到将近两倍的话，这个比重肯定还会进一步上升。但是问题是我們能不能做到？

很多学者说到最近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一段时间以来出现区域化、短链化，短链化就是供应链变短。北美有近岸外包，中国这边有 RCEP，这都是区域化、短链化。那么区域化、短链化、近岸化会不会是一种长期趋势？我对这个表示怀疑的。后来我找了同事余心玎老师，我知道他一直在跟这些数据，他和哥伦比亚大学的魏尚进老师一起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们计算增值贸易流的平均距离。

他们发现在 2007 年到 2019 年这段时间里，亚洲价值链的变化形式跟欧美不一样，在价值链里，一个是卖的距离，一个是买的距离，这个我不多做解释，就是一个叫 forward，一个叫 backward。对于这两个距离指标，亚洲价值链在过去 10 来年是下降的，确实体现了近岸化、短链化，而欧洲价值链和美洲价值链是相反的，是拉长的，下面两条黄线就是欧美的距离。也就是说对亚洲来讲，它卖东西的市场是越来越近的，买中间产品的距离也是越来越近的，欧美是越来越远的。我认为这是符合道理的。不管是用新经济地理的理论，还是用一般的贸易盈利模型，我们都能看到影响贸易流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双方的 GDP。就算中国现在的 GDP 增长速度有比较大的下滑，但是当今世界上 GDP 增速最快的区域仍然是中国、印度、东盟这块区域。贸易是跟着什么走

的？这一块供应能力越来越大，市场越来越大，它跟贸易对象的贸易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对亚洲来讲，平均的链条距离是越来越短的，因为增长最大的一块市场就在周边，在 RCEP 周边的地方。但是对美国和对欧盟来讲，卖的和买的链条都是变长的，因为它有越来越多的贸易需要在区域外进行。

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后，确实出现了一定的短链化，各个区域都出现了，但是这是不是长期趋势呢？亚洲的短链化是符合长期趋势的，欧美的短链化不见得符合长期趋势。它的安全性因素考量跟经济因素的长期趋势是背离的。前一段时间我在清华与卡内基基金会的一个对话里也提到过，我说如果用依存度（dependency）这个指标来衡量 directing 效果的话，我认为 directing 很难做到。对亚洲这一块市场的依存度，从长期趋势来说，还有可能继续攀升。

冷战后一直到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很可能是全球化的黄金时期，这之后美国向中国转移制造业这样一个形态可能告一段落了。但是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形态呢？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不管是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各种技术进步，包括通讯设备、信息技术的成本降低，各方面影响贸易、使得贸易能够继续增长的那些因素，比如科技因素、内在的因素，仍然还是存在的。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要看两个方面。

一方面，我们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还会下降。我们的出口除以 GDP 的数值比 2006、2007 年的高点已经降了一半了，

今后还要降，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数值比美国的还要高。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规模越大的时候，国内大循环日益成为主体，这是客观现象。这不是我们主动要做的问题，它是一个客观现象，出口依存度必然是要下降的，中国可能以后不会降到美国那样低的程度。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美国是大国之间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不管是关税还是增值税，美国都没有，它只有一个销售税之类的。我在疫情期间寄包裹，800 美元以下美国是一点税不收的，它是一个很开放的市场，但是它的依存度并不高，进出口除以 GDP 的数值并不高，因为它的国内市场规模太大了。

当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越来越大了以后，这个依存度是要下降的。但是我们的海外利益一点都不会少，我们对外投资，以及吸引外资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可做。全球化还会以一些新的形态继续往前发展。我相信中国如果有像美国那样大的市场，我们今后的进口比例就能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我相信那时中国在整个世界贸易中占的比重还会上升，可能是跟以前的形态不太一样地往前发展。但是安全因素、政策因素，使得目前全球化的各种指标都上不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断对中国采取各种各样的“小院高墙”、出口管制等多样措施，我们应该怎么做？

对于这个问题，我又回到刚才提到的那段历史。美国当时是怎么干的？美国 1934 年是怎么干的？美国搞了一个半世纪的高关税保护主义，突然之间在 1934 年一下把自由贸易的

大旗举起来了。美国通过对等贸易开放的形式，又推动自由贸易走了 80 多年，比之前英国的 80 来年其实走得更加扎实。在二次大战之间，贸易保护主义是没有什么国际约束的。世贸组织现在半死不活的，但各国的关税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以外，也没有一下就它抬上去。美国战后建立起来这一套的制度，尽管现在美国非常不喜欢，但是它还是在发挥作用的。

对于我们来讲，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做法是可以借鉴美国 1934 年的经验，就是对等开放。世贸组织和关贸协定中都有这句话，都提到要对等互惠。对等这个概念，特朗普也讲过，他说跟中国不对等，比如给你汽车 2.5% 进口税，你应该也给我 2.5%。实际上美国的学界也不同意这种做法，像国际关系大师基欧汉，他提出对等有两种，一种叫做特定对等（specific reciprocity），一种叫做扩散对等（diffuse reciprocity），扩散对等指的是整体权利义务的平衡。两个国家比较优势不一样，当然关税结构不一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整体的权利义务平衡，而且这种平衡包括动态的平衡。比如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还没到那个发达程度，所以现在关税高一点，发达国家的关税低一点，这在过去几十年的关税谈判中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包括贸易便利化协定都体现出了这种精神。等到发展到一定程度、条件成熟了，那么我会更加开放，这是一种动态的对等，所以这叫广义对等、扩散对等，它是一种权利义的综合平衡。在这个理念的基础上，给予发展中国家一定的特殊优惠待遇，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对等原则的例外，而是对等原则的内在要求。随着

经济发展程度到一定的高度，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现在我们的市场虽然没像美国那样很早就是第一大世界市场了，我们现在是第二大世界市场，但是我们是第一制造业大国，我们这个市场还是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在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怎么说，我们市场的开放对其他国家还是有吸引力的。中国加入 CPTPP 非常困难，但是中国的贸易体量跟 CPTPP 原来的 11 国相比，是它的 1.5 倍；如果加上英国，我们还是比整个 CPTPP 的体量还大。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大困难，有很大的阻力，但是对 CPTPP 还是有吸引力的。我们需要用这种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吸引力来跟它稳定贸易关系，来获取它的对等开放。

这种对等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多边对等。多边对等在世贸组织中比较常见的谈判方式叫做周边谈判，世贸组织 164 个成员，没法开放一揽子开放怎么办？还是强调自愿。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服务贸易的国内规制谈判完成了，那么有七八十个国家也占到世界市场的 90% 以上了。这七八十多个国家相互之间可以自愿进行一定程度的开放，或者共同遵守哪个规则，就是自愿参与。

投资便利化协定采用的也是一种多边谈判的方式，我们希望最后变成一个多边协定，但是在谈判的过程中仍然采用了周边的形式。这是中国在世贸组织中发起的，我们主导的第一个谈判。虽然它的标准不是那么高，美国嫌标准低不愿意参加。今年 7 月 6 日宣布谈判完成的时候，有 112 个国家签字了，现在听说又拉了 10 来个国家了，那么 164 个成员

中有 120 多个成员，明年一季度在阿布扎比开第十三次部长会议的时候，估计会具体开始落地，那也不错了。

目前美国对自由化没有任何兴趣，在世贸组织中没法推进自由化的情况下，我们推进便利化行不行？推进所谓的“贸易+”议题行不行？“贸易+”议题涉及到环境与气候，这原来是我们的敏感领域，是我们觉得没法谈或压力太大的领域。现在我们主动出击去谈，在世贸组织中这是我们主导的第二个谈判，就是塑料制品谈判。这个谈判发起了以后，美国在今年上半年表示愿意参加限制塑料制品的谈判。我们说以竹代替塑料制品，这是个环境议题，我们现在主动提出来谈判，这个议题不是所有世贸组织成员都参加，是自愿的。

我们目前在世贸组织中采取周边形式推进的两个议题，一个是投资便利化，一个是环境气候。在十几年、二十几年前，这都是我们的防守利益，都是人家进攻，我们在那挡。我记得 1998 年在建国饭店开 OECD 投资开放的对话会，当时发展中国家，包括马来西亚的学者，都是一片反对。现在这些议题，我们把它转化成进攻议题了，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利大于弊了。

对于气候议题，前一段大家可以看到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等这些方面。因为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这对我们的钢、铝产业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并没有表示支持，我们的研究认为，里面有些内容与世贸组织的规则是不相符合的。

我们的电动汽车，欧盟这一次对我们没有办法反倾销，

因为我们电动汽车出口的价格一点都不低，比国内销售价格甚至要高出 50%，出口以后仍然有竞争力。所以它没办法反倾销，只能反补贴。我们的补贴也不是一直在那补，我们最主要的一块“国补”在去年年底就已经终止了。前段时间交流时，外方说你们的充电桩还在补，我说可能充电桩还在补，但也是一个过渡产业。这个产业的竞争力培养起来以后，不管是风能、光伏、氢能、电动汽车，到一定程度形成一定竞争力，就开始退坡，然后终止补贴。

我们跟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争议，就中国的制度，我们这些补贴没有任何一个是采用禁止性补贴，采用的是可诉补贴，如果你发现有证据对你造成损害了，你可以跟我来打官司，但并不是世贸组织禁止的。这一系列关于新能源的补贴，在 2000 年以前，在世贸组织中有一块是允许的，叫做不可诉补贴——就是允许的补贴。但是这一块补贴在 2000 年以后被停了，所以他如果来跟我们打官司是可以的，但是他必须要证明他、受到的损害。

前段时间在一个交流中间，我就讲现在西方国家对我们补贴的最大指责是发生在哪些领域？大量的就是发生在新能源领域，光伏、风能、电动车等等。但是你要看到整个气候升温的指标现在已经要用完了，中国这个制度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有各种各样的争议，我们评价一个制度好不好关键是看能不能解决问题，能不能调动足够的积极性。如果说能够调动一定的积极性，同时还能够解决环境气候这些市场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果真正能够针对市场的缺陷进行弥

补，这有什么不好呢？所以中国在世贸组织的补贴谈判中提出，希望能够恢复不可诉补贴的规则。现在其他国家也纷纷有一些补贴，如果是针对市场扭曲的一定的补贴，我认为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美国现在的补贴，除了新能源补贴之外，还有围栏条款，专门针对中国，只要这个企业跟中国做生意，就把补贴收回来。我们说这是违反世贸组织政策的。但是补贴本身，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谈的议题。

除了多边领域的对等以外，最重要的体现对等开放的领域是双边和区域。现在中国跟美国的政策一个很大的不同，美国基本上不谈自由贸易区，谈的是没有自由贸易条款的新型贸易协定，里面有很多劳工条款。劳工条款现在我们也愿意接了，但是美国不愿意谈降关税。中国采取什么做法？是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面向全球建立高标准的自贸区网络。RCEP 落地以后，我们现在明知不可为，也要去向 CPTPP 申请加入。我们在今年已经谈了好几个跟拉美的自贸协定。中日韩的自贸协定谈判有可能重启，贸易部长们在疫情期间好几年没开会了，三方领导人有一次会见以后，很可能贸易部长会见机制可能恢复。从韩国和日本的经济利益上来说，他们还是有动力谈判的，尽管有政治因素干扰。我们跟中东海合会的谈判恢复，沙特现在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积极，跟日本在谈，跟中国也在谈。

世贸组织降关税，没办法一起降的话，我们就一个个的谈，就像美国当初在十几年时间里谈了 30 多个自贸协定，我们能谈多少是多少，谁愿意跟我们谈，我们就跟他谈。通

过双边的协定，通过区域的协定，能把关税打下去也行。

再一个是动态的对等，随着我们发展阶段的提升，积极稳妥地推进自主开发，我觉得汽车降关税还有余地，还可以再降。如果我们形成了竞争力，我们也可以继续降。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制度对等，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有制度对接。我们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他国家有其市场经济的模式。不同的市场经济需要对接，怎么对接？第一个是竞争中心，5年以前我在沙龙中就提过，还有一个叫做所有制中心。为什么提这个两点？美欧日西方国家联合声明对中国有很多要求，这些要求主要发生在什么领域，提出了什么样要求，跟我们的体制相不相容？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整个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做了一个全面的梳理，谈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时，谈到的是这么几点，第一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所有制问题；第二是分配问题，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第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面还有第四点，第五点，那两点以前提的不是那么多，一个是开放，一个是创新。前面这三点代表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西方国家对我们的诉求在哪一点上？没有对所有制提出要求，没有对分配体制提出要求，它要求的是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要求。在所有制、分配体制上的诉求不多，在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要求，总结起来是希望竞争中性，国有企业不应因其与政府的联系而享有相对于其他企业的人为的竞争优势。我们一直是这么提的，在市场竞争中对各类所有制

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但是是不是落实到位了？有很多不同看法。

竞争中性这个要求是从公平竞争体系的角度来说，可能是西方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在世贸组织的传统中，有一个没有明文写出来的，但在很多文献中谈到的，包括在 OECD 的一些文件中谈到的，叫做所有制中心。世贸组织讲非歧视待遇，包括不歧视公有制国家，包括不歧视国有企业，也就是说对政府法规和措施所施加的纪律并不区分法规或措施所涵盖的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是公有或私有实体的情况。在西方对我们提出竞争中性的时候，我们的谈判人员就拿这一点来跟他对冲，我们就说应该遵守世贸组织的所有制中性传统。也有学者讲，所有制中性传统反映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就是每个国家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制度，这体现出国际经贸规则的包容性。

竞争中性是反映国际经贸规则的统一性，所有制中性是反映国际经贸规则的包容性。你的所有制是什么样的？没关系，政府完全可以去建立国有企业，这是你的主权。但是你建立起来以后，它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一个市场主体，从它有生命开始，就应该跟其他市场主体是平等竞争的，不能赋予它额外的优势。你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你是公有制国家也好，你是国有企业也好，都不应该受到歧视。这个问题实际上在现有的各种国际经贸规则中都有体现，包括 CPTPP、美墨加协定，都专门有国企条款的一章，清楚表述本章的任何规定不影响建立和维持国有企业，你完全可以建

立中国物流集团、中国文化集团，这些都是可以做的，但是建立起来了以后，不能持续享有额外的竞争优势。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跟其他国家的企业就能够在市场上有一个良好的竞争关系。欧盟的宪章性条约《欧盟运行条约》第 345 条（继承了最初的 1957 年《罗马条约》第 222 条、《欧共体条约》第 295 条）规定：“协议不影响各成员国关于财产所有权制度的规定。”欧盟都不能够去约束每个国家公有制比例多大，是不是能够建立国有企业，都不能管这个事情，包容性必须要有，否则的话欧盟走不到今天。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最终重新让世贸组织够焕发生机，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国际贸易体制的话，那么它必须要建立在统一性和包容性，即建立在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相结合的基础之上。

这个事情从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但落实到具体规则时，界限是模糊的，所以今年我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题目是注资补贴。注资补贴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政府的国资管理部门也好，财政部也好，你去建立国有企业，或者对现有的企业注资，这个不是补贴，你是有这个权利的。但是你注资的时候，如果采用了非市场的方式，或者不要求市场回报，那么就有可能形成补贴，这个叫注资补贴。它可以是货物贸易补贴，也可以是服务贸易补贴，也可以是投资补贴。对于货物贸易补贴，在世贸组织的反补贴协议中就有相应的规定，反补贴协议的第十四条规定：政府提供的产权资本不应看作是一项利益的授予，除非这一投资决定可以被认定与该成员

境内的私人投资者的常规投资作法（包括风险资金的提供）不相一致。就是说，如果你跟一般的投资者的做法不一样，你不要求足够的市场的回报，就构成一种补贴。我最近一段时间在几个场合都在讲这个问题，因为我发现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是比较严重的。

前几年在特朗普时期，美欧老批评中国补贴。这段时间他们讲得的少了，这个事情可能他们懒得讲了，而且看到这样一些现象，这可能是我们在减损自己的竞争力。我们整个的 VC/PE 市场中，国资比例去年说是 60% 多，前一段时间我听说这样的国资其实绝大部分是地方引导基金。这些地方国资的投资行为，跟一般的市场投资行为非常不一样。

前些年我还讲引导基金挺好的，我发现这几年它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到底是地方政府有钱还是私人资本有钱？因为募资难，私人资本不愿意投钱，所以最后都是地方引导基金在做。最后就是恶性循环，个人资本慢慢淡出这个市场。地方引导基金的做法中，有几个是跟市场行为非常不一致的，一个就是返投，1.5 倍、2 倍的反投。不管这个地方适不适合发展某个产业，他要求你返投，因为他的目的根本不是要赚钱，目的就是要招商引资。本来 GP（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机构或自然人）可以在很大范围内去选择合适的点，去选择怎么产业布局，最后各个地方都是半导体，都是生物医药，都是人工智能，全都是重复的、分散的。我们双循环战略最根本的是什么？是全国统一大市场，但最后是分割的市场。它要保本，但是它不要求什么高的回报，跟私人

资本投资的特性完全不一样。严格的讲，这很可能构成注资补贴，因为它跟要求回报的投资风格完全不一样。

如果市场上有一部分是引导基金，挺好；但是如果引导基金唱独角戏，那就不好了。今天我看到有新闻说上海要建立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媒体上讲 KKR（私募股权投资机构）要来上海投资，我问是真的还是假的？黄会长说他们是在联系。我就感到这非常好。我们的互联网巨头有哪个不是最早由美资的创投基金慢慢带起来的，采用 VIE 的架构，当然也有政府的各种配合。

这一段时间，白宫发出了对三个高科技领域进行投资限制的行政命令，可能明年美国财政部要去落地。但是除了这三个领域，还有很多领域是可以去做的。如果上海在这个方面能够闯出一块空间，把美资，把中东的资本，包括把民间的资本的投资积极性调动起来，培育真正市场化的投资环境，就可能对我们的科技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现在我看其他很多地方都难以做到这些。

最后简单说一点，在世贸组织或者多边规则的程序上，怎么去体现统一性和包容性。世贸组织的两审裁决是很有特点的，它有任意管辖权，164 个成员只要有原告去告，被告就必须要去接，如果做出一个最后有约束力的裁决，理论上来说就必须要去实施。

美国教授丹尼·罗德里克提出全球经济“不可能三角”理论，就是一国政府只能在经济全球化、政策主权和民主政体三者之中任选两个，而无法做到三个同时高标准实现。但

是，有的情况下把标准降一点，给一些例外，是可能做到三者兼容的。所以说，今后的全球化发展，既要讲国际经贸规则的统一性，也要讲包容性。

全球化发展到今天，中国有中国的困难，其他国家有其他国家的困难，我们也应该理解其他国家的一些困难，包括产业空心化。整个北美地区，如果制造业完全空了的话，并不见得对全球经济的稳定有好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各个国家应该相互配合。在全球规则的制定上，我们希望所有制中性，希望有包容性，对国有企业能够有一定的包容性，人家也希望有一定的包容性，在他最困难的一些地方也希望有一些政策灵活空间。与此同时，也要讲竞争中性，讲竞争规则的统一性，国有企业不应因为与政府的联系而获得额外的竞争优势。这些方面我觉得都是可以互相协商谈判解决的。

贸易战、贸易摩擦今后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打到一定时候，大家觉得还是谈比打好，那么又会谈规则的。推动全球化前进的科技和经济动力仍然在，我相信全球化的进程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还会要继续往前走。

我主要跟大家汇报这些，谢谢！

乔依德：非常感谢崔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精彩的演讲，涉及的面非常广，一开始讲了背景，所谓的“新华盛顿共识”怎么来的。再回顾英国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起源和历史过程。又讲到当前遇到的一些问题，还有经济重心的转移，特别是讲到一个国家的 GDP 体量会对产业链、对贸易有影响，这一点好像以前讲的不多。我们还可以提一两个问题。

赵广彬：一个很简单问题，科尔尼公司的那个中国指数是在下降的，但如果我们看外贸的话，过去三年中美贸易实际上是在增长，我不知道那个指数是怎么算出来的？

崔凡：中美之间贸易统计的差距，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数据低于美国统计的进口数据，由于有转口贸易、离岸贸易等大概有 1000 亿美元的差额，这个差额在贸易战之后就消失了。中国现在的出口数据，有时候比美国的进口数据反而低了，美国算出来的数据是偏低的，科尔尼公司计算的时候，更多的是用美方的数据。

再有一个是比例的问题，它计算亚洲包括中国在内的 14 个低成本经济体，中国在这里面的比例是在下降的，从 60% 多降低到低于 50%。越南的出口是迅速上涨的，其他有一些是涨的。当然也有人讲，中国往越南出口的数字也是迅速上涨，但是它算的时候不一定每一项都回溯到原产地去了，所以科尔尼公司算出来的比例是在下降的。

乔依德：我对科尔尼公司做的东西一直不赞赏，它很多写的东西让我感觉它是要有一个拳头产品，维护自己公司的形象，所以很多回流到美国的数据是夸大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崔凡：科尔尼公司在去年之前的报告里，它的三个指标都不是有特别明显的回归。但是去年开始，它的标题是到了转折点，它最重要的依据还不是刚才说的数据，最重要的依据是问卷调查，调查企业老板的投资意向等等，但是这个调

查有多少最后能够兑现有不确定性。

这几个指数的算法很简单，跟其他美国制造业回归的指标有时候会有冲突。比如说去年制造业回归指数是上升的，前年和大前年制造业回归指数都是明显下降的。但是美国从前年开始，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值已经止稳了，止稳以后涨得很少。日本是猛降。别看中国这几年非常困难，但是中国去年前年，制造业占 GDP 的比值是回升的，而且回升幅度比美国的回升幅度实际要大。也就是说，制造业在中国还在继续集聚。德国在这段时间也比较困难，日本制造业的比重是下降的。

乔依德：我做一个评论，不是提问题。因为你最后讲到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我觉得你从理论上分析得都很好，也给我们有启发。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在我们国家做不到这一点？我自己也是有感觉，大概五六年以前，我们人民银行每年跟 IMF 都有研讨会。有一年我参加讨论竞争中性，IMF 请了澳大利亚专家来专门是讲竞争中性，开了一天的会。当时 IMF 中国首席代表很高兴，跟大家吃晚饭说克强总理很重视，要他们搞一个会议纪要给他等等，大家也觉得挺好的，但过了一段时间就没消息了，媒体上也不说了。

你讲的理论当然都对，为什么做不下去呢？我觉得在历史上，其他国家的国有企业是在资本主义的土壤中发展起来的，我们这里是在国有制的土壤中慢慢发展私有制、发展民营企业，这个有很大的不同，难度较大。我们的宪法以公有

制为主体，这个其他国家没有。当然每个国家可以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这不错，我们选择以公有制为主，你讲的包容、统一，这个事情的难度就比较大。

崔凡：我看了一下5年以前的演讲，我当时也提到竞争中性，当时提到改革开放不可能三角。确实在真正推行的时候，你又要高水平对外开放，又要国内完全的国民待遇竞争中性，同时要保证在战略新兴行业以及国际主导的行业里国有经济要占主导地位，这三者有时候是很难同时达到的。

全球化不可能三角，并不意味着不能全球化，不是说完全无解，必须要有妥协，必须要有折中，要达到一个最优点，世界上很多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弊。中国这样一个制度，有人讲我们市场化不太彻底，牺牲了很多的效率。但是回过头来看，这些年间我们在气候问题上，在新能源技术方面，中国的突破反而多。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很多国家都是无解的难题。每个制度都有它的一些弱点，也有它的一些优点，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能够找到共处之道。人家也说了这个话，要寻找跟中国在世上的共存之道，那么我们要去摸索。有些东西理论上可以说一说，但是好的东西是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我也相信通过改革开放实践，最后能够找到一个比较优的点。

乔依德：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崔凡教授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也感谢各位那么长时间还坚持，非常感谢大家！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